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SHIJIAZHUANG TIEDAO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刊扩展期刊
- RCCSE中国准核心学术期刊
- 河北省高校优秀期刊
- 综合性人文社科类统计源期刊
- 中国知网全文收录期刊
-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全文收录期刊

2025年
第19卷 第1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和主编、副主编

主 任：齐西伟

副主任：王 伟 王书海

委 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艳春 耿立艳 郭 平 李素英 牛衍亮 齐西伟

刁道远 任立新 王 辉 王 伟 王宏斌 王立军

王书海 王晓芬 魏文凤 杨继成 张学军 张艳辉

赵 霞 赵艳斌

主 编：齐西伟

副主编：王 伟 王书海 杨继成



目 次

经济管理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评价研究·····	李 娟 王欣宇 唐雨婷(1)
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	周 颖 胡天美(9)
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	姚小菊 武 琼(18)

乡村振兴专题

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产生机制及治理路径——以安徽省阜南县 W 镇为例·····	宁 佳 李 韬(28)
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	黄小彤 陈静宜(35)
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 ·····	张金肖 孙 璐(41)

社会政治

人口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	尚子娟 孟 瑶(48)
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维审思 ·····	樊瑞科 刘苗苗(55)

课程思政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特征及路径探索——基于 2022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实证分析 ·····	程西慧 何杭蓓 李晓华(62)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 ·····	高 俊 虞满华 苏国红(70)
基于案例资源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	牛衍亮 戴 畅 马 亮 邓小鹏(76)

高等教育

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职责使命与建设路径 ·····	方 兵(84)
“双一流”背景下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	李兴国 马新成(91)
Sora 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效能、风险检视及优化路径 ·····	陈丹丹(98)
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	刘敏畅 王甲成(105)

CONTENTS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of Elderly Care Business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LI Juan, WANG Xinyu, TANG Yuting(1)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 Decoupling and Driving Factors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ZHOU Ying, HU Tianmei(9)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ubsidies: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YAO Xiaoju, WU Qiong(18)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h of “Lying Flat” Problem of Township Cadres: A Case Study of W Town, Fun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NING Jia, LI Tao(28)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Language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UANG Xiaotong, CHEN Jingyi(35)
Theoretic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Empowering Farmers to Improve Income Quality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ZHANG Jinxiao, SUN Lu(41)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Enabl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ANG Zijuan, MENG Yao(48)
Three-dimensional Review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FAN Ruike, LIU Miaomiao(55)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022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CHENG Xihui, HE Hangbei, LI Xiaohua(62)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Digitization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GAO Jun, YU Manhua, SU Guohong(70)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urses Based on Case Resources	NIU Yanliang, DAI Chang, MA Liang, DENG Xiaopeng(76)
Responsibilities, Mission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FANG Bing(84)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	LI Xingguo, MA Xincheng(91)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Risk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Sora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CHEN Dandan(98)
Integration Path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LIU Minchang, WANG Jiacheng(105)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01-08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评价研究

李娟, 王欣宇, 唐雨婷

(华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唐山 063210)

摘要: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构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相对发展模型对2012—2021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河北省养老事业综合水平呈波动下滑趋势,而养老产业则呈由低到高发展态势,且二者内部各子维度发展水平也有不同程度变化;两系统间耦合度提升明显,耦合阶段由2012年磨合耦合转变为2021年高水平耦合,彼此关联效应逐渐强化;耦合协调关系类型以养老产业滞后型为主,考察期内虽基本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总体呈改善态势,且互促协同效应渐趋增强。对此,河北省应强化政策引导及财政支持、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环境,并坚持“兜底+多元”并存发展模式,持续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效协同发展。

关键词:河北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719;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01

一、引言

201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将事业与产业概念共同包含在“养老服务业”之中。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提出“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同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指出,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既要借助市场力量发展壮大产业,更要注重在产业中注入更多公共属性和公共责任,提高全社会养老服务品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作为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的“两驾马车”,实现二者双轮协同驱动,对缓解老龄社会压力、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具有突出现实意义^[1]。然而,现阶段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如何?该怎样推动二者实现协同发展?这两项问题仍亟待回答。

河北省作为我国人口规模较大的省份之一,近年来,老龄化压力渐趋加重。根据七普数据显

示,河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81.20万人,占总人口19.85%,较六普提高6.85个百分点。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河北省坚持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截至2022年底,河北省已有养老机构1804家、床位23.2万张,城镇社区日间照料设施覆盖率达90%以上,养老服务设施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纵观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实践,当前河北省对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概况仍缺乏科学预测与研判,致使在推进老龄工作中面临许多难以决断的现实问题。因此,深入探讨分析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已有研究^[2-7]侧重于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理论层面探讨,缺乏对二者协调发展状况实证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相对发展模型对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系统评价,旨在全面明晰二者协调水平,并识别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

收稿日期:2024-06-18

基金项目:河北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HB23GL005)

作者简介:李娟(1979—),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本文信息:李娟,王欣宇,唐雨婷.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评价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1-8.

为推动河北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京畿福地、老有颐养的乐享河北”提供科学支撑。

二、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内涵及耦合协调机理

明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基本内涵、厘清二者耦合协调机理是对二者协调发展并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前提。

(一)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内涵

目前政策及学界对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内涵并无统一科学界定标准,但就研究共性而言,“主体及属性差异”是众多学者^[1-4]对二者内涵进行分析时多采用的切入视角。针对养老事业,主要强调政府主体性及发展的公益性,而对养老产业,则强调市场力量的主导地位及经营运作的私立性。

1. “政府主导”下的养老事业

准确理解“养老事业”需先明确“事业”内涵。根据词典解释,“事业”是具有一定目标、规模而自成系统的、关系社会发展的经常性活动,突出强调发展的公益性、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资源和维护公共利益的主体责任人,在公共事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养老事业作为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现增进公共利益价值目标的重要依托。因此,从发展主体及社会利益角度考量,养老事业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承担责任,为满足老年群体基础养老服务需要的一系列公共物品或服务,具有公益性、普惠性的发展特征^[3-4]。养老事业发展的好坏反映着政府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和权

利的责任担当,大力发展养老事业不仅是解决社会大量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改善民生问题的应然举措。

2. “市场主导”下的养老产业

与养老事业有所不同,“养老产业”侧重于“产业”属性。“产业”是指在一个经济体中,有效运用资金与劳力从事生产经济物品的各种行业,具有私立性、营利性、市场性属性特征。针对养老产业内涵释义,不同学者^[3-6]已进行较多讨论,总体而言,现有共识主要有三点:一是养老产业服务内容更加多样化及个性化;二是参与主体主要是企业而非政府;三是具有竞争性与营利性的发展特征。基于学界共识,从产业发展角度而言,养老产业是以企业为主体,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为目标,向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养老产品服务的营利性市场活动^[1,4]。相较于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突出特征是可营利性和市场导向性。作为一项朝阳产业,养老产业对增加老龄产品服务消费,促进老龄消费市场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是我国未来具备巨大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形态。

(二)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机理

耦合是探讨系统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概念。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作为两个动态发展系统,二者耦合是两系统间表征出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耦合促使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间关系趋于紧密复杂,并在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协调状态,进而影响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二者间耦合协调机理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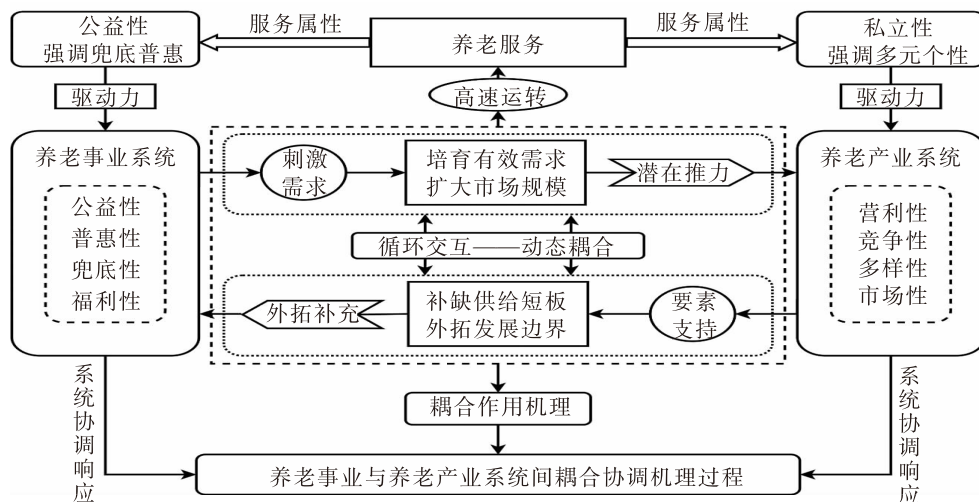


图 1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机理过程

1. 养老事业是养老产业市场扩延的“潜在推力”

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呈金字塔型层次结构特征,在高级需求出现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求,当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高层次需求才会被有效激发。对养老事业而言,其主要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性养老服务产品,即满足老年人低层次养老需求。但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期待和要求也将提升,开始追求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更有品质、更具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养老服务^[7]。而这些高层次需求往往是养老产业中更为精细化、专业化服务的切入点。当这类养老需求得到养老事业有效激发后,养老产业便以其多样化的产品服务进行专业供给,进而扩大自身市场规模。因此,从需求层次角度分析而言,养老事业在全面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和健康需求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也有效激发了他们对于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深层潜在需求,并以此成为养老产业探索创新、拓展市场的潜在推力。

2. 养老产业是养老事业发展边界的“外拓补充”

养老事业作为一项普惠性社会事业,运作基本依赖稳定财政扶持,因而作为一项长期投资,发展面临着服务内容单一、资金渠道局限等诸多难题。相较而言,养老产业作为市场导向的业态,恰能有力补缺养老事业供给短板,帮助养老事业外拓发展边界^[4]。一方面,养老产业凭借其丰富多样的服务与产品,成为养老事业有限产品服务的重要“补充”。这种“补充”意味着养老产业在养老事业满足基本养老需求基础上,能通过服务范畴拓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选择,满足

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求,弥补传统养老事业在服务供给深度与广度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养老产业还扮演着要素资源输入者的角色,通过提供资金、技术等要素支持,帮助养老事业“外拓”发展边界。养老产业实行“市场化经营”模式,拥有更灵活的运作机制和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其多样化的养老设施、用品以及相关服务,也为养老事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要素资源与条件,为养老事业发展提质增效。

总体而言,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间是“循环交互”的动态耦合关系,二者立足于不同发展目标,共同组成了驱动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效能提升的“双轮”。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不仅是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接、互促共进的应然要求,也是助推养老服务体系高效运转,进而打造“普惠供给、多元保障”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新格局的必然举措。

三、研究设计

(一)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科学性、代表性及可获取性等原则,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构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个子系统。同时,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多数学者^[8-10]在衡量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时主要从“医”与“养”两方面选取指标,“医”与“养”作为老年人养老需求中的关键性内容,是准确反映养老事业与产业发展概况的核心维度^[10-11]。因此,本文结合医养结合思想,围绕事业与产业属性差异,在参考既有学者研究^[8-11]基础上,从发展规模、要素构成及产出效能 3 个维度出发,共选取 17 项具有典型代表性指标建构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维度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权重
养老事业	发展规模	公立养老机构数	个	+	0.111 4
		公立村卫生室数	个	+	0.064 8
		老年社会福利院数	个	+	0.160 1
		馆办老年大学数	个	+	0.163 1
	要素构成	公立养老机构年末职工数	人	+	0.073 6
		公立养老机构年末床位数	张	+	0.168 5
	产出效能	公立医院病床使用率	%	+	0.072 9
		基本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	人	+	0.098 5
		老年人福利经费支出	万元	+	0.087 2

续表

系统层	维度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权重
养老产业	发展规模	私立养老机构数	个	+	0.190 5
		私立医院数	个	+	0.050 8
		私立村卫生室数	个	+	0.037 7
	要素构成	私立养老机构年末职工数	人	+	0.181 0
		私立养老机构年末床位数	张	+	0.171 7
	产出效能	私立医院病床使用率	%	+	0.037 6
		私立养老机构年末在院人数	人	+	0.164 8
		私立养老机构年营业收入	万元	+	0.165 8

其中,发展规模主要关注各子系统整体规模与容量,包括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和配备情况等;要素构成主要关注子系统内部组成与结构状况,涉及从业职工数量、床位数等;产出效能则主要衡量各子系统发展效能水平,反映各子系统最终成果产出状况,主要包括床位使用率、经费支出和机构营收状况等。

(二) 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熵值法不受主观因素影响,对指标权重确定更加客观,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计算步骤如下:

① 计算标准化值 y_{ij} :

各项指标均为正向,故只采用正指标计算公式进行处理。

$$y_{ij} = \frac{x_{ij} - x_{i,\min}}{x_{i,\max} - x_{i,\min}} \quad (1)$$

式中, x_{ij} 为第 i ($i=1,2,\dots,m$) 个指标在 j ($j=1,2,\dots,n$) 年的原始值; $x_{i,\max}$ 和 $x_{i,\min}$ 分别表示各指标在时间序列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② 计算规范化值 r_{ij} :

$$r_{ij} = \frac{y_{ij}}{\sum_{j=1}^n y_{ij}} \quad (2)$$

③ 计算熵值 e_i :

$$e_i = \frac{\sum_{j=1}^n (r_{ij} \ln r_{ij})}{\ln n} \quad (3)$$

④ 计算权重 w_i :

$$w_i = \frac{1 - e_i}{\sum_{i=1}^m (1 - e_i)} \quad (4)$$

⑤ 计算评价指数 U_j :

$$U_j = \sum_{i=1}^m w_i y_{ij} \quad (5)$$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综合既有研究成果^[9,12],本文采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综合考察。计算步骤如下:

$$C = \frac{2\sqrt{U_1 U_2}}{U_1 + U_2} \quad (6)$$

$$T = \alpha U_1 + \beta U_2 \quad (7)$$

$$D = \sqrt{CT} \quad (8)$$

式中, C 为耦合度; D 为耦合协调度; U_1 和 U_2 分别表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评价指数; T 为综合协调指数; α, β 为待定系数。根据子系统权重予以确定,本文认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同等重要,故取 $\alpha = \beta = 0.5$ 。同时参考叶宋忠^[8] 和胡子坤^[13] 等研究,对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具体标准见表 2 和表 3。

表 2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度划分标准

耦合等级	耦合度值区间	耦合阶段
1	[0.0, 0.3)	低水平耦合
2	[0.3, 0.5)	拮抗耦合
3	[0.5, 0.8)	磨合耦合
4	[0.8, 1.0)	高水平耦合

表 3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值区间	耦合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值区间	耦合协调状态
[0.0, 0.1)	极度失调	[0.5, 0.6)	勉强协调
[0.1, 0.2)	严重失调	[0.6, 0.7)	初级协调
[0.2, 0.3)	中度失调	[0.7, 0.8)	中级协调
[0.3, 0.4)	轻度失调	[0.8, 0.9)	良好协调
[0.4, 0.5)	濒临失调	[0.9, 1.0)	优质协调

3. 相对发展模型

为明晰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类型,本文引入相对发展模型:

$$\gamma = \frac{U_1}{U_2} \quad (9)$$

式中, γ 为相对发展度,当 $0 < \gamma \leq 0.9$,为养老事业

滞后型, $0.9 < \gamma \leq 1.1$, 为同步发展型, $\gamma > 1.1$ 为养老产业滞后型。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 2012—2021 年的《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河北省经济年鉴》。同时,为保证数据完整性与准确性,对个别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值补齐。

四、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实证分析

(一)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2012—2021 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系统发展水平见表 4。

表 4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系统发展水平

年份	养老事业				养老产业			
	发展规模	要素构成	产出效能	综合水平	发展规模	要素构成	产出效能	综合水平
2012	0.302 1	0.228 7	0.073 5	0.604 3	0.042 3	0.006 7	0.018 0	0.067 0
2013	0.291 0	0.214 1	0.091 9	0.596 9	0.037 8	0.006 1	0.042 4	0.086 3
2014	0.208 7	0.199 4	0.114 1	0.522 2	0.037 1	0.005 5	0.030 5	0.073 1
2015	0.341 4	0.154 2	0.134 0	0.629 6	0.037 0	0.006 4	0.012 3	0.055 7
2016	0.301 7	0.175 1	0.172 8	0.649 6	0.041 2	0.004 2	0.037 1	0.082 4
2017	0.161 8	0.180 9	0.169 6	0.512 4	0.048 4	0.004 4	0.028 6	0.081 4
2018	0.248 7	0.003 5	0.192 2	0.444 4	0.059 6	0.021 4	0.054 7	0.135 7
2019	0.137 0	0.013 8	0.212 1	0.362 9	0.086 8	0.098 7	0.122 5	0.307 9
2020	0.169 7	0.049 2	0.170 0	0.388 9	0.196 2	0.269 1	0.230 5	0.695 7
2021	0.202 1	0.038 7	0.176 7	0.417 5	0.241 6	0.352 7	0.350 1	0.944 5
均值	0.236 4	0.125 7	0.150 7	0.512 9	0.082 8	0.077 5	0.092 7	0.253 0

1. 养老事业发展水平分析

由表 4 可知,河北省养老事业综合发展水平由 2012 年的 0.604 3 下降至 2021 年的 0.417 5, 总体呈波动性下滑态势。其中,2016 年前综合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整体介于 0.5~0.7 之间,发展态势相对较好,但在此之后下滑趋势凸显,从 2017 年开始低于平均水平,虽然在 2019 年后有小幅回弹,但整体发展势头仍较弱,这表明河北省养老事业发展已受到一定冲击。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老年人需求变化有关^[1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老年人养老需求层次逐渐实现从基本性到多样化梯级跃升,养老事业作为保民生、护兜底的主力军,难以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当前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增加,以兜底、普惠为核心的养老事业已无法承担现阶段巨大的社会养老压力,进而导致养老事业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从养老事业系统内部各维度看,2012—2021 年河北省养老事业发展规模与要素构成水平变化趋势类似,基本呈现波动下滑态势,其中要素构成水平下滑程度较大,具体表现为养老机构年末职工数与年末床位数两项指标下降较为明显,反映出河北省养老事业从业人员及床位减少等要素流

失问题较为严重。同时,产出效能水平 10 年间发展较为缓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河北省养老事业已开始无法有效契合老年人养老需求,亟须加强各类制度及政策引导,促进养老事业完善发展。

2. 养老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表 4 显示,在 2012—2021 年间,河北省养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由低到高提升趋势。10 年间养老产业发展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缓慢发展阶段(2014—2018 年),这一阶段总体呈微弱波动发展趋势,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此时期老年人需求还未得以充分激发,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加之 2013 年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化刚起步,配套政策支持力度较弱,加之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养老产业难以获得长效发展^[15]。二是强势提升阶段(2018—2021 年),河北省养老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机遇期,相较前一阶段,此阶段老年人养老需求多样化特征逐渐凸显。同时河北省陆续出台多项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的政策文件,2018 年为针对养老机构准入审批难、融资贷款难等问题,河北省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同时要求全面清理、取消申办养老机构的不合理前置审批事项,优化审批程序,激发各类

养老市场主体活力。在各类政策要素引导下,养老产业经营环境渐趋改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对养老产业系统子维度分析,10 年间河北省养老产业发展规模、要素构成和产出效能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要素构成水平增加较为明显,这一变化与养老事业正好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从业人员结构及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养老产业要优于养老事业。同时,伴随生活水平

提升,老年人养老需求层次逐渐上升,为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养老产业相关生产要素投入也显著增加,市场规模得到不断开拓。

(二)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计算得到 2012—2021 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见表 5。

表 5 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协调状况

年份	耦合度 C	协调指数 T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状态	协调关系类型
2012	0.599 4	0.335 7	0.448 6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3	0.664 3	0.341 6	0.476 4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4	0.656 3	0.297 7	0.442 0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5	0.546 6	0.342 7	0.432 8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6	0.632 0	0.366 0	0.480 9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7	0.687 8	0.296 9	0.451 9	磨合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8	0.846 6	0.290 0	0.495 5	高水平耦合	濒临失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19	0.996 6	0.335 4	0.578 2	高水平耦合	勉强协调	养老产业滞后型
2020	0.959 2	0.542 3	0.721 2	高水平耦合	中级协调	养老事业滞后型
2021	0.922 1	0.681 0	0.792 4	高水平耦合	中级协调	养老事业滞后型

1. 耦合阶段分析

从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系统耦合度值来看,10 年间二者耦合度基本保持在 0.5~1 之间,均值为 0.751 1,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2—2017 年耦合度一直保持在 0.5~0.7 之间,二者处于磨合耦合阶段,而在 2017 年之后,二者耦合度逐渐得到显著提升,两系统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这说明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大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得到了有效加强,耦合效应渐趋强烈,彼此关联也更加紧密。

2. 耦合协调状态分析

由表 5 可知,2012—2021 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间基本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从耦合协调状态划分结果看,两系统从 2012 年的濒临失调发展到 2021 年的中级协调,总体呈改善趋势,并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失调改善阶段(2012—2018 年),此阶段二者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两系统间耦合度却保持上升势头,协调度也从 0.448 6 上升至 0.495 5,失调状况渐趋改善。二是协调加强阶段(2019—2021 年),这一阶段耦合协调度由 2019 年的 0.578 2 上升至 2021 年的 0.792 4,升幅约 37.05%,相较前一阶段已有明显改善,表明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间互促协同效应趋于增强,二者互相促进趋势更加凸显。总体而言,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状态有显著改善,但从

整个发展过程看,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耦合度均高于耦合协调度,这说明二者间长期保持着“高耦合、低协调”的相互作用状态。因此,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政策、资金等要素资源支持,推动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

3. 耦合协调关系类型分析

根据表 5 分析,2012—2021 年河北省养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多数时期低于同期养老事业,二者协调关系类型以养老产业滞后型占据主导。分阶段来看,2012—2019 年表现为养老产业滞后型,但从 2019 年开始,二者进入交叉过渡期,养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逐渐反超同期养老事业,并且差距进一步扩大,此时二者协调关系表现为养老事业滞后型。分析其原因,这主要由于早期养老事业受到政府较多关注和资源投入,而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化程度不高,加之公众对商业化养老服务认知和接受度有限,导致发展缓慢。但近些年伴随《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养老服务市场化政策的实施,河北省养老产业市场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经营环境逐渐完善,促使养老产业加速发展并逐渐赶超养老事业。综合 10 年间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类型及综合发展水平状况比较分析,养老产业发展速度要快于养老事业,并且这种发展势头愈发凸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基于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模型,对2012—2021年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河北省养老事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性下滑态势。2016年前,发展趋势相对较好,但2016年后下降趋势逐渐凸显,虽然在2019年后有小幅回弹,但整体发展势头仍较弱。此外,养老事业系统内部发展规模、要素构成发展水平与综合水平发展趋势基本类似,呈波动下滑态势,产出效能水平整体发展也较为缓慢。

第二,河北省养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现由低到高提升趋势。2014—2018年发展比较缓慢,而2018年之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且总体水平提升幅度较大,到2021年综合水平已实现明显改善。同时,在养老产业系统中,发展规模、要素构成和产出效能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要素构成水平增加最为明显。

第三,河北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耦合阶段以磨合耦合为主,但近些年高水平耦合状态逐渐凸显,二者相互作用关系不断加强,耦合效应渐趋强烈。两系统耦合协调状态以濒临失调为主,协调关系类型以养老产业滞后型为主,虽然考察期内失调状态居多,但两系统间整体呈现由失调减弱向协调加强的改善发展特征,互促协同效应也逐渐凸显。

(二) 对策建议

1. 强化政策引导及财政支持,提升养老事业服务效能水平

养老事业发展与政府密切相关,能否得到强有力的政策及财政支持至关重要^[2]。由上分析可知,近些年河北省养老事业发展水平逐渐下滑,整体发展较为缓慢。因此,一方面,河北省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养老事业发展的辅助性与基础性政策体

系,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健全养老事业管理工作机制,明确好业内各类医养机构职责与义务,为养老事业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以设立专项资助基金、财政补助等方式,改善落后养老服务设施条件,强化各类公益性养老服务供给效能。同时,还要坚持纵深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加强养老事业服务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补齐养老事业发展短板,实现服务质量与效率双重提升。

2. 持续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环境,释放养老产业发展新活力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河北省养老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整体规模还相对较小。因此,相关部门还应继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环境。一是要强化政策扶持引导。坚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二是要建立多层次养老金融体系。坚持优化财税投融资工具,以提供税收及信贷资金支持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推动养老产业链优化升级^[16]。三是要健全养老服务市场监管机制。制定并出台行业性监管性法律法规,建立行业信用体系,通过规范养老服务市场主体行为,引导养老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3. 坚持“兜底+多元”并存发展模式,实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效协同发展

推进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养老事业“保兜底”,以养老产业“促多元”,精准把握二者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方面,要坚持事业产业协同互补、要素资源互通共享的发展思路,建立统一养老服务平台,鼓励养老事业与产业间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资源流动整合,以资源共享实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发展有机衔接。另一方面,要强化养老事业与产业双轮驱动、协同发展的政策导向,创设有助于二者协同互促的政策环境,建立多方养老主体广泛合作的工作机制,促进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互为支撑、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参考文献:

[1]李娟.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学理性思考[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1):

115-127.

[2]李璐,赵玉峰,纪竞垚.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龄事业

- 和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10): 103-113.
- [3] 郑志刚, 陆杰华. 中国语境下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相关概念的关系界定[J]. 老龄科学研究, 2017, 5(1): 57-65.
- [4] 杜鹏, 吴赐霖. 推动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发展[J]. 行政管理改革, 2023(7): 41-49.
- [5] 田香兰.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比较研究: 以日本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为例[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1): 29-35.
- [6] 韩淑娟, 谭克俭. 政府的责任边界与养老服务业的突围路径[J]. 东岳论丛, 2017, 38(8): 27-31.
- [7] 胡爱敏. 高速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的着力点: 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观照[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2(12): 92-97.
- [8] 叶宋忠. 体育产业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度评价研究: 以我国东部地区 11 个省市为例[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9, 45(2): 62-69.
- [9] 陈慧娟. 体育产业与养老产业融合动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8(3): 82-90.
- [10] 张国英, 龚慧. 广东省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配置均衡性研究[J]. 南方人口, 2022, 37(4): 1-13.
- [11] 尹忠海, 朱彤瑶. 中国省域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空间匹配关系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4): 82-90.
- [12] 邵静雯, 陈昭彦. 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 98-104.
- [13] 胡子坤, 张浩. 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耦合协调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4): 18-26.
- [14] 魏建华. 城乡老年人群健康养老消费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耦合度评价[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10): 63-66.
- [15] 尹凡, 张亚明, 刘明, 等. 供给侧结构性视域下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制约因素与战略抉择[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4): 1-5.
- [16] 胡梅玲. 税收政策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作用机理与有效性检验: 基于龙岩市的问卷调查[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5(4): 1-9.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of Elderly Care Business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LI Juan, WANG Xinyu, TANG Yu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business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lan to actively deal with population aging.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lderly care business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the study used entropy value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relative developmen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status of elderly care business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elderly care business in Hebei Province is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while that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is from low to high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ach sub-dimension within the two also has different degrees of change;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upling stage has been changed from a grinding coupling in 2012 to a high level of coupling in 2021, with each other's correlation effect being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typ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s dominated by the lagging type of elderly care industry, which is basically on the verge of being out of tun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improving, an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tual promotion is gradually enhanced. In this regard, Hebei Province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and financial support, optimize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protection + diversification", so a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business and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Key words: Hebei province; elderly care business; elderly care 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09-09

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

周 颖, 胡天美

(石家庄铁道大学 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随着河北省物流业快速发展,分析物流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促进物流业发展与碳减排的协调共进。运用 Tapio 模型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量与行业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进行判断,运用 Kaya-Lmdi 模型分析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量和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 2006—2019 年,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2019—2022 年,出现波动和下降。(2)关于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状态,2006—2022 年以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为主,波动较大。(3)关于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驱动因素,能源结构、运输结构、资金投入促进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其中,运输结构对脱钩起到关键作用。能源强度效应在 2006—2017 年促进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在 2017—2022 年阻碍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

关键词: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效应;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02

一、引言

气候变化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而中国经济增长始终依赖于资源的消耗^[1],2020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双碳”目标,即在 2030 年前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应该找到一种以低碳排放获取高经济产出的发展模式,这正是低碳经济所强调的。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碳排放量并不会增加,甚至会下降。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2],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确立了物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物流业发展迅速,能源消耗量剧增。物流业能源消耗量从 2006 年的 18 583 万吨增加到 2022 年的 40 434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7.35%。

因此,物流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环境压力。河北省作为中部综合交通枢纽主体,物流产业的发展与地区经济水平息息相关,2022 年河北省物流业能源消耗占河北省能源消费总量的 4%,是除工业外消耗能源最多的产业。因此,协调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为迫切。

国内外学者已对物流业碳排放的测算、碳排放脱钩、碳排放和脱钩驱动因素等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物流业碳排放测算,大部分学者采用 IPCC 碳排放系数法来测算物流业碳排放,马越等^[3]、赵松岭等^[4]运用该方法测算了不同省份物流业碳排放量。庞欣玥等^[5]运用该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的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关于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使用 Tapio 脱钩模型和 OECD 脱钩模型。OECD 仅将脱钩状态分为两种类型,而 Tapio 脱钩模型^[6]把脱钩类型分成 8 种,并且可以研究脱钩的结构性的因

收稿日期:2024-06-27

作者简介:周颖(1980—),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物流工程与管理、供应链管理。

本文信息:周颖,胡天美.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9-17.

素^[7]。关于物流业碳排放脱钩驱动因素研究,学者们大多使用 STIRPATS 模型^[8-9]或者对 Kaya 恒等式^[10]进行扩展,构造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模型,而 LMDI 模型具有可以消除残差,对变量分解完全的特点,所以被广泛使用。张文龙^[11]采用 OECD 脱钩模型和 LMDI 模型研究了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穆晓央等^[12]、刘渝等^[13]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和 LMDI 模型分析了省域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陈莉等^[14]采用 Tapio 模型和 Kaya 恒等式与 LMDI 指数组合模型分析我国物流业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效应及驱动因素。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现有关于物流业碳排放及其脱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各因素对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较少分析各因素对脱钩的影响。另外,在驱动因素选择方面,主要考虑了常见的对物流碳排放影响较大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因素。然而,在物流业碳排放中,针对物流业特点,货物运输结构和资金投入都会对其带来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在针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研究中,不仅分析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还将 Kaya-Lmdi 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与 Tapio 模型相结合,进一步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运输结构、资金投入等因素对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影响,及各因素对脱钩的贡献度,进而提出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建议。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一)碳排放测算方法

物流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原煤、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 8 种能源,因此,本文选取这 8 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IPCC 报告中的碳排放系数法来估算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量,公式如下:

$$C = \sum_i C_i = \sum_i \alpha_i \eta_i E_i \quad (1)$$

式中, C 为总二氧化碳排放量; C_i 为能源 i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α_i 为能源 i 的碳排放系数; η_i 表示能源 i 折标准煤系数; E_i 为能源 i 的消耗量。

(二)脱钩模型构建

Tapio 模型^[6]可以更详细地划分脱钩状态,见表 1,滚动基期也可以减少不稳定性。

表 1 Tapio 脱钩类型

脱钩状态		条件
脱钩	强脱钩	$e < 0,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弱脱钩	$0 < e \leq 0.8,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衰退脱钩	$e > 1.2,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负脱钩	强负脱钩	$e < 0,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弱负脱钩	$0 < e \leq 0.8,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扩张负脱钩	$e > 1.2,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连结	增长连结	$0.8 < e \leq 1.2,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衰退连结	$0.8 < e \leq 1.2, \Delta C < 0, \Delta GDP < 0$

本文设定式(2)为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的表达式。

$$e = \frac{\Delta C/C}{\Delta GDP/GDP} \quad (2)$$

式中, e 表示河北省物流业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碳排放脱钩指数; C 为河北省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 GDP 为河北省物流业生产总值(亿元), ΔGDP 为当期与前期生产总值之差。文献[6]根据弹性测算值 e 范围的划分,把脱钩状态划分为 8 种,如表 1 所示。

(三)碳排放脱钩因素分解模型

为了分析各因素对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影响,本文基于改进的 Kaya 恒等式和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模型^[15],构建 Kaya-Lmdi 模型,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和脱钩驱动因素进行分解。Kaya 恒等式^[10]是由 Yoichi kaya 提出的一种分析能源、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对碳排放影响力的方法。LMDI 模型^[15]是 B. W. Ang 提出的一种分解能源消费变化的方法,将能源消费变化分解为各个因素的贡献,具有可以消除残差,对变量分解完全的特点。

1. 改进的 Kaya 恒等式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11-14]研究成果,并根据物流业碳排放特征,考虑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运输结构、资金投入等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影响。改进的 Kaya 恒等式具体公式如下:

$$C^t = \sum_{ij} C_{ij}^t = \sum_{ij} \frac{E_i^t}{E^t} \frac{E^t}{G^t} \frac{V_j^t}{V^t} \frac{N^t}{G^t} = \sum_{ij} T_i^t I^t S^t K^t \quad (3)$$

式中, C^t 为 t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 E_i^t 为 t 年能源 i 的消耗量(万吨); E^t 为 t 年消耗的能源总量; G^t 为 t 年物流业产值(亿元); j 为运输方式, $j = 1, 2, 3, 4$, 分别代表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

4 种运输方式; V_j^t 为 t 时期第 j 种运输方式的货运量(万吨); V^t 为 t 时期的总货运量(万吨); N^t 为 t 时期的物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令 $T_i^t = \frac{E_i^t}{E^t}$, T_i^t 为 t 年消耗的能源 i 占物流业消耗能源总量的比例,表示物流业能源结构;

令 $I^t = \frac{E^t}{G^t}$, I^t 表示 t 时期生产 1 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即物流业能源强度;

令 $S^t = \frac{V_j^t}{V^t}$, S^t 为 t 时期第 j 种运输方式的货运量占总货运量的比重,即运输结构;

令 $K^t = \frac{N^t}{G^t}$, K^t 为 t 时期生产 1 单位产值所消耗的投资额,表示物流业的投资效应。

2. Kaya-Lmndi 模型

根据 LMDI 分解法对公式(3)进行加法分解,第 t 年和基期的物流业碳排放差值 ΔC 如式(4)所示:

$$\Delta C = C^t - C^0 = \Delta C_T + \Delta C_I + \Delta C_S + \Delta C_K \quad (4)$$

各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贡献值表达式分别如下:

$$\Delta C_T = \sum_{i=1}^8 \frac{C_i^t - C_i^0}{\ln C_i^t - \ln C_i^0} \ln \frac{T_i^t}{T_i^0} \quad (5)$$

$$\Delta C_I = \sum_{i=1}^8 \frac{C_i^t - C_i^0}{\ln C_i^t - \ln C_i^0} \ln \frac{I^t}{I^0} \quad (6)$$

$$\Delta C_S = \sum_{j=1}^4 \sum_{i=1}^8 \frac{C_i^t - C_i^0}{\ln C_i^t - \ln C_i^0} \ln \frac{S_j^t}{S_j^0} \quad (7)$$

$$\Delta C_K = \sum_{i=1}^8 \frac{C_i^t - C_i^0}{\ln C_i^t - \ln C_i^0} \ln \frac{K^t}{K^0} \quad (8)$$

式(4)~(8)中, ΔC 表示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 C^t 和 C^0 分别表示 t 时期和基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ΔC_T 、 ΔC_I 、 ΔC_S 、 ΔC_K 分别表示物流能源结构因素、物流能源强度因素、物流运输结构因素、资金投入因素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若贡献值

大于 0,表示该因素会增加碳排放量,若小于 0,表示该因素抑制碳排放。

接下来,为了分析各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脱钩指数的贡献,将 Kaya-Lmndi 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与 Tapio 模型相结合,即将公式(4)带入公式(2)中,得到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发展的脱钩因素分解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epsilon(C, G) = \frac{\frac{\Delta C}{C^0}}{\frac{\Delta G}{G^0}} = \Delta C \frac{G^0}{C^0 \Delta G} =$$

$$\frac{\frac{\Delta C_T}{C^0}}{\frac{\Delta G}{G^0}} + \frac{\frac{\Delta C_I}{C^0}}{\frac{\Delta G}{G^0}} + \frac{\frac{\Delta C_S}{C^0}}{\frac{\Delta G}{G^0}} + \frac{\frac{\Delta C_K}{C^0}}{\frac{\Delta G}{G^0}} = H_T + H_I + H_S + H_K \quad (9)$$

式中, H_T 、 H_I 、 H_S 、 H_K 分别表示物流能源结构因素、物流能源强度因素、物流运输结构因素、资金投入因素对脱钩指数的贡献值。若该因素的贡献值大于 0,则说明该因素会抑制脱钩;相反,若贡献值小于 0,会促进脱钩。

(四)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碳排放系数选取自《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折标准煤系数来自《综合能耗计算通则》。目前还没有在统计数据中专门设置“物流业”类别,本文参照赵松岭^[4],陈莉^[14]等,采用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的统计数据来代表物流业。2006 年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大力发展物流业,物流业得到快速发展,2023 年统计数据还未发布,因此,选取研究时间范围为 2006—2022 年,折标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见表 2。

表 2 折标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

系数类型	原煤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电力	液化石油气
折标准煤系数	0.714 3	1.471 4	1.471 4	1.457 1	1.428 6	1.330	0.122 9	1.714 3
碳排放系数	1.900 3	2.925 1	3.017 9	3.095 9	3.170 5	1.790	2.213	3.101 3

注:折标准煤系数单位:天然气为千克标准煤/立方米,电力为千克标准煤/千瓦时,其余 6 种能源单位均为千克标准煤/千克。碳排放系数单位均为千克碳/千克标准煤。

三、实证分析

(一)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及其脱钩效应

本文利用公式(1)估算 2006—2022 年间河北

省物流业每年的碳排放量,碳排放量计算结果和河北省物流业生产总值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2006—2019 年,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量呈现波动增长趋势,2019—2022 年,碳排放量出现波动和下降,碳排放量和生产总

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碳排放量波动幅度更大,下降,当年的生产总值也出现轻微下降。比如 2019—2020 年河北省的物流业碳排放量急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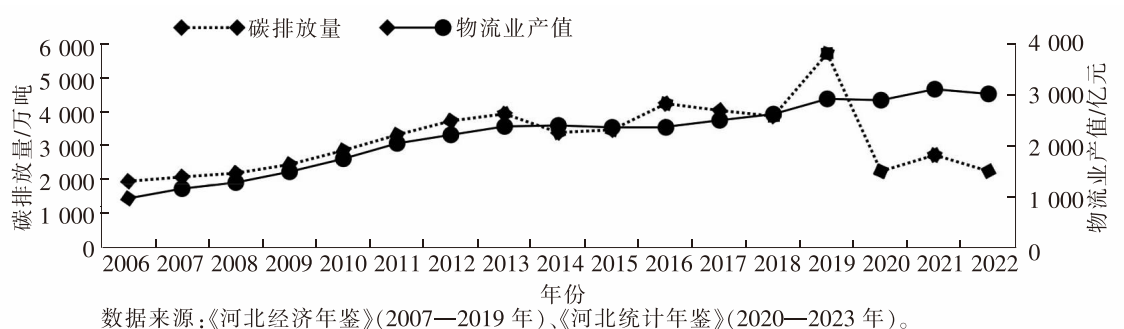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22 年河北省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物流业生产总值

基于公式(2)计算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指数,结合表 1 判断河北省物流业脱钩状态,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2006—2022 年出现了两次强脱钩和四次弱脱钩,四次扩张负脱钩,波动性较大。脱钩表示经济发展速度大于环境压力的上升,负脱钩表示经济发展速度小于环境压力的增加。分时间段来看,2006—2012 年河北省物流业

主要呈现弱脱钩和增长脱钩状态,原因可能是当时物流业发展方式比较粗放。2012—2019 年出现了两次强脱钩和一次弱脱钩,原因可能是近几年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推广清洁能源。2019—2022 年呈现衰弱脱钩和扩张性负脱钩状态,物流业产值出现波动和下降,而为了完成运输任务,物流企业可能需要增加运输次数或延长运输时间,从而增加了碳排放。

表 3 2006—2022 年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指数及脱钩状态

年份	脱钩指数	脱钩类型	年份	脱钩指数	脱钩类型
2006—2007	0.38	弱脱钩	2014—2015	-1.44	强负脱钩
2007—2008	0.53	弱脱钩	2015—2016	42.18	扩张负脱钩
2008—2009	0.74	弱脱钩	2016—2017	-0.97	强脱钩
2009—2010	0.99	增长脱钩	2017—2018	0.45	衰弱连结
2010—2011	0.94	增长脱钩	2018—2019	1.48	扩张负脱钩
2011—2012	1.46	扩张负脱钩	2019—2020	174.66	衰弱脱钩
2012—2013	0.76	弱脱钩	2020—2021	2.53	扩张负脱钩
2013—2014	-20.55	强脱钩	2021—2022	6.94	衰弱脱钩

(二) 物流业碳排放脱钩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脱钩弹性指数只能看出河北省物流业产值增长和碳排放脱钩之间的同步关系,但是无法解释脱钩变化的机理。因此,基于 Kaya-Lmdi 模

型,公式(3)~(8)对河北省物流业 2006—2022 年的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得到物流能源结构因素、物流能源强度因素、物流运输结构因素、资金投入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的贡献值和贡献率,结果见表 4。

表 4 2006—2022 年河北省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年份	ΔC_T	ΔC_I	ΔC_S	ΔC_K	总效应
2006—2007	7.71	-240.00	-1061.96	-116.46	-1410.72
2007—2008	-27.83	-71.56	-98.22	-193.42	-391.04
2008—2009	-87.79	-7.17	-1902.97	794.47	-1203.47
2009—2010	2.14	-8.46	1663.13	626.60	2283.41
2010—2011	-43.38	12.52	55.41	-672.78	-648.22
2011—2012	-95.06	228.74	-848.94	-15.00	-730.25
2012—2013	-25.88	-41.47	-786.93	945.33	91.05
2013—2014	47.69	-622.82	2978.52	-163.61	2239.78
2014—2015	-33.95	166.53	-584.83	105.18	-347.07

续表

年份	ΔC_T	ΔC_I	ΔC_S	ΔC_K	总效应
2015—2016	7.13	743.92	-1 477.89	16.00	-710.84
2016—2017	-61.65	-357.04	-1 283.40	-139.67	-1 841.76
2017—2018	59.60	-404.00	-1 323.72	-137.92	-1 806.04
2018—2019	-263.23	1 612.56	3 427.93	-495.77	4 281.49
2019—2020	215.44	-3 637.14	3 323.01	55.88	-42.80
2020—2021	-9.75	307.98	-3 642.74	-202.07	-3 546.59
2021—2022	70.63	-468.95	1673.08	292.54	1 567.30
累计	-238.17	-2 786.37	109.47	699.30	-2 215.77
贡献率/%	-11	-126	5	32	

从表 4 可以看出,各驱动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差异较大。根据表 4 中的贡献率,对其绝对值进行排序,得出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影响最大的是能源强度,其贡献率为 -126%,其次为资金投入,其贡献率为 32%,然后是能源结构,其贡献率为 -11%,最后为运输结构,其贡献率为 5%。运输结构、资金投入贡献率为正值,对碳排放有促进作用,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贡献率为负值,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碳排放最重要的因素。

基于公式(9)得出各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

排放脱钩弹性指数的贡献值,结果见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能源强度效应在 2018 年以前多数年份为负值,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具有促进作用,但 2019—2022 多数年份为正值,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具有阻碍作用。原因可能是,能源强度效应虽然抑制了碳排放,但 2019—2022 年的物流业产值也受一些因素影响而降低。能源结构效应、运输结构效应和资金投入效应对脱钩指数贡献大多数年份为负值,即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有促进作用;其中,运输结构多数年份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大,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起到关键作用。

表 5 2006—2022 年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各驱动因素脱钩指数

年份	能源结构	能源强度	运输结构	资金投入	年份	能源结构	能源强度	运输结构	资金投入
2006—2007	0.02	-0.63	-2.77	-0.30	2014—2015	0.64	-3.16	11.09	-1.99
2007—2008	-0.13	-0.33	-0.46	-0.90	2015—2016	0.48	49.72	-98.78	1.07
2008—2009	-0.24	-0.02	-5.27	2.20	2016—2017	-0.27	-1.55	-5.58	-0.61
2009—2010	0.01	-0.02	3.99	1.50	2017—2018	-0.17	1.15	3.76	0.39
2010—2011	-0.09	0.03	0.11	-1.37	2018—2019	-0.24	1.49	3.18	-0.46
2011—2012	-0.35	0.85	-3.14	-0.06	2019—2020	-4.34	73.30	-66.97	-1.13
2012—2013	-0.09	-0.15	-2.84	3.41	2020—2021	-0.06	1.85	-21.91	-1.22
2013—2014	1.53	-20.01	95.69	-5.26	2021—2022	-0.88	5.86	-20.92	-3.66

1. 能源结构效应分析

能源结构效应是指各能源消耗量占总能源消耗量的比例。

从表 5 可以看出,能源结构效应对河北省物流业脱钩指数的贡献值大多数年份为负值。因此,能源结构效应是促进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因素之一。2016—2020 年,能源结构效应对脱钩贡献值一直为负数,且绝对值逐渐变大,对脱钩促进作用逐渐变强。2020—2022 年,能源结构效应对脱钩贡献值虽然仍为负数,但数值绝对值变小,对脱钩促进作用变小。

进一步通过表 4 可以看出,能源结构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率为 -11%,数值较小,抑制

二氧化碳排放作用较弱。根据各能源消费量得到能源消费占比见表 6。从表 6 可以看出,煤炭能源的消耗占比呈下降趋势,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占比有所提升,但主要能源消耗仍以汽油、柴油为主,能源消耗占比达到 70%以上。因此,能源结构效应抑制了碳排放,意味着河北省物流业正在从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向天然气、电力等低碳能源转变。但 2020—2022 年能源结构效应对脱钩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柴油、汽油消耗比例上升,电力、天然气消耗比例下降。河北省物流业应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引入节能技术和设备,提升清洁能源占比。

表 6 2006—2022 年河北省物流业各类能源消费量占比情况

%

年份	原煤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电力
2006	4.43	26.45	0.56	61.23	0.09	0.01	0.66	6.58
2007	4.43	20.18	0.55	67.52	0.08	0.01	0.66	6.57
2008	3.36	18.85	0.56	62.98	0.86	0.04	1.21	12.14
2009	3.01	15.58	0.46	53.16	0.74	0.03	2.46	24.56
2010	3.00	14.95	0.46	53.31	1.29	0.03	2.45	24.50
2011	2.39	12.86	0.48	50.43	1.18	0.03	2.97	29.66
2012	2.25	10.93	0.43	43.73	1.06	0.03	3.78	37.80
2013	1.73	9.85	1.31	40.33	1.94	0.28	4.05	40.51
2014	1.75	7.84	1.59	46.62	1.13	0.28	3.71	37.09
2015	1.66	8.26	0.56	43.75	1.73	0.06	4.00	39.98
2016	0.45	7.23	2.41	43.07	1.54	0.01	4.12	41.18
2017	0.33	7.72	2.63	37.63	1.77	0.11	4.53	45.28
2018	0.35	9.63	2.79	32.35	9.93	0.25	4.06	40.62
2019	0.09	4.11	2.06	23.05	5.67	0.00	5.91	59.12
2020	0.03	7.35	2.42	54.90	2.31	0.01	3.00	29.98
2021	0.00	11.09	1.53	51.37	2.19	0.00	3.07	30.74
2022	0.00	13.31	1.83	58.23	2.63	0.00	3.64	20.36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202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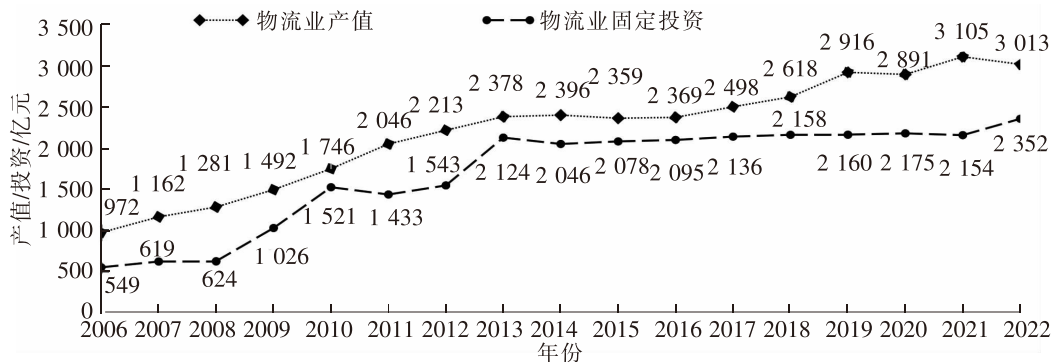
2. 能源强度效应分析

能源强度效应表示单位产值消耗的能源量,反映了能源利用效率。

从表 5 可以看出,2006—2017 年能源强度效应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的脱钩贡献值大多数年份为负值,能源强度效应促进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但 2017—2022 年能源强度效应对脱钩贡献值以正值为主,抑制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

进一步可以看出(见表 4),能源强度效应对河北省碳排放的贡献率为 -126% ,对碳排放起到明显抑制作用。但从图 2 可以看出,2019—2022 年的物流业产值也出现了波动和下降,因此,这一阶段能源强度效应对河北省物流业脱钩表现出抑

制作用。2006—2012 年,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贡献值呈上升趋势,即能源强度效应对二氧化碳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不断降低,在这一阶段,河北省物流业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物流运作方式较为传统,以粗放式为主。2012—2022 年,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贡献值波动较大,这一阶段各部门相继出台了很多关于物流业发展的政策、规划等,促进了绿色物流、智慧物流技术的发展和物流业管理体系的改革。2019—2021 年,能源强度贡献值出现波动,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效应对降低碳排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河北省物流业应该加大科技投入,采用智能化的路线规划和调度系统,合理规划运输路径和车辆配置,降低能源强度。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2007—2019 年)、《河北统计年鉴》(2020—2023 年)。

图 2 2006—2021 年河北省物流业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

3. 运输结构效应分析

运输结构效应是指各运输方式的货物运输量与总货物运输量的比值。

从表 5 可以看出,运输结构效应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贡献值多数年份为负值,尤其是 2019—2022 年,运输结构效应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大。因此,运输结构效应是促进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最主要的因素。

进一步从表 4 可以看出,运输结构效应对河北省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率为 5%,促进二氧化碳排放作用非常有限。在 2006—2018 年贡献值多为负值,抑制了二氧化碳排放;2018—2022 年多数年份为正值,且贡献值较大,明显促进了二氧化碳排放。清洁能源的推广和应用受到一定限

制,加剧了碳排放。根据各运输方式货运量占比得到运输结构见表 7。从表 7 可知,河北省主要以铁路和公路运输为主,公路运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公路运输占比在 2006—2018 年逐年增加,2018—2022 年逐年下降;铁路货运量则呈现了先降后升的趋势,在 2006—2018 年逐年降低,2018—2022 年逐年上升。原因是运输结构的调整和多式联运的发展,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为主攻方向。未来可以通过运输结构调整,采用多种运输方式的联合运输,使用环保型交通工具来实现碳减排。

表 7 2005—2022 年河北省各运输方式货运量及占比

年份	货运量/万吨	铁路/%	公路/%	水运/%	民航/%
2006	96 784	20.30	75.70	2.87	0.000 9
2007	104 188	20.08	76.61	2.08	0.000 7
2008	111 383	21.37	75.85	1.58	0.000 9
2009	136 804	20.69	77.87	0.74	0.000 8
2010	177 308	21.41	76.67	1.21	0.000 9
2011	212 330	19.63	78.50	1.26	0.001 0
2012	242 886	17.88	80.50	1.07	0.001 0
2013	277 840	17.88	80.74	0.91	0.000 9
2014	238 749	20.13	77.61	1.69	0.001 1
2015	199 192	8.96	88.17	2.28	0.001 3
2016	210 994	7.73	89.97	2.11	0.001 1
2017	229 211	7.46	90.44	1.93	0.000 9
2018	249 650	7.84	90.66	1.34	0.000 9
2019	242 866	11.04	87.07	1.71	0.001 1
2020	247 783	12.43	85.54	1.85	0.002 3
2021	269 586	10.83	84.28	1.78	0.000 6
2022	240 636	12.56	81.75	2.16	0.000 8

4. 资金投入效应分析

资金投入效应是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物流业产值的比值,反映了物流业的投资依赖。

通过表 5 可以看出,资金投入效应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贡献值大多数年份为负值,资金投入效应是促进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原因之一,同时资金投入效应对碳排放也起到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资金投入在促进碳排放的同时,对物流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进一步从表 4 可以看出,资金投入效应对河北省碳排放的贡献率为 32%,促进了碳排放。2006—2016 年,资金投入效应对碳排放贡献值有正有负,而 2016—2022 年,资金投入效应多为负

值,抑制了碳排放。从图 2 可以看出,2006—2016 年物流业固定投资呈波动上升趋势,物流业产值也呈上升趋势,但 2016 年以后物流业固定投资基本不变,甚至在 2021 年略微下降,但物流业产值仍然呈上升趋势,表明 2016 年以前,物流业产值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较高,且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而 2016 年以后物流业产值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减小,并且对碳排放也起到了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是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 年)》,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整,推动了物流业降本增效,对物流业碳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因此,加快推动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引入节能环保设备,加快

供给侧结构改革可以降低碳排放,促进物流业碳排放脱钩。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状态和驱动因素以及各驱动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贡献值。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总量与物流业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柴油、汽油仍然是物流消耗的主要能源,且占能源消耗比例不断增加,不利于物流业低碳转型。

第二,2006—2022年河北省物流业以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为主,波动较大。其中,2006—2012年河北省物流业主要呈现弱脱钩和增长脱钩状态,原因是当时物流业发展方式比较粗放;2012—2019年出现了两次强脱钩和一次弱脱钩,原因是近几年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推广清洁能源;2019—2022年出现衰弱脱钩和扩张性负脱钩,原因是物流业产值出现了波动和下降。以上表明河北省物流业与实现强脱钩还有较大差距。

第三,从各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的贡献值来看,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运输结构和资金投入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有明显抑制作用,资金投入对碳排放有明显促进作用,运输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作用比较有限。

第四,从各因素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贡献值来看,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资金投入可以促进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能源强度在

2017年以前多数年份为负值,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具有促进作用,但2017—2022年多数年份为正值,对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具有阻碍作用,运输结构对脱钩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为促进河北省物流业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能源结构。河北省物流业主要能源消耗仍以汽油、柴油为主,河北省物流业应该多使用天然气、太阳能、电力等清洁能源;政府可以制定政策,提供清洁能源使用的激励措施,例如税收优惠、补贴政策等,以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推动物流业向清洁能源转型。

第二,提升能源效率。在推动河北省物流业发展的同时引入节能技术和设备,包括节能型运输工具、智能调控系统和能源回收利用技术等;物流企业应加强对运输车辆和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确保其高效运行,减少能源浪费。

第三,调整运输结构。运输结构是河北省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的关键因素,河北省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既环渤海又紧邻北京和天津,位于华北的中心,还有秦皇岛港等港口,因此应该结合区位优势发展多式联运,通过建立智能调度系统优化路线,选择最优的运输方式来降低碳排放。

第四,合理分配物流业投资。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河北省物流业降本增效。把更多资金用于支持低碳物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如新型电动车辆、智能物流管理系统等,降低物流活动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政府应该推广物流环保节能的技术,鼓励物流企业采用新型的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降低碳排放,促进物流行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杨小辉.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4): 10-17.
- [2]刘敬严,赵莉琴. 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析:以京津冀为例[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4): 1-9.
- [3]马越越,王维国. 中国物流业碳排放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MDI分解技术[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3(10): 31-42.
- [4]赵松岭,杨子夜. 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量测算及低碳协同发展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 2019, 35(10): 42-45.
- [5]庞欣玥,仲云云.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碳排放的脱钩及影响因素研究[J]. 物流科技, 2022, 45(10): 63-66, 75.
- [6]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 Transport Policy, 2005, 12(2): 137-151.
- [7]孙耀华,李忠民. 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5):

- 87-92.
- [8] FANY J, QU J S, ZHANG H F, et al.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five north west provinces[J]. Ecological economy, 2019, 35(9): 32-37, 67.
- [9] ZHOU A, WU K Y. Driving factors analysis of traffic carbon mission Shanghai[J]. 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2020, 43(2): 264-269.
- [10] KA Y A. Impac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GNP growth. Interpretation of proposed scenarios [R]. Paris: Presentation to the Energy and Industry Subgroup, Response strategies working Group, IPCC, 1989.
- [11] 张文龙. 基于 LMDI 模型的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脱钩研究[D]. 天津: 天津理工大学, 2016.
- [12] 穆晓央, 王力, 徐蓉, 等. 西部省域物流业碳排放脱钩及影响因素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20, 43(4): 214-219.
- [13] 刘渝, 李莱. 中国各省物流业碳排放的脱钩及影响因素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8, 41(5): 177-181.
- [14] 陈莉, 谭俊华. 我国物流业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及其驱动要素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3): 98-102.
- [15] ANG B W. Decomposition analysis for policymaking in energy: which is the preferred method? [J]. Energy policy, 2004, 32(9): 1131-1139.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 Decoupling and Driving Factors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ZHOU Ying, HU Tianmei

(School of Managemen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Analyzing the decoupling effect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s beneficial for allevia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progr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decoupling status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22 by using TAPIO model, and analyzed the decoupling driving factors by using KAYA-LMDI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carbon emissions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basically the same. From 2006 to 2019,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show a trend of fluctuating growth, and from 2019 to 2022, the carbon emissions fluctuate and decrease. (2) About the carbon emissions decoupling state, From 2006 to 2022, it is mainly weak decoupling and negative decoupling of expansion, which fluctuates greatly. (3) About the Driving factors Energy 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and capital investment promote the of carbon emissions decoupling and economic growth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Among them, the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plays a key role in decoupling. The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promotes the decoupling of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7, and hinders the decoupling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2017—2022.

Key words: Hebei province; logistics industry; carbon emissions; decoupling effect; driving factors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18-10

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综述

——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姚小菊, 武琼

(石家庄铁道大学 财务处,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业保险补贴作为财政支农的政策手段,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则关系着该资金的使用效率,并衡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在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户利益、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以中国知网收录的386篇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对文献的发文趋势、机构共现、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聚类等信息进行剖析,深入探究该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以及前沿发展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受时代政策、地区因素影响,政策数量和文献发表数呈正相关性;其研究热点集中在绩效、购买意愿、补贴金额和交易成本四方面,研究范围仍需扩大;研究的前沿方向集中在乡村振兴和效率两个方面,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

关键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CiteSpace;共现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03

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的第一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工作的重点,自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20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尤其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对农业工作的支持力度逐渐增大,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了接下来的目标和任务。随着各项农业利好政策的出台,2013—2022年10年间农业总产值由93173.70亿元增长至156065.94亿元,增长约1.67倍,农业经济也不断蓬勃发展;伴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好态势,农业保险呈蓬勃的发展态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策,农业保险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分散风险、降低损失的作用,是保障我国“三农”的重要策略和方法,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做法之一^[1],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体制机制日趋完善,保险保费规模快速增长,保障面也不断扩大,2022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1192亿元,突破千亿元,同比增长23%,从2020年至2023年连续4年保持全球第一。其中,中央财政拨付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434.53亿元,同比增长30.3%。财政补贴资金是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重要来源,占保费收入的比例近75%,是农业保险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动因。2019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财政条件允许的地方政府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拓宽财

收稿日期:2024-06-14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提升的对策研究”(HB23ZT056)

作者简介:姚小菊(1971—),女,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教育成本、绩效管理。

本文信息:姚小菊,武琼.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综述——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18-27.

政补贴险种;2021年底,财政部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对原办法进行修订,优化原有的补贴政策,使其在整体上更符合规范。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大,我国也逐渐向农业保险强国迈进,相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也不断涌现。目前学者对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特定地区,陈香忆^[2]通过DEA方法测算了北京市农业保险补贴的效率,分析影响补贴效率的因素,认为费率、补贴比例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效率;王超^[3]分析了安徽省9年间的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认为与全国水平相比,安徽省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一是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缺陷,二是财政补贴和保费收入整体规模;胡子坤等^[4]也对安徽省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耦合分析,认为安徽省引进保险支持政策促进了农业保险服务的发展。也有学者从全国角度对补贴资金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邓美君^[5]对我国30个省份的农业保险补贴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发现存在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各地区补贴资金绩效存在差异等问题,认为影响因素为地区差异及农业保险供给主体。还有学者从政策演进角度进行研究,曹翀^[6]通过分析农业保险补贴制度的演进,认为在制度政策的支持下,农业保险处于迅速扩张期时,有关补贴资金的研究重心开始由补贴资金的必要性转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果;郑军等^[7]通过梳理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历史演变趋势,认为保费补贴政策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是在地区经济水平的限制下拉低了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

由前述学者的研究可知,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农业保险作用的发挥。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提升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的对策,通过分析目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现状,了解当前研究热点,预测未来的研究前沿,在理论方面剖析影响农业保险补贴绩效的因素,为政策的创新和优化提供依据;为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保障护航作用。因此,如何使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得到进一步提升,更大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处理

CiteSpace 软件是基于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背景开发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可将某一领域复杂繁多的文献合集数据转化为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可视化图谱将关键字、机构等关键信息显现,并识别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8],也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综述等方面。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 软件对源自中国知网(CNKI)的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相关文献进行数据处理,并构建知识图谱,通过对图谱的多方面解读,揭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现状,并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势,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

为有效获取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农业保险”“补贴”“绩效”为主题,时间范围选定在2003—2023年,检索后获得初始研究数据,经过筛选无效文献后获得386篇样本文献,并以Refworks格式导出。首先将所获文献导入CiteSpace 软件进行格式转换,并将转化后的文献数据以合适格式导入CiteSpace 软件以备分析。在设置时间范围时,为保持与数据来源的一致性,设置为2003—2023年,为提高图像可读性,将时间分区设置为5;在pruning(网络修剪)中勾选pruning sliced networks(修剪切片网络)选项,以简化网络枝条并提高可阅读性;node types(节点类型)分别选择institution(机构)和keyword(关键字)进行研究发现,其他选项保持默认设置。

三、研究现状分析

(一)研究文献发文趋势分析

图1描述了研究文献2003—2023年的发文趋势,可以从图1中看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领域的文献发文趋势和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基本趋同。2003—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处于起步阶段,农业保险的发展前景尚不明朗,但是2004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拉开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序幕,在这期间,开始陆续有学者对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进行研究;2007—2012年农业保险处于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

费补贴力度。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等要求,不断探索优化农业保险补贴。因此,在国家大政策的支持下,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篇数较上一阶段有明显提升;2013—2019 年农业保险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图 1 可以看出,2016 年和 2019 年文献发表篇数均超过 30 篇,其原因在于财政部分别在 2015 年底和 2016 年发布《关于加大对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通知》和《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并在办法中规定了补贴险种标的与保费补贴比例,提倡对地方特色险种给予保费补贴;

2019 年则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地方政府提升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扩展财政补贴险种范围,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促进了学者对这一领域资金绩效的研究;2020 年至今,农业保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关研究基本趋于平缓,但仍受相关政策出台的影响,如 2021 年底,财政部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全面优化、规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导致 2022 年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篇数显著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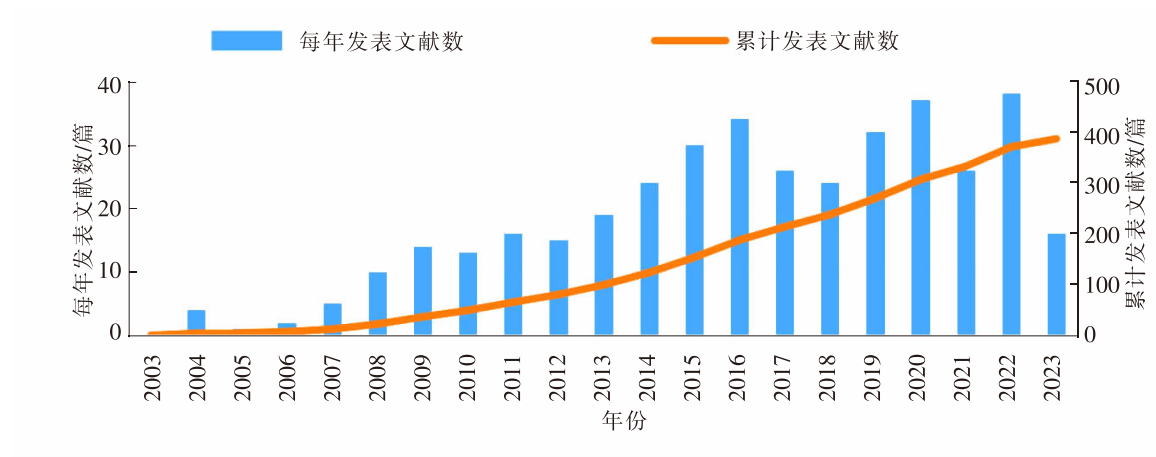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文献发文趋势

(二) 机构共现分析

研究文献的发文趋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的发展状况。通过分析发文机构的共现情况,可以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进而了解研究的分布格局。

图 2 是通过 CiteSpace 软件得出的机构共现分析图,可以看出,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发表文献数量较多的单位分别是西南财经大学(25 篇)、华中农业大学(8 篇)、西南大学(7 篇)、中国农业科学院(7 篇)、四川农业大学(7 篇)、吉林大学(7 篇)、内蒙古大学(7 篇)、安徽财经大学(7 篇)等,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财经类及农科类高校,而这些机构也多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这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有关,《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中规定,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种植业财政补贴险种的保费补贴为 45%,东部地区补贴则为 35%,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差异造成了研究机构分布的差异^[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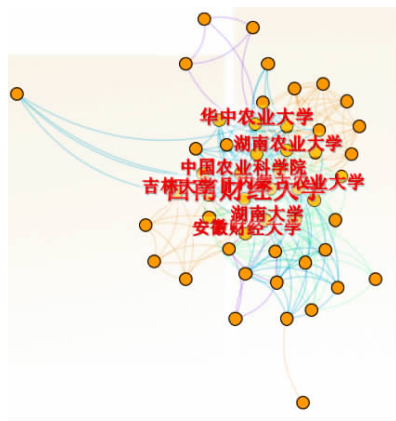


图 2 机构共现分析图

(三) 学科领域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的可视化数据统计,研究文献的学科领域分布较为广泛(见图 3),关于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保险、农业经济管理、金融学(含:保险学)、财政与税收等学科。在保险学科中,关于农业保险补贴绩效评价的研究较为集中;而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大多从政策补贴的角度去研究;在金融学、财政与

税收等学科,关于绩效评价与财政补贴的研究均有涉及,说明以绩效评价和财政补贴为研究方面

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在各个学科研究领域均为重点研究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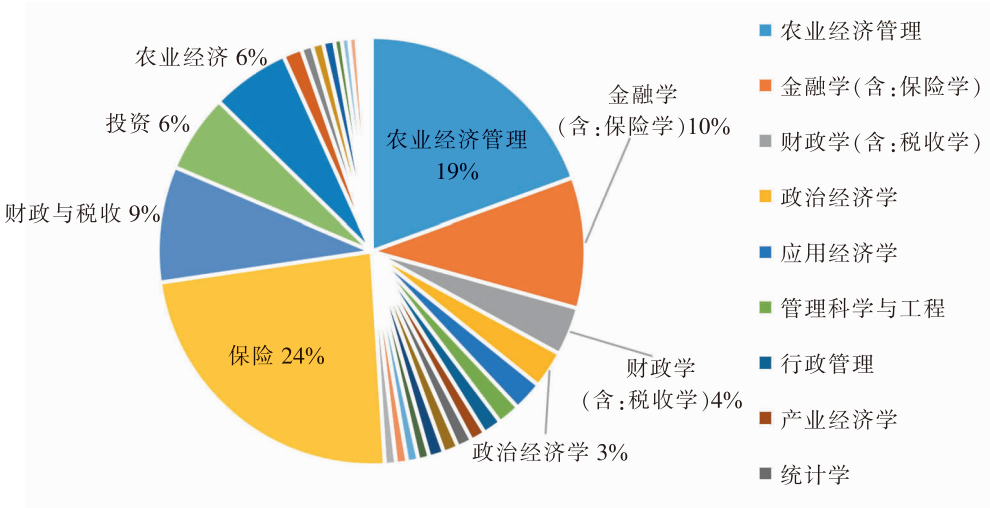


图 3 研究文献学科分布

四、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文献的核心词汇和准确提炼,通常也是研究学者收集某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渠道^[10],因此可以通过关键词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要点及热点^[11]。CiteSpace 软件可以对一组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该关键词在这组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通过 CiteSpace 软件统计得到研究文献中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频次,并去除中心性为 0 的关键词,结果如表 1 所示。频次为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中心性代表该关键词的重要程度,通常认为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为重要关键词^[12]。

在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中,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包括农业保险、影响因素、农户、财政补贴、农村金融、农业政策。这表明财政补贴是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关注的热点,并且进一步扩展到“制度变迁”“乡村振兴”“财政支农”等热点领域;在出现频次方面,除“农业保险”之外频次较多的关键词分别是绩效评价、财政补贴、保费补贴、影响因素等,说明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从绩效评价、财政补贴等方面开展,并通过对影响因素、效率、制度变迁等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上述关键词的研究。表中的其他关键词显示,乡村振兴、财政支农、返贫困等关键词是围绕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开展的,而经营绩效、绩效分析、粮食生产等则是集中于农业保险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

究,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始终围绕在农业保险绩效、国家政策法规方面开展。尽管目前的研究热点数量较之前年度有所增长,但研究方向及内容仍然较为局限,集中在一到两个主要方面。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包括更广泛的议题和研究视角,以丰富和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表 1 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农业保险	91	0.45
2	绩效评价	39	0.02
3	财政补贴	38	0.15
4	绩效	19	0.05
5	保费补贴	15	0.05
6	影响因素	11	0.22
7	效率	7	0.01
8	农户	7	0.16
9	农业补贴	7	0.06
10	家庭农场	6	0.04
11	农村金融	6	0.11
12	制度变迁	6	0.01
13	经营绩效	6	0.06
14	精准扶贫	6	0.02
15	乡村振兴	5	0.01
16	四川省	5	0.04
17	政策建议	5	0.03
18	财政支农	5	0.02
19	绩效分析	4	0.02
20	农业政策	4	0.11
21	创新	4	0.03
22	返贫困	4	0.01
23	粮食生产	4	0.01
24	政策优化	4	0.01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通过汇聚关系紧密的关键词来确定该研究领域的主题结构。通过 CiteSpace 对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到关键词聚

类图,如图 4 所示。其中右上角的 Silhouette(聚类平均轮廓值)为 0.875 8,一般认为 S 值 >0.5 时,聚类是合理可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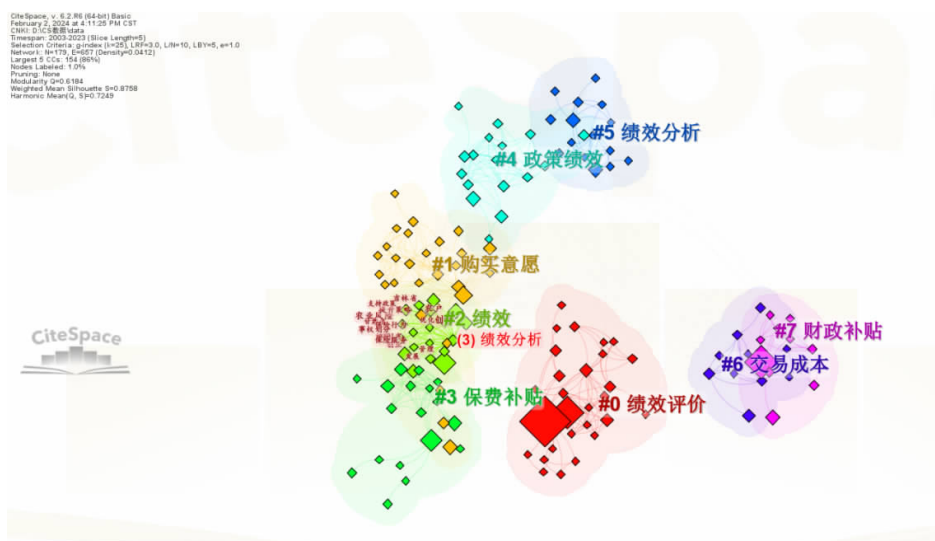


图 4 关键词聚类分析

由图 4 可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文献关键词分为 8 个聚类,分别为 #0 绩效评价、#1 购买意愿、#2 绩效、#3 保费补贴、#4 政策绩效、#5 绩效分析、#6 交易成本、#7 财政补贴。这 8 个关键词聚类数字序号越小说明包含的关键词越多,该聚类的重要程度越大。从关键词聚类图显示来看,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领域热点可以分为以下 4 类:

1. 绩效相关内容

(1)绩效评价。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评价的体系构建,以及优化改进评价算法。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大多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入手,进而选取评价方法,得出绩效评价结果。尤晓静等^[13]通过熵权-TOPSIS 方法,以保障水平指标、减贫能力指标等为一级指标构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评价体系;刘晓旭^[14]基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使用 DEA 模型、Malmquist 指数等方法设计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财政支农支出领域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卢清昌等^[15]对 A 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分析,指出目前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2)绩效。该部分聚类研究主要是从支持政策和提升策略两方面开展。在支持政策方面,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可以扩大农户参保面积,降低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提高农业保险效率;

也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会对农业保险产生抑制效应,农户可能会优先选择补贴较大的种植种类,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不利于农业发展^[16]。展凯等^[17]利用 FGT 贫困指数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发现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减贫效应较为明显,但减贫效应在不同地区因经济水平的差异呈现区域异质性;尤晓静等^[13]利用构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评价体系,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会削弱农业保险对偏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防范能力。在提升策略方面,大多从完善保险设计、完善补贴政策、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展开;张祖荣^[18]通过研究认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利用效率较低,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业保险赔付率过低,提出要规范制定保险费率,可以真实反映保险水平;文希孟^[19]提出要完善农业补贴财政资金调度,可以由中央统一支出,并根据各地区需求进行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以减少地区间补贴不均衡现象;李丹等^[20]认为可以通过“向内监察”和“向外公开”的方式加强监管,通过向内和向外两方面加强监管力度,促进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提升。

(3)政策绩效。有关政策绩效的研究主要是对政策绩效进行评价、评估,并分析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可能会对农业产生的相关影响。王立勇等^[21]借助多期 DID、连续型 DID 和三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对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分

析,认为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且提升了参加农业保险数量,促进了农业保险发展;柳耀坤^[22]在粮食安全的视角下认为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绩效对我国粮食产量有正相关关系,可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4)绩效分析。对于绩效分析,学者大多是对各个地区的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进行研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给出建议。孙阳阳^[23]对云南省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进行 DEA 分析,发现云南省各地市的绩效水平有所差异,发现财产保险对绩效有正向影响,对经济发展则起到负面影响;王开心^[24]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的差异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农户生产水平和保险市场发展水平是影响绩效的三大因素,并提出建立多层次财政补贴体系减少市域间的差异。

2. 购买意愿

该聚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因素开展,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高低是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重要原因,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提高,可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间接提升补贴资金的绩效水平,从而使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关系实现稳定发展;林乐芬等^[25]通过对农户认知、农户经营特征等进行分析,研究农户购买保险的意愿对高效种植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影响程度,发现农户身份、家庭对农业生产依赖程度是影响高效种植业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评价的最主要因素;杨旭^[26]分析了险种保额、费率、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等因素,以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户购买农险的意愿及农业保险的效果和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

3. 保险补贴资金相关内容

(1)保费补贴资金。学者对保费补贴的研究较为宽泛,研究对象为保费补贴额度、最优补贴率、央地分担比率等。关于最优补贴率,邹新阳等^[27]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出中西东部三地区三大粮食作物的保险保费补贴率,认为我国现行的保费补贴率总体上是合理的,利于提高补贴资金绩效。也有学者从保费补贴的作用入手,宋长鸣等^[28]发现补贴政策是利用市场化手段间接控制农业风险,缓解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充分发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作用,提升使用绩效。整体看来,保费补贴对于提高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资

金的绩效整体呈正向影响。

(2)财政补贴资金。学者对财政补贴的研究大多是分析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造成的影响。郑军等^[29]认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提升补贴资金使用绩效,维护我国规模农业的发展;江生忠等^[30]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对三大主粮作物种植结构进行分析,发现财政补贴政策可以起到优化调整种植业结构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投保作物的种植面积,从侧面提升补贴资金绩效;郑军等^[31]认为需要制定合理的财政补贴比例来促进“中央+地方+农户”补贴机制的长效性,进一步提升补贴资金的绩效水平。

4. 交易成本

首先在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定义方面,周周杰^[32]认为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可以分为显性交易成本和隐性交易成本,其中显性交易成本是指可以被量化的保险人的直接成本和制作成本,而隐性交易成本是指难以被量化计量的投保人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如信息沟通成本;对于交易成本与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之间的关系,杨卫军等^[33]认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是降低农业保险供需双方交易成本有效手段,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参保农户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相同成效,从而提升补贴资金的绩效;欧阳青东等^[34]同样认为农业保险补贴可以促使交易成本回归正常范围,解决交易成本过低造成的供需矛盾,提高补贴资金绩效水平。

(二)研究前沿分析

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选择 Timeline View(时间线视图),得到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图谱(图5)。时间轴图谱从时间维度显示关键词的首次出现时间及持续时间,将不同关键词聚类中所含的关键词按照时间轴的形式平铺,更直观地显示研究关键字随时间的变迁与演化,明确研究热点的变化演进状况^[35]。横轴代表该关键词聚类,左端对应的时间点对应该关键词聚类的显现时间,横轴上的菱形方块表示该聚类内研究的关键词,菱形的大小表示时间跨度^[36],且一般认为 Timeline 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Q 大于 0.3,聚类的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S 大于 0.5,代表聚类结构显著并且可以信任,图 5 中 $Q = 0.6184$, $S = 0.7249$,说明该时间线视图是可信任的。

从图 5 可以看出,关键词共现 Timeline 视图共被分为 8 个被引集群,“#0 绩效评价”是最先

出现的关键词,且时间跨度最长,至今仍是一个研究热点,它以农业政策、农业保险为核心,逐渐向政府补贴和绩效分析等领域扩展,并逐渐和其他集群有所交集;之后“#2 绩效”“#5 绩效分析”是建立在该聚类基础上,并不断细化拓展出如对策建议、绩效分析、农村金融等小的研究热点;随着研究聚类的细化,“#1 购买意愿”“#6 交易成本”随之出现;随着近几年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

法规政策陆续出台,“#3 保费补贴”“#4 政策绩效”作为研究前沿和热点一致持续至今。顶端的小菱形方块代表在该被引集群中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且时间跨度较短,是近些年新出现的,说明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评价、保费补贴和政策绩效是近些年一直出现的新研究热点,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和青睐,有成为之后研究前沿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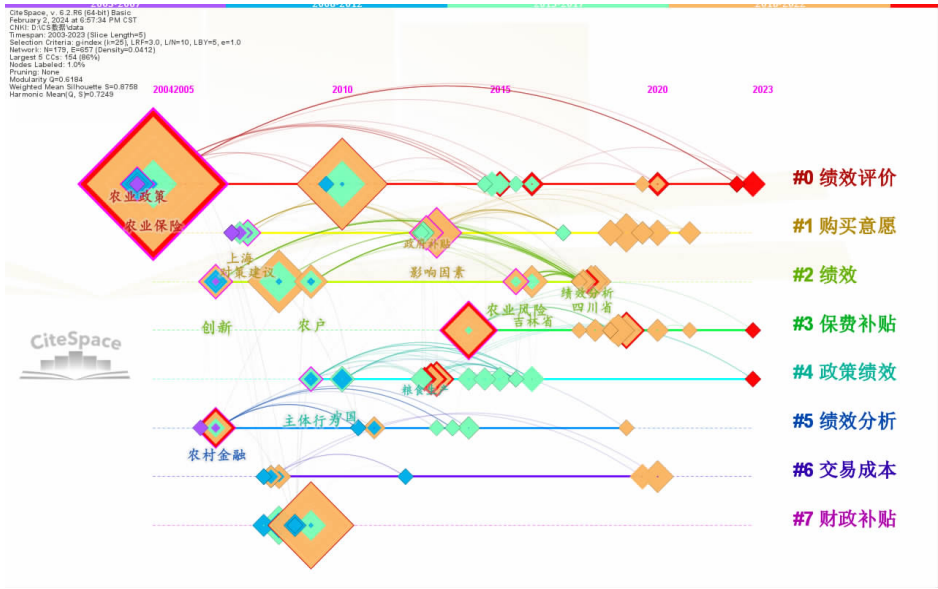


图 5 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图谱

关键词突显分析通过探测特定时间段内引用频率显著变化的关键词,揭示新兴趋势和衰落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显示关键词研究热度持续时间、当前研究热点,以及推测未来研究方向。在 CiteSpace 软件中得到关键词突显图表(图 6),得

到 13 个突显词,及其突显强度和起始时间。图 6 中“Strength”代表关键词突显强度;“Begin”“End”分别代表关键词突显成为热点起、止时间,图 6 中浅色线条表示突显词出现及持续时长,深色线条表示突显词成为研究热点及持续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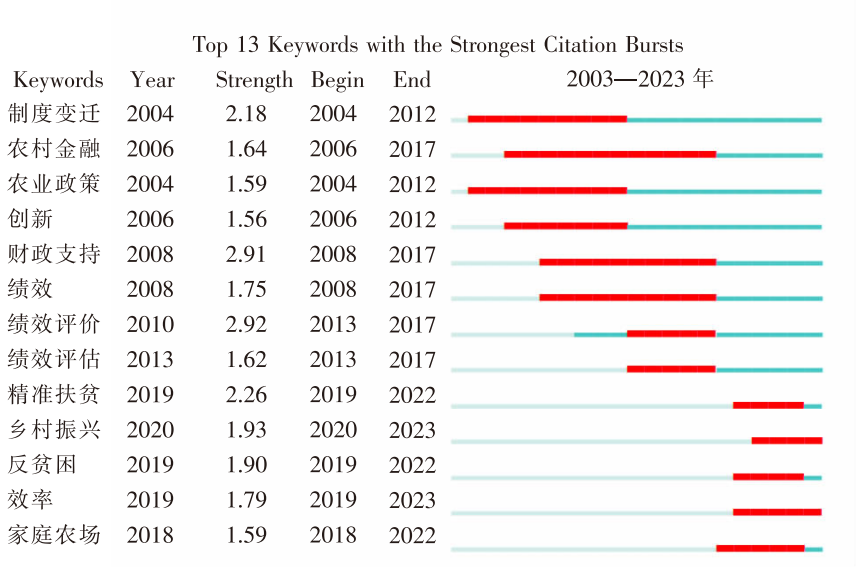


图 6 突显词图表

从突显词的起始时间来看,13个突显词的持续时间最短的仅为3年,最长的“农村金融”则跨越11年,次之的“财政支持”“绩效”持续9个年度,说明学者一直保持对这3个突显词的相关研究及探索;从突显词的终止时间来看,“乡村振兴”“效率”这2个突显词终止于2023年,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仍可能持续下去,逐渐演变为新的研究前沿;从起始时间来看,各项政策的出台时间和成为突显词的起始时间是有一定间隔的,精准扶贫政策于2015年提出,2019年成为突显热点;乡村振兴政策于2017年提出,2020年成为突显热点;反贫困于2018年提出,2019年成为突显热点。说明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相关研究热点随着国家政策出现,虽然存在滞后现象,但是紧贴实际情况,这种现象也可以为之后预测研究前沿提供方向。

从图6中还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演进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2012年,研究热点多聚焦于农业政策及制度,出现了“制度变迁”“农业政策”“创新”等突显词,究其原因,2004年我国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并逐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此阶段重点关注外部政策条件,很少将研究聚焦于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本身,但是,仅依靠外部因素的发展是不够的,因此下一阶段将研究热点更多地对准了绩效。第二阶段处于2013—2019年,“绩效评价”“绩效评估”成为研究热点,“财政支持”“绩效”横跨这两阶段,持续作为研究热点。在这一阶段,突显强度最强的两个研究热点分别为“财政支持”和“绩效评价”,在国家政策法规逐渐完善的情况下,研究者将研究焦点逐渐转向绩效,并将两者结合分析,在现有政策下如何发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最大效果,提升补贴资金的绩效。2019年之后,对于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趋向精细化,在2019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的通知》《2019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法规的背景下,“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反贫困”“效率”成为研究热点。其中“乡村振兴”“效率”作为研究热点一直持续至今,代表研究者逐渐将具体政策和绩效研究相结合,尝试不同政策背景下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相关研究,研究由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更注重政策和农业保险

补贴资金绩效的综合性研究。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乡村振兴和效率研究成为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前沿。

五、总结与展望

(一)总结

目前国内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趋势和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基本趋同,都可分为4个阶段:起步阶段、探索阶段、高速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也随之更新,从外部环境到补贴资金绩效再到国家政策,但是始终围绕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相关的内容开展研究,未出现偏离情况。研究热点可以反映当前研究的进度及前沿观点,根据前述内容,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绩效,部分学者主要从绩效评价、政策绩效、绩效分析等进行研究,认为地区差异、补贴政策、保险费率等是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原因;第二方面是购买意愿,学者通过研究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与补贴资金绩效的关联,发现购买意愿的高低影响补贴资金绩效;第三方面是补贴资金,学者对该热点进行研究并发现补贴资金的提高对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有正向影响;第四方面是交易成本,学者发现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补贴资金绩效。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影响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因素,并衡量其影响程度,进一步优化相关条件,提升补贴资金绩效。

(二)展望

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在持续吸引着学者的关注,也涌现出很多的研究成果,同时仍有许多值得深化研究的问题。

1. 研究者呈现明显的机构差异

研究者大多数集中在财经类及农科类高校,研究院、农业服务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者较少,这就导致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开展,和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如对影响补贴绩效的因素研究,高校的研究者会从补贴金额、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入手,服务中心的研究者则从再植成本、保险内容等微观方面开展研究。在之后的研究中,应多鼓励、支持在农业一线的研究机构开展活动,拓宽研究的视角,使研究议题更

广泛。

2. 研究呈现地区差异

其差异主要表现为政策规定中农业保险补贴越高的地区,有关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也越多。这就导致研究的成果和建议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对其他地区产生的借鉴意义较弱,不能被广泛应用。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应避免地区因素的影响,扩大研究地区,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使研究成果对各地区均有参考意义。

3. 研究应紧贴国家政策背景,把握研究的前沿方向

结合前文内容可见,目前的研究前沿和国家最新发布政策紧密相关,如“乡村振兴”战略。要以“乡村振兴”政策为研究的大背景,结合实际情况,细化研究内容,为进一步创新和优化补贴资金绩效提供支持,提升绩效水平。

因此,未来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的研究也要不断深化、优化,加强对研究的细化程度,使研究更加贴合实际,更具有普适性,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绩效,发挥其最大作用,促进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蓝秋彤,韦启陈,石保纬,等. 农业保险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基于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的可视化研究[J]. 江西农业学报,2023,35(11):235-246.
- [2]陈香忆. 北京市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D].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21.
- [3]王超. 安徽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22.
- [4]胡子坤,张浩. 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耦合协调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4):18-26.
- [5]邓美君.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广州:广东财经大学,2022.
- [6]曹翀. 农业保险补贴研究综述:基于制度演进的视角[J]. 铜陵学院学报,2024,23(2):47-51.
- [7]郑军,朱京.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4(1):11-16.
- [8]李杰,陈超美.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 2 版.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 [9]廖翠程,骆亚卓,陈远泽. 基于 CiteSpace 的工程项目绩效研究综述[J]. 建筑经济,2022,43(S1):384-389.
- [10]陈良敏,张伟伟.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36(12):192-204.
- [11]窦金花,张彬蕊,钱晓松. 人工智能赋能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包装工程,2023,44(14):1-20.
- [12]罗振武. 基于 CiteSpace 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研究可视化分析[J]. 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23,37(2):41-47.
- [13]尤晓静,朱振华,徐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J]. 江苏农业科学,2022,50(17):301-307.
- [14]刘晓旭. 中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绩效评价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23.
- [15]卢清昌,夏宜,谢雪. A 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评价[J]. 经济研究导刊,2022(20):75-77.
- [16]杨鸣莺. 河南省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研究[D]. 郑州:郑州大学,2019.
- [17]展凯,朱少芬,邓超,等.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5):42-49.
- [18]张祖荣.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利用效率研究[J]. 甘肃社会科学,2020(2):179-184.
- [19]文希孟. 财政补贴与农业保险协调作用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分析[J]. 现代农业研究,2023,29(5):32-36.
- [20]李丹,魏帅.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探究:基于财政补贴、市场竞争、产品管理视角[J]. 理论探讨,2021(1):105-111.
- [21]王立勇,房鸿宇,谢付正. 中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绩效评估:来自多期 DID 的经验证据[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9):24-34.
- [22]柳耀坤. 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绩效评估研究[D]. 吉林:吉林财经大学,2023.
- [23]孙阳阳. 云南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绩效分析[D]. 昆明:云南大学,2023.
- [24]王开心. 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绩效差异分析[D]. 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4.
- [25]林乐芬,李远孝. 高效种植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5):98-109.
- [26]杨旭. 宁波市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D]. 宁波:宁波大学,2018.
- [27]邹新阳,范莉.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的最优补贴率研究:基于激励与约束机制[J]. 保险研究,2021(8):3-17.

- [28]宋长鸣,赵方潇,韩梦娟.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是否缓解了农产品市场风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43(4):598-605.
- [29]郑军,周宇轩.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财政补贴制度创新:基于“农业经营主体—保险公司—政府”的博弈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17(5):61-71.
- [30]江生忠,付爽,李文中.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能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吗?:来自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保险研究,2022(6):51-66.
- [31]郑军,杨柳.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比较及政策启示[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1):1-7.
- [32]周文杰.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实证研究:基于交易成本角度[J].财政研究,2015(1):67-71.
- [33]杨卫军,郭晨阳.农业保险的低水平均衡:交易费用及外部性视角的分析[J].农村经济,2010(1):82-85.
- [34]欧阳青东,王聪.农业保险供给与制度创新:以交易成本为视角[J].南方金融,2008(7):41-43,46.
- [35]陈良敏,张伟伟.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12):192-204.
- [36]王雪荣,侯伟龙.大数据审计研究综述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J].会计之友,2021(23):78-86.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ubsidies: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YAO Xiaoju, WU Qiong

(Department of Financ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ubsidies serve as a policy tool for fiscal support to agriculture. Their performance is related to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the funds and measures whether the expected goals have been achieved.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persing agricultural risks,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Taking 386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ubsidy performance literatures collected by CNKI as sample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publication trends, institutional co-occurrence,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keyword clustering of the literature, an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hotspots, and cutting-edg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is research field in depth.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ubsidies is influenced by the policies of the times and regional factors,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policies and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concentrated in four aspects, namely, performance, purchasing willingness, subsidy amount and transaction cost, and the scope of research still needs to be expanded. The frontier direction of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sp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which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national polici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ubsidies; performance; CiteSpace; co-occurrence analysis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28-07

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产生机制及治理路径

——以安徽省阜南县 W 镇为例

宁佳, 李韬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乡镇干部承担着提供服务、处理矛盾、协调冲突和化解风险的重大职责,但近年来,部分乡镇干部表现出“躺平”现象,影响了基层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损害了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本文结合实践调研发现,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产生源自于基层的压力与责任过重、乡镇干部的角色定位变化与认知偏差、干部晋升过程中的阻碍与限制,以及问责与容错的失衡等机制。为了解决乡镇干部的“躺平”问题,需要厘清权责边界为基层减负、强化思想教育以明确干部角色认知、完善晋升渠道以解决发展限制,以及健全容错纠错制度和问责制度,以此提高基层工作效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关键词:“躺平”问题;乡镇干部;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04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乡镇是我国行政序列组织的末端,是公共政策落实的重要环节,乡镇干部承担着提供服务、处理矛盾、协调冲突和化解风险的重大职责。近年来,部分乡镇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躺平”现象,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不仅影响了基层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损害了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躺平”是形象化的个人姿态,原指一些人面对社会竞争加剧,对奋斗性价比降低而感到失望,维持低欲望的生存状

态,表现出一定的消极态度^[1]。在干部群体中,这种现象表现为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感,消极应对工作、缺乏自我激励等。深入研究如何有效治理乡镇干部“躺平”问题,对于提升基层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干部的“躺平”问题,学界也展开了诸多讨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影响干部“躺平”的因素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制度因素,包括复杂的条块关系以及基层政权的执法困境导致了基层权责分立,产生执行疲态^[2],以及在压力型体制下,制度不合理产生的激励缺陷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客观实际促生了基层政府的“懒政”现象^[3]。二是干部的自身因素,即面对繁重的任务指标,部分基层干部将完成考核指标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作为工作的核心目标,对职责不清晰的工

收稿日期:2024-06-04

基金项目: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全面振兴中财政专项资金治理研究”(24CZZ039);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安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2021CX122)

作者简介:宁佳(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本文信息:宁佳,李韬.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产生机制及治理路径——以安徽省阜南县 W 镇为例[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9(1):28-34.

作消极应对,敷衍了事^[4],以及部分干部因为年龄偏大、工作失误、竞争失利等因素而晋升无望,从而错误地认为公共权力的执行效率与己无关,个人即使再努力,也不能获得晋升^[5]。三是环境因素,即政府监管不力和缺乏有效激励机制造成部分公务员倾向于庸官懒政,对自认为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选择不做或消极怠工^[6],在这种弱监察或弱激励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庸者下、劣者汰”,导致“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7]。学者们对于干部的“躺平”问题也提出了多种解决策略与措施,如朱贞等^[8]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出发,提出要提升干部干事创业的内源力量、健全干部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优化干部干事创业的组织环境。陈宗波^[9]认为,解决基层干部“躺平”问题,应从源头上修炼基层干部的心理韧性,并结合刚性制度和柔性管理,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金太军等^[10]认为,需要从优化考核激励、落实监督问责和强化法治保障等几个维度着手,治理官员怕政、懒政、怠政问题。

既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探讨了基层干部“躺平”的问题,大多遵循“干部‘躺平’问题的表现形式——成因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逻辑,为后续研究干部“躺平”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但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乡镇干部“躺平”问题还缺乏深刻的探讨,尤其对“躺平”的产生原因虽已有部分研究,但仍然不够全面,提出的对策也较为泛化,没有针对“躺平”现象产生的各方面原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因此,以安徽省阜南县W镇为例,从权责分配、角色实现、晋升发展、监督问责四种机制出发,分析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产生机制,以及如何引导乡镇干部积极履职。这些理论探索可以成为治理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理论依据,能够助推新时代基层干部的队伍建设。

二、田野呈现:W镇调研情况介绍

(一)W镇政府案例概况

W镇地处安徽省阜南县西部,政府设有民政所、农业经济统计站、自然资源所、财政所、社会事务服务站、党政办、农业综合服务站、经济发展办公室。现有乡镇干部70人,其中行政编制27人,事业编制28人,其他不在编人员15人。W镇干部具有以下特点:从性别比例看,男性乡镇干部共

有58人,女性乡镇干部12人;从年龄结构上看,30岁及以下的乡镇干部是9人,31~40岁的乡镇干部是32人,41~50岁的乡镇干部是18人,50岁以上的乡镇干部是11人;从学历结构看,高中、中专及以下乡镇干部共有12人,大专学历的有16人,本科学历的有39人,研究生学历的有3人;从职务级别看,乡镇干部中是科员的有54人,副科级干部11人,正科级干部5人。

(二)W镇干部“躺平”问题的表现及危害

1. 消极懈怠:工作效率下降

消极懈怠是干部“躺平”的表现形式之一。根据访谈得知,一部分干部没有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存在“一问三不知”的情况。这类消极懈怠的干部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没有积极有为的内在动力,在工作中常常表现出拖延、推诿、不作为等行为,对待工作缺乏热情,上班时常迟到早退,请假频繁甚至旷工。这类干部缺乏干事创业的动力,对群众利益与工作事务秉持无所谓的态度,不以群众的利益为己任,亦不为群众解决问题。W镇党委副书记L说:“我们这有个58岁的退役军人,现在乡村振兴工作站工作,平时工作不积极,领导安排他进村入户,夏天他讲热,冬天他讲冷,春秋季节他讲家里有事,个人想法是反正快退休了,无所谓,除来镇食堂吃饭,一无所求,混日子,到退休。”

个体效率与组织效率相互作用。消极的工作态度不仅导致干部自身的工作效率大幅下降,也影响了整个乡镇的工作氛围和效率。当这些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责任心时,原本简单的工作也可能变得复杂繁琐,进而拖延整个工作进度,增加工作成本,影响行政效能。

2. 畏惧担责:制约乡镇创新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向深入,少数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认为受到了太多的规范,一不小心就可能犯错误,于是失去了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这部分的干部秉持“多做多错,不如不做”的工作信条,往往选择避免承担重要的工作任务或关键的岗位,并且在工作中过分谨慎,对待工作中的问题和风险过于保守,不敢冒险尝试新的方法或思路,担心一旦失败会带来更大的责任和后果,于是选择原地不动,认为不干事就不会出错,不出错就不会被问责。正如W镇党政办科员Z所说:“我们日常工

作经常出现职责职权不清的情况,综合性工作和临时性工作比较多,领导在安排工作时,更多的是以完成工作为导向,能者多劳成为常态,但干得多未必有好处,反而增加错误风险,长此以往,大家对于临时性工作都有躲避倾向。”

畏惧担责的工作心态不仅限制了干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制约了整个乡镇的创新步伐。乡镇的发展需要不断尝试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有人敢于担当、敢于创新。然而,当干部们表现出畏惧担责的心理时,乡镇的创新氛围就会受到严重压抑,导致乡镇在面临复杂与多变的群众工作时无法及时作出调整和创新。

3. 不思进取:导致忙闲不均

改革开放之前,干部大多都是来源于组织任命,通过非考试、非制度化的方式进入体制内,这一官员任命方式促成大龄干部学历较低的弊端。以W镇为例,当前有11名干部是50岁以上的大龄干部,12名干部是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这些干部虽然学历不高,但基本都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并且与群众关系紧密,能够应付复杂多变的基层群众工作,充分激励这些干部能够极大地提高基层工作效率。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治理的推进,部分干部反映:“跟不上时代,学不会电脑。”再加之其理想信念的淡化,责任意识下降,拒绝学习和履行其基本职责,造成了“为官不为”的现象^[11]。W镇财政所科员C说:“以前进体制的人可能也不是选拔进来的,学历不够高,写作的能力也比较低,比如我们副所长,他49岁就已经在等待退休了,就算把工作分给他,他也只会把工作再分给其他年轻人,因为他说自己不会弄电脑,学习也学不进去,接受不了新知识。”

不思进取的心态使得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往往满足于现状,推而不动,不愿主动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也导致乡镇出现忙闲不均的现象。一些干部因能力强、效率高而承担了过多的工作,而另一些干部则因缺乏进取心而无所事事。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不仅影响了工作的整体效率和质量,也容易导致干部之间的不满和矛盾。

4. 得过且过:阻碍乡镇发展

根据访谈情况得知,“躺平”现象广泛存在,并且表现在各个年龄段之中,本应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群体之中也广泛存在着“躺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得过且过”。以W镇为例,W镇的干部年龄结构偏年轻化,40岁以下的干部41名,占总人数比例

59%,但大部分被访谈者表示“躺平”现象比较严重。在当今时代,部分年轻人由于缺乏理想信念教育,选择逃避或否定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凡事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被动应付,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安排。党政办科员H说:“一些相对年轻的干部,还没有走上重要岗位,自身也没有很强的上进动力,家庭条件好一些,这群人更容易躺平。比如我们单位一些新进来的年轻人,做一些日常工作,朝九晚五,工作只考虑完成任务,不考虑质量,但大家都不愿得罪人,习惯了降低对他们的预期。”

得过且过的心态使得干部在工作中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乡镇的发展缺乏热情和投入。乡镇的发展需要干部们共同努力、积极进取,而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则会严重影响乡镇的发展动力。得过且过的心态如若在年轻干部中普遍蔓延,乡镇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状态,无法充分利用资源和优势实现快速发展。同时,这种态度也会对其他干部产生消极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阻碍乡镇的持续发展。

三、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产生机制

(一)权责分配机制:压力与责任同时下压

压力型体制中的数量化任务分解机制使乡镇干部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上级往往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方式,将任务层层落实到乡镇,乡镇干部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可能会导致干部感到力不从心,进而选择“躺平”作为应对策略。并且在压力型体制中,绩效指标是通过逐级向下分摊的方式传递到乡镇层面,由于职责同构的机制设置,上级政府更容易为下级设置更高的绩效指标,形成“层层加码”的政治现象^[12]。在这一高压环境中,工作压力大、绩效要求高等问题使得部分干部难以承受,工作热情、积极性逐步下降,从而选择“躺平”。

除此之外,县级主要领导的政策动议需要有依据才能得到部门的支持,而中央的政治任务是县级主要领导推动工作的重要依据。近些年来,县级主要领导在工作推动中只要加持诸如“乡村振兴”“党建”等政治正确标签,就会使条块天平的重心向党委政府倾斜。并且乡镇的责任也越来越大,过去责任在部门,转化为政治任务后,做事的

责任也划归乡镇,出了问题,部门则会以属地管理为由将责任推卸给乡镇,使乡镇干部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进一步下降^[13]。同时,考核是县级政府对于乡镇政府的一种支配方式,近些年来乡镇工作的考核逐渐从注重结果管理转变为注重过程管理,乡镇一级被纳入综合考核的工作越来越多,考核分值小而分散,如果纳入综合考核的工作没做好,就会影响乡镇的综合排名,与之相应的督察督导频次也逐渐升高,巨大的压力与严格的考核制度导致乡镇干部利用形式主义的方式应对条块关系中的权力支配和任务考核,失去工作热情^[14],更注重文件的撰写、会议的召开等表面工作,而忽视实际问题的解决与工作的长远效益,进一步加剧了“躺平”问题。

(二)角色实现机制:定位变化与认知偏差

一方面,随着乡镇干部选拔方式的变迁,乡镇干部的角色大部分已经实现了“去乡土化”和“去地方化”,目前的年轻干部大多都是“逢进必考”,他们自身的经历、特点和过去的乡土干部有不同之处。以前的乡镇干部对于自己的身份角色定位是国家的干部和人民的公仆,而现在的乡镇干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已经转变为公务员,乡镇干部这种“行政化”角色的凸显,意味着乡镇治理事务逐渐“唯上不唯下”。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显著,客观上提升对于乡镇干部工作的规范化要求,而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却要求基层干部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才能在复杂的群众工作中随机应变,再加上技术治理的推进,依托刚性的行政科层制度建立了规范的统一性,但制度、规范等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基层治理问题,种种因素导致乡镇干部的自由裁量权被大幅度压缩,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工作的热情和动力降低。

另一方面,部分干部认为自己只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基层事务的决策者与服务者,导致一些乡镇干部在工作过程中会尽量避免做出具有挑战性 or 风险性的决策,而将有限的精力用于处理一些相对安全、琐碎的事务,当面临困难和挑战时选择逃避或推卸责任。同时,部分干部只看到了自己在晋升锦标赛中的竞争者角色,而忽视了在团队工作中的成员角色,将精力付诸于横向竞争,过于强调个人价值与发展机会,没有与团队

成员达成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当认为晋升无望时就开始“躺平”,对待团队中的工作采取拖延、糊弄的对策,这种角色认知偏差也会导致团队内部出现矛盾和分裂,使其他干部在工作中感到孤独与无助,加剧了“躺平”困境。

(三)晋升发展机制:晋升不易与发展受限

乡镇公务员的晋升主要依赖于选调考试和人事调动两种途径,然而,这两种方式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对于新入职的乡镇公务员来说,即便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但由于接触面相对较窄,很难有机会与上级机关的领导建立联系,因此其个人才能往往难以被发现和认可;而对于已经在乡镇工作多年的公务员来说,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领导往往更倾向于将重要任务交给这批人,因此在寻求调动时往往因为岗位的不可或缺性而难以获得批准。同时,乡镇科级职务的数量相对较少,这使得许多公务员在晋升至科级后,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晋升挑战,由于处级干部的职务数量更为稀缺,从科级晋升到处级往往需要等待十几年之久,在这期间,不断有新的年轻公务员获得提拔为科级干部,他们在年龄和学历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使得科级职位成为了乡镇公务员晋升的“天花板”^[15]。

此外,公务员系统内的“逐级晋升”制度也是导致晋升困难的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有空缺岗位,但由于受到任职时限的影响,很难获得破格提拔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优秀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不能顺利晋升的干部则会对工作丧失热情,选择“躺平”。并且,政治锦标赛在乡镇干部的晋升过程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使乡镇政府同时面临着上级的纵向压力和同级乡镇政府的横向压力。晋升锦标赛的核心在于通过政绩比较来确定干部的晋升与否,在乡镇工作中,由于职位数量有限,晋升的机会相对较少,所以干部们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取得显著的政绩,才有望赢得晋升的机会,部分乡镇干部在面临晋升压力时,因感到力不从心而选择减少工作投入。

(四)监督问责机制:问责过重而容错不足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基层的问责

力度也在逐步加大,但问责制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乡镇政府权力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确实提升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但这种制度化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镇政府的工作灵活性,使得一些乡镇干部在干事创业时产生了畏难情绪,降低工作积极性。其次,近年来的问责制度也导致干部履职的风险增加,部分乡镇干部选择不作为以避免可能的问责风险。此外,数字化时代的信息交流方式变革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举报和投诉渠道,公众能够更快速、更便捷地进行信访举报,导致容易出现问责过度的情况,让乡镇干部“不敢为”,从而选择“躺平”。

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是为了激励干部在工作中勇于担当,缓解干部不敢担责的心理,但在实践过程中,容错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领导干部在决定是否对干部容错时,往往受到个人主观意愿的影响,对文件要求的理解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导致机制启动受阻。此外,容错边界的识别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前关于干部容错纠错的政策文本及指导意见对“错”的界定相对模糊,政策内容不足以提供明确的实践指导,导致基层在运用容错纠错机制时面临较大的模糊性。同时,大多数关于容错纠错的政策文件理论性较强,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容错纠错政策的执行需要基层对容错边界有清晰的掌握,然而由于政策文件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往往难以准确把握,种种原因导致容错纠错机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乡镇干部“躺平”问题的治理路径

(一)厘清职责边界:权力与责任优化适配

治理乡镇干部的“躺平”问题,必须全面梳理乡镇的治理体系,厘清职责边界,防止责权不清、任务交叉。首先,为了让乡镇政府主动承担责任,上级组织应对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增加基层权力的自主空间,原本由上级组织来承担的责任和权力必须同时下放^[16]。因此,应当全面梳理乡镇的治理体系,依照“权责相当”的原则,稳步推进权力下放,并对应其合理且必要的“事权”,给予配套的“人权”“财权”保障。例如强化乡镇党

委对本级领导班子的用人建议推荐权、对内部机构设置调整权、对辖区站所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对村社区干部考核评价使用推荐权等,给予乡镇所需的财权以保证经费使用灵活,提升基层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17]。其次,要明确厘清县区及其部门与乡镇的责权边界,并在自身责权体系、绩效目标等方面制定政策时,赋予乡镇一定的参与权、建议权,防止上级政府及部门以“属地管理”之名转嫁责任。建立平衡的乡镇权责关系,使乡镇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干部管理统筹,防止临时性任务过多过滥造成人员使用方面“拆东墙补西墙”的疲态。最后,要对乡镇本级及所属机构干部的岗位职责和 workflows 管理提出规范性要求,建立机构、个人的岗位职责清单、业务流程清单、配合协同规则,对可预见的临时性工作职责做出原则性分工分配方案。向干部做细致的宣讲,并予以公开公示,定期对职责清单体系运行情况加以评估和完善,适应客观存在的环境变化。

(二)强化思想教育:明确定位与纠偏认知

习近平同志曾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8]。理论教育是明确乡镇干部角色认知的基础,也是提升干部综合素质的首要环节,激发乡镇干部履职热情首先需要从理想信念教育入手。首先,需要加强对乡镇干部的关怀,一方面要基于法律尊重员工的个体个性,尊重其休假、薪酬、福利等权利,另一方面可以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倾听干部对组织的意见建议,并予以及时适当回应,增强其对管理的参与感,积极为组织成员排忧解难,或提供发展条件^[19]。其次,对干部的激励需要更加具有说服力的使命感、价值感教育,并完善对干部履职更加及时的评价和正向反馈机制,建立走访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让干部更直观地意识到,自己的履职看似只是工作,但直接关系个体生产生活,关系到地方的长远发展。再次,要适当提高乡镇干部的物质待遇,探索建立工资收入正常增长机制,加大转移支付,确保乡镇工作津贴、补贴制度落实,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和物价水平等逐步提升补贴标准。最后,要增进单位内部干部之间、部门之间、普通干部与领导之间的交流沟通,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沟通平台,比如政策目标宣讲会、部门

工作开放日、业务讲堂大家学等活动,帮助干部进一步了解组织工作目标,促进协同配合,提高乡镇政府干部团结度和凝聚力。

(三)畅通发展渠道:科学晋升与发展保障

科学的干部选用体系有利于人尽其才,对于激发乡镇干部的工作热情和进取心至关重要。完善晋升发展渠道,一是要全面推行职级并行制度,适当加大对乡镇以下机构的非领导职务的职数倾斜,乡镇干部受自身机构级别限制,容易面临晋升“天花板”的困境,需要扩大干部的上升空间,对在乡镇兢兢业业工作但不能胜任或无法安排更高职务的干部,在职级晋升上给予适当倾斜。二是要加大轮岗交流力度,拓宽交流空间,在不同乡镇、乡镇与县直单位之间更加畅通交流渠道,避免长期任职单一岗位形成的认知惯性和思维惰性,增强个人岗位适配性,比如对一些由于专业限制、年龄限制等客观原因而“躺平”的干部,更加尊重其专业优势、个性特点、年龄情况,分配合适的岗位,减少其“躺平”的动机,再如一些年龄较大、缺乏办公软件学习能力的干部,可以更多地安排一线群众工作。三是适当探索更加灵活和富有激励性的薪酬制度,晋升对干部的激励效应会随着干部任期的延长、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不断削弱的趋势^[20],因此,除了完善晋升机制之外,还应在当前公务员总体薪酬制度框架下,根据各地财政支持保障情况,对工作优秀认真的干部给予适当补助,或通过日常更加丰富多样的评优表彰,从而完善人才保障制度^[21]。

(四)平衡容错问责:有效容错与规范问责

治理秩序无法依靠外部强制力来维持,而是依赖于内部建立的平衡^[22],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对于党员干部的管理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原则。目前问责过重而容错不足的行政生态,限制了乡镇干部工作的

积极性,因此,治理乡镇干部的“躺平”问题,需要把握好容错纠错与问责的平衡。一方面是对容错纠错制度的完善。要建立乡镇干部免责清单,明确容错纠错的边界,明确区分哪些错误可以容错、哪些错误不能容错,加强对干部差错认定权力的行使监督,以保证纠错工作公正公开有效地进行,既保护干部敢于担当和创新的积极性,也要防止滥用容错纠错机制。另外要对符合容错条件的干部给予更加全面的保护,在免于组织追责和纪律问责的同时,适应当前自媒体高度发达背景下的信息传播环境,建立相关澄清保护以及负面影响消除机制。另一方面是对问责机制的完善。要建立乡镇领导干部错误预防机制,推广乡镇法律顾问制度,组织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风险预测和评估,减少干部出错概率。此外,也需要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以岗位职责为基础,做好履职情况评价,开展述职、评议和谈话交流,并配合实地走访查看等方式,确保考核准确性,防止问责过度,并做好考核综合分析和反馈,及时提示纠偏,同时在科学考核和合理容错的基础上,对“屡教不改”的“躺平”干部,根据其行为和后果,依法、依规、依程序严肃问责。

五、结语

乡镇政府存在的消极懈怠、畏惧担责、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躺平”现象,源自于基层的压力与责任过重、乡镇干部的角色定位变化与认知偏差、干部晋升过程中的阻碍与限制,以及问责与容错的失衡等机制。为了解决乡镇干部的“躺平”问题,需要针对问题产生的各个机制,厘清权责边界为基层减负、强化思想教育以明确干部角色认知、完善晋升渠道以解决发展限制,以及健全容错纠错制度和问责制度。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虽然根据“躺平”问题的内在动力机制提出了部分实践路径,但并未提供路径实施的可信承诺和监督执行问题,以至于可能出现形式化的现象。未来研究也应根据“躺平”问题的发展趋势,不断优化治理策略,为乡镇干部的健康成长和乡镇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侯振中.“躺平”亚文化的生成及反思[J].人民论坛,2021(35):123-125.
[2]韩媛媛.“躺平式干部”的产生诱因、制度根源与矫治

- 之策[J].领导科学论坛,2023(9):81-83,89.
[3]张翔,梁丹玲.基层懒政何以持续: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反思[J].党政研究,2021(1):113-121.

- [4]刘帮成. 基层干部“疲态”现象的表现与化解之策[J]. 人民论坛, 2022(5): 58-60.
- [5]付东. 公司治理方式对晋升无望干部激励与约束的启示: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J]. 领导科学, 2020(4): 75-78.
- [6]杜雄柏. 为官不为的危害、日渐突出的原因及其治理[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1): 37-43.
- [7]杨建国. 祛魅与重塑: “庸官懒政”治理的伦理路径[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1, 23(4): 60-67.
- [8]朱贞, 关庆华. “躺平式”干部的实践样态、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分析[J]. 领导科学, 2023(1): 80-83.
- [9]陈宗波. 基层干部如何消除躺平心态提升心理韧性[J]. 中国领导科学, 2023(1): 110-115.
- [10]金太军, 张健荣. “为官不为”现象剖析及其规制[J]. 学习与探索, 2016(3): 42-47.
- [11]杨雨莲, 张国清. 庸官懒政的博弈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7(2): 138-147.
- [12]李倩. 政府绩效评估何以催生基层繁文缛节负担?: 基于多层级治理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7): 63-72.
- [13]杨华. 多中心工作与过程管理: 县域治理结构变革的内在逻辑[J]. 政治学研究, 2022(6): 111-122, 159-160.
- [14]陈阳, 孙超.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6(4): 36-42.
- [15]陈家建, 赵阳. “科级天花板”: 县域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官员晋升问题[J]. 开放时代, 2020(5): 186-199, 10.
- [16]郭亮. 土地征收中的“行政包干制”及其后果[J]. 政治学研究, 2015(1): 114-125.
- [17]何雅萍. “街道赋权”: 城市基层治理中“属地逻辑”的创新: 基于对 H 街道办事处“吹哨报到”机制的观察[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4(4): 29-34.
- [18]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159.
- [19]窦竹君.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及解决思路: 以历史借鉴为视角[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6(4): 29-35, 49.
- [20]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00.
- [21]王璞, 崔冠云.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青年人才服务基层的现实困境及激励机制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2): 61-66, 104.
- [22]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83.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h of “Lying Flat” Problem of Township Cadres: A Case Study of W Town, Fun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NING Jia, LI Ta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ownship cadres bear the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services, managing conflicts, mediating disputes, and mitigating risks. In recent years, some township cadres have exhibited a phenomenon known as “laying flat”, which has hindered the smooth progress of grassroots work and undermined the image and credibility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is practical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laying flat” problem among township cadres stems from mechanisms such as excessive pressure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hifts in the role positioning and cognitive biases among township cadres, obstacle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 as well as an imbalance between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 Addressing this problem requires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alleviate burde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nhanc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clarify cadre role cognition, improving promotion pathways to overcome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 for tolerance, error corre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to enhance efficiency in grassroots work while 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laying flat” problem; township cadres; rural governance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35-06

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黄小彤, 陈静宜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语言服务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四重内在功能:从社会功能看,语言服务促进乡村社会的“新融合”;从文化功能看,语言服务搭建乡土文化传承的“新桥梁”;从经济功能看,语言服务开辟乡村产业的“新天地”;从教育功能看,语言服务点燃乡村教育的“新希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语言服务要推动乡村语言现代化转型,提高村民语言文明程度;深入发掘乡村语言文化魅力,筑牢乡土文化自信的根基;创新运用乡村语言资源,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活力;完善乡村语言教育体系,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服务;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249.2;H0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九大实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至今,我国乡村脱贫摘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服务作为以语言为工具手段或产品服务行为”^[1],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巨大。2020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建立乡村语言服务机制,建设国家语言志愿服务队伍”^[2]。立足加快构建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文化合力建设美丽乡村的现实语境,乡村振兴诸多方面都与语言有着间接甚至直接的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截至目前,学界关于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探析语言服务的目的。张利红等^[3]以五大目标为导向,认为要“从做好语言文化保护政策衔接,扩大语言产业服务范围,打造以职业语言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

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银晴等^[4]系统总结了乡村语言服务总类,提出“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升乡村语言治理水平,拓宽语言服务范围,调查和开发语言文化资源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第二,聚焦乡村地理地域,探究语言服务的效益。李明宇等^[5]提出“对一个集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言,语言不单单是交际的工具和文化的象征,也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语言归入意识形态考虑”。赵欣凯^[6]认为,“新语言使用者在家庭交集、社交交际、群组交际等一般交际环境中使用母语的频率较高,使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缺少学习和应用的具体语言环境,不利于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文化、产业、人才、组织的全方位复兴”。

第三,聚焦乡村语言环境的建构,研析语言服务的效果。郭玉梅等^[7]认为,随着“社会语言生活日趋丰富,国家通用语言逐步普及,国民的语言意识不断增强、语言能力不断提高,普通话与方言等语言资源的互动更加频繁,一个主体多元的语言

收稿日期:2024-05-29

基金项目:四川省软科学项目“以川籍革命家为中心的四川红色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RKX0839)

作者简介:黄小彤(197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区域经济社会等方面研究。

本文信息:黄小彤,陈静宜.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35-40.

生活新局面已经形成”。李现乐^[8]指出“构建健康、和谐、丰富多彩的社会语言生活,离不开多样化、高质量的语言服务”。

二、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功能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一起的。”^[9]“语言不仅是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以及人所习得的习惯、表达载体,连同语言本身也属于这种习得性智识能力的一部分。”^[10]为此,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从乡村社会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语境与发展需求看,语言不可或缺,这为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前提。

(一)社会功能:语言服务促进乡村社会的“新融合”

语言既是社会文化的表征,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传统乡村社会内部的交流,表现出相对封闭与自我交流的样态,为乡村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造成这一困境原因有三:一是地域的封闭性。在传统社会中,乡村通常位于比较偏僻或孤立的地理位置,这便造成乡村社会同外部世界沟通受限,乡村居民对本地资源以及经验依赖性较强的特点。二是社会结构的固定性。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通常相对固定,乡民之间的交流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更受到特定规则和习俗的制约。三是文化传统的保守性。乡村通常具有独特的文化和习俗,极易形成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因而,思想固化的乡民往往对外界的新事物和新观点持有一种排斥和抵触的态度,从而阻碍了乡村与外界沟通的可能性。总言之,传统乡村社会在语言交流上呈现出一种较为缓慢和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将妨碍乡村进步,为此实施语言服务刻不容缓。

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广泛覆盖使得各个乡村紧密相连。同时,经济的互联互通也进一步强化了各乡村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交通、信息技术和经济为乡村提供新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为乡村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外部环境裹挟而来的新语境,乡村语言表达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样态,乡民语言观念

的优劣、语言素养的好坏、语言能力的强弱、语言水平的高低皆需开展语言服务。一方面,语言服务有助于加强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以共同的语言交流和表达增进村民之间的互动了解。另一方面,语言服务有助于优化乡民的语言使用环境,并增强这一群体的语言素养能力。提供乡村语言服务不仅能够增强乡村社会的团结力与归属感,为乡村居民创造更好的语言环境,更能为乡村社会的持续稳定和进步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二)文化功能:语言服务搭建乡土文化传承的“新桥梁”

乡村作为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不便捷的交通条件,长久以来被视为一个小社群。然而,随着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与之相伴的乡土文化也生发了正反两面的变革。一方面,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取得显著进展,农村的文化发展潜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扩展。同时,文化和教育资源的下沉、乡村普及活动的实施,以及农家书屋的建设,皆为乡村文化的进步注入新的元素,并开创了乡村文化发展新模式。另一方面,外来文化涌入乡村,导致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逐步减弱,尤其是乡村口头叙述、手工艺、俚语和谚语,以及其他传统节日等乡村文化元素正面临着褪色危机。因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文化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为确保乡土文化的持续传承并适应现代文明,当务之急是开展好语言服务,重塑乡村语言环境,为乡土文化发展构建崭新话语。

语言作为乡村文化内核的基本要素,它既是村民传递信息的媒介和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还能将语言文明意识、语言教育方法及方言文化传承与创新并融于服务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乡民的语言素养、语言意识,使乡土文化在当代乡村社会再次焕发生机活力。例如通过开展语言服务,能够保护和传承地方方言、民间故事、歌谣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村落文化的内涵;通过推广普通话提升村民的语言能力,促进乡村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提升乡村文化的整体水平与竞争力;通过举办文艺演出、诗词朗诵、演讲辩论等语言文化活动丰富乡村生活。

(三)经济功能:语言服务开辟乡村产业的“新天地”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料,其所具备的资料特性就已决定自身必然具有经济属性,而经济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职业、部门活动中的使用率。一方面,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仅体现在提高劳动者的语言技能,还作为交际工具释放当地特色,从而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资源,且具有高度可转换性,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转化为多种商品和服务,如翻译软件、语言学习应用、语音助手等,满足人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多样化需求。

在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隔阂逐渐消除。乡民对自身语言水平有了更高标准的期望,即使用者能够通过加工语言获得经济效益。因而,语言服务能够对语言资料进行开发和利用使之产品化和产业化,直接或间接创造和增长个人财富。一方面,语言服务为乡村特色产业的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作为一种具象而非抽象的服务行为,语言服务注重语言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翻译和推广乡村特色产品和文化,不仅为乡村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语言服务为乡村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工作机会和收益渠道。村民通过参加语言培训能够提高自身语言习得能力,参与乡村发展,从而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语言服务能够通过构建具有乡村语言文化特色的产业,实现语言资源的价值转化,在获得经济价值的同时,提升乡民对于乡村内部文化资源的认知。

(四)教育功能:语言服务点燃乡村教育的“新希望”

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语言教育体系是确保乡村文化教育有序进行的关键。由于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在教育领域资金投入相对较少。传统乡村语言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呈现出过于单一的模式,这使得培养学生的语言创新精神和学习技巧具有挑战性。新时代,现代教育在农村开展了新一轮革命,诸如智能化教育技术、远程语言教育和在线语言学习等创新教育模式在乡村地区逐渐流行起来,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学习语言机会,但仍有不足,因而加强语言工作是开展农村教育工作

的重要任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资本,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唯有教育资源充裕时,才能培养出既有文化修养、又具备技术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相较城市,乡村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因受地理位置、民族背景、方言等多重因素的作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语言背景的挑战。因此,为确保乡村地区的全方位发展,必须提供多元化的语言服务,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能力^[11]。一方面,语言服务有助于强化乡村学校的语言教育,提升村民的语言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乡村未来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语言服务能够根据乡民的具体语言需求和实际情况,建立长期有效的帮助途径,提升村民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素养,助力村民更好地融入社会并实现个人价值。总之,乡村教育面临语言难题,必须实施多样化的语言服务,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全面发展。

三、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提高村民语言文明程度,实现乡村语言现代化转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村民语言文明,既是乡村振兴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王春辉^[12]指出要“关注语言生活新现象,加大语言文明治理力度”。当前,“语言文字的规范文明使用是传递权威正确、健康积极信息的前提,是促进乡村治理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13]。因此,将语言纳入语言服务实施的对象之中,是推进乡村语言治理现代化必由之路。

当前,乡村频繁出现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等现象,阻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以理塘县中扎村为例,村民日常生活常常因语言不通造成出行难、看病难、维权难和文化遗产难。开展语言服务则能够推动乡村语言向现代化、标准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真正将村民的主体性发挥出来”^[14]。其一,通过普及普通话,加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和整合。普通话作为一种被全国广泛接受的语言,有助于打破地域间的语言障碍,增强农村居民的语言沟通技巧。语言服务可以通过开展普通话培训班、普通话宣传活动,鼓励乡村居民学习和使

用普通话,帮助村民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以湖北荆门市为例,该市连续三年根据当地语言、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实际需求,开展推广“三进”活动,普通话志愿者前往田野,为村民提供实时的普通话直播服务,成功地鼓励那些尝到普通话好处的农民主动学习普通话。其二,构建和完善乡村语言的保护体系是乡村语言服务的任务之一。乡村语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需要妥善保护。语言服务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设立专项基金,用以支持乡村语言的研究、传承和推广工作。以广西邕宁区为例,自2020年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至今,成功促进了该地区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建设,完成率高达93%。其三,乡村语言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是实施语言服务的一个关键方向。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乡村语言能够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语言,从而推动乡村语言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解乡音的多种途径。例如,彝族自治州用音乐与人工智能共同推进方言保护,使得彝族人民创作的汉语诗歌能够被更多人听见,开拓文化遗产的智慧形式。

(二)深入发掘乡村语言文化魅力,筑牢乡村文化自信根基

乡村振兴的核心使命是激活乡村内在文化活跃性,开展语言服务则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关键驱动力。当前,因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乡村语境经历深刻转变,传统乡土文化中的语言文化原本所蕴含的价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影响了农民群体对乡音的认同度。事实上,“方言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是农民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原料,倘若没有农民对方言及乡土文化的认同,就没有乡土文化自信,更谈不文化复兴、民族复兴”^[15]。为此,通过开展语言服务深入探索乡村语言文化中的独特价值,能够激发乡村的文化认同感,为村民提供一个增强文化自信的高质量平台。

一方面,通过语言服务保护乡村语言文化,继承优秀乡土语言文化遗产。乡村语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载体,是乡村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巨大力量。因此,开展语言服务能够厘清乡村语言本体现状、整理乡村语言文化资源、了解乡村语言生活实态。其一,要以乡、镇、村为单位对濒危语言开展实际考察,并基

于调查数据详细统计与记录,从而构建一个具有多样性又具备全媒体特性的语言资源库。其二,语言服务专家团队收集乡村语言中的词汇、表达方式和故事传说,并进一步编写乡村史志、乡村民俗志和乡村语言志等一系列相关文献。以2015年知名方言学家曹志耘教授带队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与保护工作为例,共计调查我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点100个、濒危汉语方言点100个,最终完成“濒危志”共30册。

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服务创新乡村语言文化,能够激活乡村的语言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文化变得更加“生动”。单一化地保护乡村语言,使其与日常生活相分离,将导致乡村语言文化断层。因而,要通过语言服务传承乡村语言文化,实现留住乡音、记住乡愁,化解文化危机,重构乡土文化自信。首先,语言服务应满足乡村居民的真实需求,解决乡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语言交流难题。以新疆妇联开展“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为例,面向南疆四地州2036名农村妇联主席、副主席,分33个班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线上视频直播培训课程55节,提高了当地妇女学习通用语言的积极性。其次,乡村语言服务应与时俱进,借助数字技术搭建网络空间的语言文化宣传阵地。随着农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日益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以微信、抖音等新媒体为平台,并通过图文、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提供虚拟服务、文明普及等数字化服务,从而推动乡村语言文明的数字化转型。此外,应提供“接地气”语言服务,如举办村民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节、语言比赛等活动,丰富乡村语言文化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乡民的语言文化意识。如张家界武陵源区,通过歌舞《山歌唱出好兆头》《和谐家园》等艺术作品,以轻松活泼的语言、欢快的节奏,唱出和美乡村新风采。

(三)创新运用乡村语言资源,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活力

“要重视方言、民族语言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开发语言资源在行业服务、社会服务和文化服务的重要价值。”^[16]乡村方言作为乡村经济建设的特殊表达,具有稀缺性。这一稀缺性使之具有特殊的商业价值,并成为乡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语言商品化的过程中,语言服务能够深层次发掘乡村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为乡村经济创造新的增长机会,实

现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

其一,通过深入挖掘语言资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提供良好服务,满足对地方方言有兴趣的人士的独特需求。例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每年举办农村文艺汇演,通过小品、方言歌曲等文艺汇演的方式,打造农业文化品牌。其二,通过将乡村语言元素融入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中,打造“物质产品向文化体验转化”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突出乡村文化经济价值。例如通过制作地方特色方言为主题的折扇、钥匙扣、手提包等系列文创产品,为乡村经济发展助力。其三,通过翻译工具对特色美食、民间手工、乡村特色产品命名与标示翻译,以推广独特的地方方言文化特色,助力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进而以产品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促进乡村融入全球化潮流。例如,陕西礼泉县袁家村村民、村委会极为重视以双语介绍旅游攻略、旅游项目、美食特色,形成了独具乡村地方特色的语言景观。其四,以乡村方言作为旅游目的地名片,以方言导游、民族语言表演等形式为游客提供贴心、专业的服务,促进游客更加深入地体验乡村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魅力。这一沉浸式的乡村体验不仅能够增强游客的归属感和满意度,更为乡村旅游树立独特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四)完善乡村语言教育体系,营造浓厚的语言学习氛围

中国乡村当前面临着如何防止返贫的新使命。在这一过程,村民在外界开展沟通交流、语言信息置换时,所遇各种语言障碍,触发这一群体对于提升自我语言能力的迫切需求。这一需求作为一种重要的内生动力,是乡村开展语言服务,优化语言培育体系,营造浓厚文化氛围,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支撑伊始点。

其一,语言服务应致力于推广语言普及教育,打破乡村地区语言交流的壁垒。当前“全国还有近1/3的省区普通话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17]。针对乡村居民普通话水平不均匀,语言服务能够组织一系列培训课程、建立农村人才培训和实践基地等,帮助乡民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普通话。以教育部评选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先行试点村——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平岩村为例,自2021年起,该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学普活动,实现80%村民均具备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沟通的能力。其二,语言服务应开展课堂教学、在线学习、实践活动等专业性语言培训课程,协助乡村居民提升口头表达、书面表达以及跨文化表达能力。如池州市语委、池州市教体局成功举办了2022年全市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有全市驻村工作队、乡村振兴专干及党建馆、家风馆、旅游景点等语言类从业人员近200人参加培训。其三,根据教育对象年龄、性别和需求等,语言服务应划分不同类型的语言教育模式。一方面,针对乡村儿童的语言启蒙教育,语言服务应通过组织亲子阅读、故事会等活动,为乡村儿童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语言学习环境。另一方面,针对乡村学生,语言服务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本地语言和文化元素,还融合了现代的教育观念和技术工具,为农村学生带来了更为多元和有趣的学习体验。其四,语言服务应重视加强乡村语言人才队伍建设,以乡愁、宜居环境、提高待遇等优势,吸收和保留专业门槛高、培养周期长的外部稀缺人才,并将人才纳入语言教育中,为构建乡村语言文化资源平台建设、语言教育技术开发、语言服务供需平台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李现乐.语言服务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兼及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的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6(3):114-123.
- [2]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EB/OL].(2024-05-12)[2021-11-3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30/content_5654985.htm.
- [3]张利红,刘小艺.以五大目标为导向的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3(4):136-140.
- [4]银晴,田静,苏新春.语言何以助力乡村振兴[J].语言战略研究,2022(1):25-35.
- [5]李明宇,屈哨兵.关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对话[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29-39.
- [6]赵欣凯.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通用语推广困境及

- 策略研究:以青海黄南州吾屯为例[J]. 青藏高原论坛, 2023(2):66-76.
- [7]郭玉梅,杜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4):154-161.
- [8]李先乐. 语言服务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8(3):71-57.
- [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51.
- [10]黄龙光,样晖. 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时间路径[J]. 语言战略研究,2023(5):21-31.
- [11]陈秋男,陈俭. 马克思主义思想视域下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和实现进路[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2-48.
- [12]王春辉. 语言治理助力国家治理[N]. 光明日报, 2020-08-22(12).
- [13]银晴,田静,苏新春. 语言何以助力乡村振兴[J]. 语言战略研究,2022(1):25-35.
- [14]韦安,徐欢科.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碎片化困境与策略[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3-48,70.
- [15]姚小烈. 乡村文化振兴视阈下方言文化保护与传承[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2):27-33.
- [16]陈丽湘. 语言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4-51.
- [17]杜敏,姚欣. 乡村振兴语境与农民语言能力的新构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54-62.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Language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UANG Xiaotong, CHEN Jingy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Using language services to assist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four internal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function, language services promote the “new integration” of rur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function, language services build a “new bridg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function, language services open up a “new world” of r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function, language services ignite the “new hope” in rur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language services shoul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anguag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language civil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he charm of rural language and culture should be deeply explored, and the foundation of local culture confidence should be built; The rural language resources should be innovatively utilized to activate the new vitality i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ural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o create a strong learning atmosphere.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language services; cultural confidence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41-07

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

张金肖, 孙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农业农村发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是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民收入质量提升成为助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进而赋能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促进收入来源多元化和协同化,进而优化农民收入的内部和外部结构,驱动农民各收入来源保持长期稳定,以及提高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运用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的能力。基于此,为进一步推进农民收入质量提升,要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夯实农村基础设施“硬件”与公共服务“软件”的数字环境,不断提升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最后要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多方联动治理机制来加强数字监管。

关键词:数字经济;收入质量;收入数量;农民收入;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06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了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缩小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1],分析这三大差距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来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而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该群体能否实现高质量增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党和国家历来关注农民增收问题,近1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绝对贫困得到彻底消除,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但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加上自然灾害等影响,导致农民收入存在结构失衡、增速减缓、稳定性差,以及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如何快速实现农民农业经营增效和就业增收成为当前“三农”工作重要任务。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研究单一的农民收入数量视角已不足以全面解析当前农民增收乏力的现象,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鉴于此,如何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成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而推动收入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是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的关键,促进农民收入质量提升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了基础,也使得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赋能要素升级进而驱动生产力发展^[2],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和转型。《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2022年我国

收稿日期:2024-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包容性创新视角下农村精准脱贫成效评估及可持续机制研究”(18CGL042);校级重点培育项目“乡村生态价值实现的富民效应及实现路径研究”(23HNCXJ13)

作者简介:张金肖(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民收入与农村发展。

本文信息:张金肖,孙璐.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41-47.

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并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以一种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态蓬勃发展。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三农”的赋能作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指出,要“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聚焦数字经济解决“三农”领域现实问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是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在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以及全面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收入质量如何定义?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鉴于此,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可以从新的视角为推动农民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建言献策。

二、农民收入质量的基本内涵及特性分析

(一)农民收入质量的基本内涵

已有文献从不同理论或视角对“收入质量”的概念和内涵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王欣等^[3]首次提出“收入质量”的概念,并从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以及知识性等5个维度考量了农民工收入质量,阐述了农民工收入质量概念的学术意义。随后,任劼^[4]借鉴收入分配等相关理论,针对农民群体提出“农民收入质量”这一概念,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收入稳定性替换为成长性来考察农民收入质量优劣程度,同时研究发现,收入成本这一维度对农民的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影响较小。已有学者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重新界定农户收入质量内涵,将收入质量定义为个体在获取收入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潜在或可行能力所体现出的质态差异特性总和,试图突破以往收入引致经济活动效果研究中因过度强调收入的数量属性而产生的解析局限性,并从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知识性、成长性,以及成本性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5]。但也有学者提出,成本与农民生产性消费具有同质性,是不同于收入属性的经济元素,难以准确反映收入的质量特性^[6],且已有研究表明收入成本性对农民的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影响较小,因此,将收入成本性纳入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基于此,本研究依托收

入质量理念,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同时立足乡村全面振兴时代背景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宏观视角,认为农民收入质量是从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收入知识性多个维度反映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取收入能力的质态差异特性总和,即农民收入质量除收入数量充足单一维度外,还包括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增长可持续性,以及农民在参与经济活动获取收入中知识和技能的应用能力等其他维度,从多个方面综合评价农民收入的好坏和优劣程度。

(二)农民收入质量特性分析

农民收入质量以收入数量充足为基础,并与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知识性等维度联动,从而综合评价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收入优劣程度。农民收入质量越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意味着农民收入数量越充足,结构越合理、增长越稳定,同时农民在获取收入的过程中知识含量越高、获取成本越低。

1. 收入充足性

收入充足性是用来衡量个体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时所获取的收入数量水平这一维度能否满足其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重要内容。收入充足性能够直观地体现农民收入质量有关数量维度的好坏和优劣程度,以及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生活质量、农业生产能力,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理论上,农民收入数量的充足是收入质量提高的根本前提^[4]。农民收入充足性体现在绝对收入充足和相对收入充足两个方面,农民收入质量反映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资金数量,农民收入数量较低时,收入充足性代表性较强,而在农民收入数量较快增长时,收入充足性仅体现为收入质量的单一维度,代表性也会相应减弱。

2. 收入结构性

收入结构性是衡量收入来源是否多元、各来源比例以及相互关系是否合理协调的主要维度。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产业、需求以及分配等结构持续优化改善,不断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同理,农民收入也应该从速度型增长模式向结构型增长模式转变,收入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农

民收入质量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农民收入来源的不同以及各收入比例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农民收入结构的合理性。我国农民现有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类,农民收入来源越多元、主要收入来源所占比例越高以及各收入来源比例越均衡,则说明其收入结构越合理,即收入结构性越好。农民收入来源由原来的单一化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和非农化转变,能够促使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均衡发展,合理的收入结构则有助于分散农民生产风险、提升农民生计韧性。

3. 收入成长性

收入成长性是用来衡量农民各来源收入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维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民,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关注内容,确保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群体的收入维持快速增长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7]。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经营净收入增长率、财产净收入增长率,以及转移净收入增长率多个层次衡量农民收入成长性。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所获取的劳动报酬型工资的成长性;经营净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农民参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得收入的成长性;财产净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农民通过配置管理自身所拥有的全部资产所获得收入的成长性;转移净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国家财政政策扶持力度以及政府为农民提供的转移支付等收入的成长性。

4. 收入知识性

收入知识性是指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是农民收入质量的核心维度。基于教育回报率机制,以农民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为主要代表的人力资本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8]。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农民收入水平。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对农民生产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要具备更新的农业生产知识、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等现代化技能。高人力资本意味着农民获取、理解和整理农业生产信息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中的能力越高,农民可以利用自身知识积累和技术经验,并借助先进科学生产技术高效整合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有助于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从而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整体收入。理论上,农民人力资本越高,则说明收入知识性越好,农民收入质量越高。

三、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理论逻辑

共享性的数字平台、包容性的数字技术和普惠性的数字金融等具有较强的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能够创造人人都有参与机会、人人的可行能力均有所提高的良好氛围,数字经济成为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和新引擎。理论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进而赋能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促进收入来源多元化、协同化和合理化进而优化农民收入的内部和外部结构,驱动农民各收入来源保持长期稳定,以及提高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运用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的能力。因此,数字经济从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知识性4个方面赋能农民收入质量的提升。

(一)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数量充足

农民依靠自身内生动力和可行能力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是农民总收入的主要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收入的数量和质量。

1. 在经营性收入方面

首先,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发挥信息效应、效率提升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从而增加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一是信息效应。以数字化信息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使农民可以及时、有效、准确地获取农业信息以及供需调节、价格变化等市场信息,解决农民在生产、流通、销售、交易各个环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等难题,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二是效率提升效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设备深度融合,智能灌溉技术、动植物病虫害监测技术、土壤自动检测技术等应运而生,农民可以了解到自然灾害指数、农药肥料投入使用情况,以及大气温湿度综合对比数据等信息,实现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农业经营的精细化、农业管理的智能化,从而提升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进而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三是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打破了农

产品交易的地域空间限制,极大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从而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重要保障,农民将会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9]。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缓解农民信息和资金约束来增加其创业行为,进而提升农民的创业经营收入。一方面,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推进,极大提高了农村的通信设备接入率与互联网使用效率^[10],能够拓展农民接收、整理、利用创业信息的广度与深度,有助于提高农民创业活跃度。另一方面,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提高农民创业所需金融资源的可得性,有利于激发农民的创业意愿,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数量。

2. 在工资性收入方面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加强信息互动、催生新业态、提高就业质量等促进农民非农就业,进而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首先,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拓宽了农民的就业信息获取边界和搜寻工作渠道,提高了劳动力要素市场供需匹配效率,有助于促进农民参与非农就业,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其次,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和融合应用的数字经济催生了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农民创造了大量新岗位、新职业,增加农村劳动力新增非农就业机会,成为提高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推动力^[11]。最后,产业数字化发展加大了非农企业智能化机器设备的投入,数字产业化通过重塑工作特征降低了农民非农就业的体力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有助于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12]。

(二)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结构优化

解决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缩小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一大挑战^[13]。在一系列支农惠农富农政策影响下,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收入模式从速度型增长向结构型增长转变,农民收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优化,而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收入效应,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收入质量提升的重要一环。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各收入来源合理化,通过优化收入结构,助推农民高质量增收。数字经济能够缓解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信息和资金约束,并拓宽其收入来源,通过产业发展和非农就业显著提升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优化其收入结构。在农民各项收入来源中,转

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较小,但仍是优化收入结构、推动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投资渠道是制约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14],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契机。农民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平台,根据个人能力和偏好,自主选择储蓄存款、银行理财,及基金购买等多种综合性的金融产品来提升财产性收入。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与融合,使得农民可以接触互联网及时获取政府部门、企业机构,以及社团组织经常性转移支付信息和政策,同时依托信息技术建立的便捷支付渠道,便于把转移性资金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大大提高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可得性和支付的便捷性。

(三)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核心问题,也是扎实推动农民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以及数据供给无限性等特点,通过技术变革优化生产要素、催生新业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增强农民增收能力,确保农民收入较城镇居民快速协调增长,成为农民持续增收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同时,随着数字乡村发展行动的推进,农村地区信息化、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各方面逐步融合应用,缓解农民的信息和资金约束,优化农民创业环境,真正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从而在更大区域范围内释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促进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四)数字经济赋能农民知识性收入提升

以知识和技能为代表的收入知识性表示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运用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的能力,是收入质量的反映。一方面,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数字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其发展所集聚的大量数据资源所衍生的信息供给平台,不仅能够传递和匹配城乡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供需信息,还能够打破教育资源的时空、地域限制,通过发展远程教育、在线平台等新型学习方式促进教育均等化^[15],降低农民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提升农民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农民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有助于更新农民传统观念、提高农民掌握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实现农业经营增收,而且能够帮助农民摆脱次级劳动力市场,增强其市场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性报酬。此外,产业数字化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其发展带来的新增非农就业岗位知识驱动性较强^[16],对农民的文化水平、数字素养、知识储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为防止自身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将主动学习运用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提高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提升知识性收入水平。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推进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蓬勃发展的一种更高级经济形态,通过数字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重塑,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共享性的数字平台、包容性的数字技术和普惠性的数字金融等为推动农民收入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机遇,为进一步推动农民收入质量提升,在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夯实数字环境,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监管。

(一)重视收入质量: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

1. 宏观层面

应更加重视农民收入质量问题,将农民收入质量作为“三农”发展政策的评估标准纳入到宏观经济监测体系,优化农民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方位动态评估、检测农民收入质量变化趋势,以便及时了解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运行走势。值得注意的是,要摒除“唯数量论”的传统观念,树立以质量为导向的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农民收入质量长效提升的支撑保障机制,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不断优化农村经济体制和支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环境,保持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良好势头,加快塑造以提升农民收入质量引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增长新模式,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

2. 微观层面

于农民个体而言,收入渠道单一会导致其风险防范能力偏低,收入结构欠佳会导致其收入后续动力不足。因此,农民要主动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等加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学习,将资本积累转换成自身的可行能力。农民可行能力的提高可以保证农民高质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改善自身福利状况,持续提升收入质量^[17]。

(二)夯实数字环境:升级基础设施“硬件”与公共服务“软件”

1. 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夯实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支撑,也是信息化驱动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加快补齐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短板至关重要。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开展农村地区4G基站补盲建设,并以需求为导向逐步推动5G网络、千兆光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新基建向乡村延伸覆盖。同时,要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升级,推动公路、水利、电网、冷链物流等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农业数字化升级、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硬件”支撑^[18]。

2. 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提升乡村信息服务的惠民水平

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数字科技加强乡村多场景多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应用和推广,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便民惠民效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重要途径^[19],要推动乡村“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健康”等发展形式,夯实农村地区教育和医疗的信息化基础,深化数字技术在乡村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的融合应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有机会更便捷地获取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为农民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提升提供“软件”保障。此外,要深化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信息服务,将农民就业、创业、社保服务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结合,增强“就近办、线上办”能力,提升农民就业、创业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效能。

(三) 弥合数字鸿沟: 不断提升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

新时代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问题的主要矛盾逐渐从基础设施差距转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差距,即“群体数字鸿沟”。目前,群体之间“数字鸿沟”的产生,归根于社会各群体在收入、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和差距,从而在信息化中获取、加工信息出现了“鸿沟”^[20]。“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导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异越来越大,从而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因此,要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全面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尽可能消弥“数字鸿沟”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培养农民数字学习能力。形成政府部门引导,社会组织、行业企业、农村社区多方联动的宣传学习机制,通过专题讲座等线下以及农民群体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平台等线上相结合形式,加大对数字知识、数字平台、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工具的宣传与推广力度,推动广大农民积极转变旧有思维,激发农民群体主动、积极运用数字发展成果的数字学习意识和能力。其次,提升农民数字技能水平。推动政府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多途径推动数字培训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对农民进行农村电商、数字化营销、智慧农业软件应用等形式多样的数字技能培训工作,多元化、全方位提高农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将数字化资本存量转化为资金收入的能力。最后,增强农民数字安全意识。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学

习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农民辨别、防范网络谣言和电信诈骗等虚假信息的能力。

(四) 加强数字监管: 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多方联动治理机制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数字经济逐渐融入农业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极大改变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随之而来的一些数字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加强数字监管和数字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十分必要。

一是国家政府层面。要加强数字领域的风险防控,优化数字治理的法律法规。在原有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订和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依法严厉打击涉农信贷和保险、数字金融产品,以及网贷平台等领域中的互联网金融诈骗行为,对肆意盗窃、破坏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非法行为进行严惩,为农民安全参与数字经济活动保驾护航。

二是科研企业层面。高科技企业要加大数字监管技术研发,改变过去过度依靠事后严厉处罚的传统监管范式,加大数字平台使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事前事中监管力度,形成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并重的治理框架,全程加强数据信息的收集、获取、储存与使用安全保护。三是农民个体层面。农民要树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积极参加各种网络知识安全教育培训,培养主人翁意识,通过线上平台主动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对违法产品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为数字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 [1] 马太超. 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重点领域与现实挑战: 首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暨两岸乡村振兴与“三茶”成果展会议综述[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0): 175-184.
- [2] 周文, 叶蕾.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2): 17-28.
- [3] 王欣, 孔荣. 农民工和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质量与横向公平比较: 基于农民工自我感知调研[J]. 软科学, 2014, 28(1): 110-114.
- [4] 任劼. 农民收入质量对其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研究[D]. 咸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 [5] 彭艳玲, 苏岚岚, 孔荣. 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鲁、豫、陕、甘 4 省 1373 份农户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12): 56-67.
- [6] 杨少雄, 苏岚岚, 孔荣, 等. 农民收入质量: 逻辑建构、测度评价与动态演进[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8): 18-36.
- [7] 黄季焜. 加快农村经济转型, 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7): 4-15.
- [8] 岳华, 韩彩霞, 王海燕. 新时代我国乡村教育深化、人力资本提升与农民收入提高[J]. 上海经济研究, 2024(1): 78-87.
- [9] 陈毅辉, 洪碧云. 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2): 105-109.

- [10]陈文,吴赢. 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 南方经济, 2021(11):1-17.
- [11]刘自强,张天.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 当代经济研究, 2021(12):93-102.
- [12]张广胜,王若男.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58-76.
- [13]陈健,曾世强.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全面乡村振兴探索[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4):36-41.
- [14]李谷成,李烨阳,周晓时. 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孰因孰果?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1):112-127.
- [15]王凤婷,王浩,熊立春. 农村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机制与事实[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8):4-14, 156.
- [16]徐伟祁,李大胜,闫玉科. 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8):33-38.
- [17]关江华,黄朝禧,胡银根.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J]. 经济地理, 2013, 33(8):128-133.
- [18]李晓辉.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36-42.
- [19]杨胜利,王媛,冯丹宁. 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实践检验[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19-27.
- [20]程名望,张家平. 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2):19-41.

Theoretic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Empowering Farmers to Improve Income Quality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ZHANG Jinxiao, SUN Lu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high-quality increase in farmers' inco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has become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operating and wage incomes, thereby enabling farmers to earn sufficient income,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ynergisation of income sources, thus optimi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 driving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farmers' ability to apply their accumulated knowledge, literacy and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earning income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mproving income quality to help the common prosperity, consolidate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of the rural infrastructure "hardware" and public service "software",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skills of farmers, and finally strengthen digital supervision by establishing a multi-pa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enterprise-individual".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come quality; income quantity; farmers' income; digital technique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48-08

人口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尚子娟, 孟瑶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石。目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人口基数巨大,但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使人口年龄结构恶化,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虽带动了经济的繁荣,但其过程中也存在着医疗、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題。通过国际国内横纵对比发现,影响现代化建设的口发展核心要素是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现阶段是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高质量发展任务任重而道远,关键举措在于合理利用高质量的人口资源,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并重视流动人口与现代化建设的关係。

关键词:人口高质量发展;老龄化;人口红利;低生育率;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5.01.07

一、引言

人口问题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关系千家万户幸福生活、关系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大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社会生产方式下,在任何历史时期,人口总是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主体和基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点,独特的人口特色推动中国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人口发展对社会进步影响深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人口数量下降的难题,2023年末我国减少了208万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为基础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转向基于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并重的“人才红利”^[1]。虽然仍会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期内保持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但人口结构上,低生育率带来了规模失稳、结构失衡的风险,劳动年龄人口缩减,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改变,使劳动力规模减小、质量下降;低龄老年化趋势加重了社会保障压力,降低了经济发展活力。空间结构上,日益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使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城镇居民迅速扩张,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来看,我国人口负增长呈现出短期温和、长期加速的趋势^[2]。

21世纪中叶,我国将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关于人口发展的研究在早期主要集中在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素质等方面,如刘铮^[3]提出早期的人口现代化理论,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素质的重要性;陈友华^[4]和王学义^[5]进一步发展了人口现代

收稿日期:2024-05-26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托幼公共服务体系及政策创新研究”(2021F002)

作者简介:尚子娟(1985—),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文信息:尚子娟,孟瑶.人口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48-54,83.

化理论,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联系,引入经济现代化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进行评价。进入21世纪后,研究焦点逐步转向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在人口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人口与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如陆铭等^[6]和唐隽捷等^[7]特别强调了人口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有效对接,并高度关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布局的协调性;王富喜^[8]更加注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和谐,提出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性。近年来,随着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的出现,目前的研究更加关注新型人口红利、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等方面,针对当前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的新态势,王金营等^[9]和陆杰华等^[10]提出了以“规模稳定、结构优化、素质提升、分布合理”为核心的人口长期发展目标,旨在通过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来创造新型人口红利;黄泰岩^[11]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宏观框架下,深入探讨了人口发展战略的优化路径,强调人口发展必须与社会整体发展保持高度的协调。

基于以上研究,到目前为止,中国式现代化依旧面临着这3方面的人口问题:第一,人口基数巨大。当前我国的人口数量已超越所有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且预计在2035年以前将稳定在14亿的水平。第二,人口结构失衡明显。2022年我国首次迎来人口负增长的拐点,为61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加上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导致了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即中国式现代化目前面临着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宏观人口基础,这两大趋势相互交叠深化,共同构成了当前国家发展的基本人口背景。第三,未来劳动力资源依旧相对丰富,人口数量优势继续保持。随着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未来将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的转变。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分析中国人口发展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同其他国家的人口与社会发展进行对比,立足宏观层面,尝试更加系统性地总结出人口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希望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二、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深刻剖析了人口的本质

特征及其发展进程,揭示了人口理论的深厚内涵,对现在该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人口本质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3],这一界定直接凸显了人口的社会属性,摒弃了将人口简单视作单一生物实体的片面观点。基于此,马克思提出物质资料 and 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前者涉及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而后者则关乎生命的延续和新生命的诞生,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基本内容。这一过程中人口作为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既作为生产主体参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又通过自身的再生产为社会提供新的劳动力。人口与生产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人口属性是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统一体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均强调人的双重身份: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要创造历史,首先要生存下去,因此生产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成为首个历史活动。作为生产者,人们熟练运用工具与自然斗争,所生产的物质资料最终又服务于消费。消费受生产关系制约,又包含自然与社会双重内容,研究消费需结合特定社会生产与消费关系。恩格斯将消费资料分为生活、享受、体智发展3类,这些消费资料可以反映特定阶段的消费力。人拥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而人口整体则体现出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统一。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力人口是生产力的核心,而全体生存着的人口,无论生产与否,都作为消费力的一部分对经济社会产生着影响。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发展是量增长与质提升的内在统一。人口增长是后代简单重复繁殖的过程,通过代际更替和生命循环确保人类存续。提升人口质量同样不容忽视,它涵盖了人口在身体素质、思想深度,以及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在思想素质方面,恩格斯指出,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往往源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 and 生产关系会导致人的社会意识及思想素质的差异。至于文化素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发展联系的观点,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机器对人力替代效应日益显著,为此劳动

者必须不断提升技能、知识以及文化素质,实现“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人口数量的增长基于自然属性,人口质量的提升则体现社会属性,人口发展是这两者的统一结合,既体现了人类生物学的延续,也展现了人类社会文化的进步。

我国现阶段处于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高效利用高质量的人口资源是目前的重点。要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推动发展的人口总量优势、结构潜力和素质资本叠加效应,加快构建一支素质优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分布科学的现代化人口队伍。在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的基本背景下,更多地依靠“人才红利”和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尤其重要^[15]。人口高质量发展本就孕育着新型的人口发展观念,即人口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发展的核心目标。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改革创新为驱动力,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目标,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进步。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所具有的重要优势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基础,当前我国已具备多重优势,包括物质财富的丰厚积累所形成的经济优势,教育体系健全与人才强国战略共同构筑的人才优势等。未来我国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措施,构建出全方位、一体化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口发展要素分析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和长期性要素,更是推动人类社会与文明深刻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目前我国对于影响人口发展的具体要素尚未有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导致了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际状况缺乏全面的认知,所面临问题和挑战亦缺乏深入的评估。基于此,本文通过与其他国家人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横向对比、与我国发展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纵向对比,尝试总结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完善与理论演进。

(一) 国际横向分析

经济增长为现代化提供物质性条件,是现代化赖以支撑的基础,中印两国的现代化均离不开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与人口条件密切相

关^[16]。截至 2023 年 4 月,印度总人口数达到惊人的 14.2 亿,这一数字使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与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数量超 10 亿且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的国家,又拥有世界上最有代表意义的新兴市场,未来将会成为全球经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两国间的比较在研究人口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方面是一个关键点。制约印度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印度人口数量和中国类似,但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长期以来低于中国,原因主要在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较低。具体而言,2021 年,印度男性劳动参与率与中国相比低了约 4 个百分点,而女性劳动率更是远低于中国,差距高达约 46 个百分点,印度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不到 25% 的人口实际参与劳动。劳动参与率过低严重影响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助力,进而影响了印度人均 GDP 的增长。

韩国社会正面临极低生育率所引发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其严重程度在全球范围内也前所未有的,不仅人口结构遭到破坏,未来社会经济问题也将日趋严峻。中韩两国同为亚洲地区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显著的国家,在人口政策实施与老龄化进程上存在一定相似性,但整体上,韩国社会更早地步入了老龄化阶段。因此,深入剖析韩国人口结构演变历程及其应对低生育率的策略,对于我国应对人口结构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韩国来说,“低生育率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速,而是由晚婚不婚、女性职场压力、经济压力等多种原因聚集在一起的结果”^[17],老龄化问题也不仅源于老年人口的增加,更与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有极大关联。具体来看,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预计到 2070 年,韩国总人口将缩减至 3 766 万,重新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水平。此外,伴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韩国政府的养老金支出不断增加,又引发了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近年来韩国的 GDP 增长率也在持续下滑,经济增长面临困境,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未来也将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无疑对韩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二) 国内纵向分析

我国在不同时期也制定了不同的人口政策助力经济的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是人口政策的酝

酿反复阶段,当时人口快速增长,迎来第一次生育高峰;1949—1953年,因为对人口数量没有具体的把握,政府对人口的态度是鼓励生育的,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限制生育思想第一次出现,1954—1958年,人口数量增长影响了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扩大再生产,影响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加剧了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人口政策正式建立,当时人口规模与结构出现变动,1962年中央颁布了《关于认真倡导计划生育的指示》,1963年北京成立第一个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来计划生育工作被迫暂停,直到1974年,毛泽东做出重要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人口工作才重新开展起来。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GDP占比不到1%,但人口飞速增长为改革开放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12年人口政策开始严格执行。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2002年《计划生育法》正式施行,2006年提出统筹人口问题,人口要可持续发展,正式进入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时期。从2013年至今,人口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依法启动实施,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施行,2021年“三孩”政策颁布。人口政策的修改完善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也缓解了目前国内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使国内社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人口流动推动着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而城镇化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成果体现,其水平的提升和质量的优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地区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并持续呈现增长态势,这标志着中国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城镇化变革。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仅有408个市辖区和2176个小城镇,城镇人口总数为1.7亿,然而2020年市辖区数量激增至973个,小城镇数量更是达到了21157个,城镇人口数量也跃升至9.1亿,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以及巨型城镇化区域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城镇化进程显著促进了中国城镇经济的蓬勃发展。40多年来,城镇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增长势头强劲。具体来看,城镇GDP占比已经从1988年的约50%迅速攀升至2016年的80%以上;公共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584亿元(涵盖所有城镇)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85575亿元(仅在地级及以上

城市范围内)。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消费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大幅提升至47412元,恩格尔系数则从1978年的57.5%稳步下降至2021年的28.6%。城镇化还促进了中国城镇空间的快速拓展和环境的显著改善。具体而言,2020年中国建成区面积达到了60721.32平方公里,相较于1978年增长了8.43倍;同时全国城镇公园绿地面积2020年达到了79.79万公顷,较1981年增长了8.43倍。这些成就均充分展现了人口流动促进的城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贡献。

(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口发展要素

在发展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是时代的鲜明特色^[18]。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人口机遇的基石,其核心要义在于“构建素质卓越、总量充裕、结构均衡、分布科学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我国人口现状不仅体现在庞大的数量上,更展现出与其他人口大国以及我国其他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独特性。人口要素赋能现代化建设的要素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口数量基数大。我国的人口数量主要受人口政策影响,而人口政策又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早期鼓励生育政策推动了经济复苏,随后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带来了资源分配压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优化了资源配置,重新提高了经济效率。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再到“三孩”政策的施行,旨在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人口政策调整有助于调整人口数量,未来应该持续优化人口政策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在当前人口基数巨大的现实背景下,特别是在未来人口负增长宏观趋势下,塑造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体系是促成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归根结底要激发14亿多人民的力量”^[19]。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巨大的人口意味着拥有巨大的力量,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人口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消费者。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实践深刻表明,在人口结构合理和经济体

制优化等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庞大的人口基数,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占大多数,是经济发展最有利的条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致力于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及人的全面发展能力。近年来,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队伍的文化素质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23 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60.2%。人才资源总量从 2010 年的 1.2 亿增长到 2019 年的 2.2 亿,其中,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 1.12 亿,均居世界第一^[20]。人均受教育水平提升加之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已具备构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有利条件。

第二,人口结构变化大。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将影响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2023 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0~15 岁少儿人口为 24 789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7.6%,而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9 6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1%,远超儿童数量。2022 年,我国人口抚养比达到 46.6%,相较于 2013 年增长了 11.3 个百分点。这些变化对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发出了新的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在经济充分发展之前就已加速的特点,物质保障相对不足,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现象。社会抚养负担的加重以及劳动力的相对匮乏都可能对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预计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 5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 40%,届时我国不仅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将成为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21]。人口结构作为基础性要素决定着人口发展是否处于高质量发展的状态,当前最需要化解低生育率难题,逐步提升生育率到适度水平并努力向更替水平逼近,使得人口发展实现规模稳定、结构均衡的状态。

第三,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城镇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并具备持续发展的潜力。城镇作为生产、生活、消费与创新的核心交汇点,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不仅能够有效汇聚人口和经济活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更是新思想、新技术的摇篮,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当城镇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其积极作用进一步显现,不仅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均衡与和谐发展。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大幅跃升至 2023 年的 66.16%,成为经济提升的关键点。

用图 1 来描述人口要素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人口要素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紧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口增长和结构优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参与比例的提高反映了人口素质的提升和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城镇化建设则是人口流动和聚集的重要载体,是经济提升的关键。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现代化建设的有机整体,相互促进并相互制约。因此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考虑人口要素的影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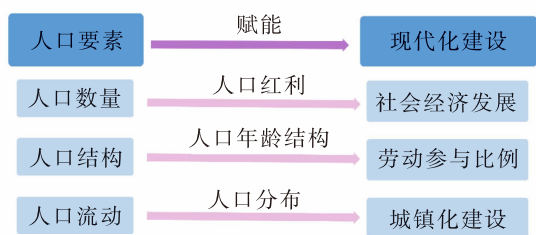


图 1 现代化建设中的人口发展要素

四、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持续优化人口政策,改善宏观人口结构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 1.3,远低于 2.1 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22]。超低生育率对人口均衡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

为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并尽快提升生育率,必须对现行政策进行针对性优化。政策制定的关键在于打开生育潜力的释放空间,需要深入剖析当前的生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通过详尽的调查与测算,明确生育支持政策的重点与力度,为制定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坚实依据。根据已有调查,经济负担过重,特别是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高是制约生育意愿的主要障碍;照料资源的匮乏、女性在职业与家庭间的平衡难题,以及年龄等因素也不容忽视。政策调整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为提升生育率创造有利条件。同时需加大对女性就业和

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男女平等的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缓解职场性别不平等现象。要加大托育幼教服务的供给力度,并为隔代照料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以缓解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此外,还需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扩大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不断提升教育质量,降低家庭教育成本,进而有效缓解因教育问题所引发的生育焦虑。针对生育困难人群,需要增加对生殖健康服务的投入,并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解决房价过高问题也是关键之一,政府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年轻夫妇提供价格适中的婚育住房,切实减轻其经济负担。此外,为激发青年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应进一步细化三孩生育政策,并持续完善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通过提升养育的保障水平,有效降低养育成本,切实减轻人们在生育、养育和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压力,让青年不仅愿意生育,更要敢于去承担生育的责任。

(二)统筹治理老龄化问题,加快完善老龄人口服务

老龄人口自身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度与全面性^[23]。我国老年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占据多数,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且健康状况良好,是老年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随着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潜力日益显现。然而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原因在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教育—工作—退休”的“三段式”生命周期单向发展理念使得就业制度设计缺乏弹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和老年人继续就业的积极性^[24]。不过,“随着老年群体的更替,拥有更高教育背景和更优健康状态的人群将新进入老年阶段”^[25],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在未来会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把积极老龄观与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26]。当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年龄歧视现象严重阻碍了老年人的就业。因此,需面向全社会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大力宣传积极老龄观,大力弘扬健康老龄化的理念,以塑造社会对于老龄化的正确认识。同时,应积极倡导“学习—就业—再学习—再就业”的多元化生活模式与职业生涯路

径,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丰富的就业选择和机会。此外,当前老年人在寻找就业机会时存在着信息有限的困境,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来获取再就业的机会,而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职业介绍机构或人才信息库相对稀缺,为有效应对此问题,应尝试在现有机构中设立专门服务老年人的部门,并投入一定资金鼓励相关企业开设专为老年人服务的职业介绍机构。此外,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优势高效地收集老年人的工作需求和与之匹配的岗位信息,在未来实现区域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三)关注流动人口问题,奠定坚实人力资本基础

首先,在流动人口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医疗卫生问题尤为显著。目前我国亟须加快医疗保健体系的改革,加强医疗服务保障制度的建设,确保流动人口能够在其全生命周期内获得更为优质、全面的医疗帮助。尤其是对流动老年人、农民工、孕产期妇女和幼儿等特殊群体的健康给予更多关注,从而实现对流动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为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应构建紧密的县域医疗共同体,推进其由“集聚式”向“蜂巢式”转变^[27],通过构建高效的医疗合作网络和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确保县域内医疗机构间的数据即时互通与高效协作,从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倾斜,通过增加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资,使其整体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同时需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效能,构建集基础医疗、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要逐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系统、连贯、一体化的医疗服务,确保服务流程的顺畅度和效能的最大化。

其次,为提升流动人口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技能,必须重视其既有人力资本的市场转化率。要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各界应努力构建终身学习的生态系统,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与开发的政策环境,培育更多具备优秀创新能力和扎实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为加快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提升,需要对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补贴制度进一步完善,使企业能够主动地开展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流动人口的数字化素养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其数字化工作能力,更会增强其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此外,还可以积极推动公共实训基地的共建与

共享,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范围,并尽可能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以确保流动人口广泛受益,从而实现整体职业技能的显著提升。

最后,要重视流动儿童的教育情况。一是需深入剖析人口流动对儿童成长的多元影响,制定综合战略。二是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解决幼儿早教和托育问题,完善婴幼儿照料服务体系,降低

城乡家庭育儿负担。在此基础上推动城镇教育资源下沉,扩大教育覆盖范围,提高儿童受教育机会与公平程度,确保流动和留守儿童能享受到平等的优质教育。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制度,保障流动儿童升学、转学时学籍信息的及时更新。要关注其心理健康,提供个性化辅导,助力流动和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 [1]吴瑞君,罗志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数量一质量并重型“人才红利”的开发与利用[C]//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文集,2022,2022:8.
- [2]于潇,常州.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特征与新挑战[J].人口学刊,2023,45(1):6-10.
- [3]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J].人口研究,1992(2):1-10.
- [4]陈友华.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3):64-70.
- [5]王学义.人口现代化的测度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46-51.
- [6]陆铭,李鹏飞,钟辉勇.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管理世界,2019,35(10):11-23,63,219.
- [7]唐隽捷,顾剑华,陈铭杰,等.民族地区人口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及系统耦合分析[J].系统科学学报,2019,27(3):102-107.
- [8]王富喜.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J].地理科学,2020,40(8):1345-1354.
- [9]王金营,李庄园,王冬梅.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基于增强经济实力的认识[J].人口研究,2022,46(4):40-54.
- [10]陆杰华,林嘉琪.重度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特征、风险识别与战略应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1):59-68.
- [11]黄泰岩.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J].经济学家,2022(11):13-14.
-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3.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7.
- [15]范语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N].中国妇女报,2023-05-08(1).
- [16]李龙,贾墨晗,金光照.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比较: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视角的分析[J].人口研究,2023,47(3):49-62.
- [17]曲金艺,梅倩,高璐,等.韩国人口结构变化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现代商贸工业,2022,43(15):48-50.
- [18]吴大兵,吴昌红.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其实践路径[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3,39(1):1-9.
- [19]习近平.坚守初心共促发展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2-11-18(2).
- [20]王晓峰,刘华伟.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理论意蕴、支撑要素与实践路径[J].人口研究,2023,47(5):46-58.
- [21]吴瑞君.从“五普”到“七普”: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耦合和区域均衡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3(5):174-183,240-241.
- [22]张川川.积极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J].工信财经科技,2023(4):8-9.
- [23]杨菊华.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3):14-26.
- [24]杜鹏,韩文婷.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人口与经济,2023(1):13-19,25.
- [25]郑碧丽,花文苍.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2):57-62,83.
- [26]李程骅,张钊.中国式现代化与老龄社会文明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23(2):1-10,241.
- [27]杨胜利,陈欣,王媛.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3):30-37.

(下转第 83 页)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55-07

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维审思

樊瑞科, 刘苗苗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数据为基、算法驱动、虚实交融、人机互构”的数智时代方兴未艾,推动信息社会迈向新阶段。数智时代逐渐成为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崭新境遇,意识形态工作数智化成为大势所趋。如何顺应这一趋势进而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便成为一项值得关注的新课题。当下,推动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亟须明晰三个基本问题。从概念认知来看,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独特的内涵。从特征分析来看,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内容数据化、过程智能化、载体平台化与方式视觉化的特征。从价值意蕴来看,数智技术有助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与吸引力。对上述问题的理论审视成为深化和拓展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逻辑前提。

关键词: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逻辑前提;建设实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5.01.08

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以技术为动能的数智时代逐渐拉开帷幕,正在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并成为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的新变量。意识形态这一“老问题”面临诸多“新情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数智化转型成为时代必然。当前,学界对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从整体而言,学界普遍采用“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范式也影响了该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因此,深入厘清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鲜明特征与价值意蕴等学理问题便成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

明晰概念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范

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扭结。”^[1] 深入解读“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便成为推进该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数智技术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联性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2] 数智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度嵌入及广泛赋能正在开启信息社会的数智化转型,助推人类社会迈入数智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智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将数智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期抢占未来竞争

收稿日期:2024-04-17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论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特征及价值”(202307064);河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智技术赋能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研究”(HB23MK003);2024年河北省研究生示范课程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KCJSX2024066)。

作者简介:樊瑞科(198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本文信息:樊瑞科,刘苗苗.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三维审思[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55-61.

新高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美国在2016年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此后分别于2019年和2023年发布更新版本,试图继续强化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优势。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目标是确保欧盟成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全球领导者。此外,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也发布了本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面对数智化的时代潮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相继将引领和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塑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历史和实践证明,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引起人类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例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互构互嵌、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把(自然)科学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但是,他们丝毫也不否认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3]一方面,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赋能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不断驱动特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导致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联动反应。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赋能作用表现为:科技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的制度变革(例如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助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最强大的杠杆”^[4])、丰富其时代内容(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揭批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的同时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和强化其现实功能(例如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5]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能动作用,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构成要素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更为突出。例如,科技的发展不单由冰冷的技术逻辑和理性思维所决定,也受道德伦理和感性思维所影响,尤其是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对科技的发展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其不仅关涉一个国家科技事业的价值定位,也直接影响科技人员伦理规范和意志品质的培育践行。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科学家精神便是我国在新时代追求科技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6]

在数智时代,数智技术及其广泛应用不断嵌入并形塑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等

诸多领域,也构成了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的重要变量。一方面,数智技术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机遇。这体现在:数智技术赋能我国意识形态宣教理念由单向灌输向以人为本转变、意识形态宣教模式由群体化规模教育向个性化私人定制倾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从科层制传统向现代性治理转移、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由显性教育向精确化微传播的隐形渗透转型、意识形态危机处理由事后被动应对向事前主动预测过渡等,进而有助于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新挑战。这表现为:数智至上思潮弱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属性,数智孤岛问题离散其整合功能,数智伦理失范遮蔽其道义形象,数智资本逻辑消解其人文精神,西方数智霸权加剧其安全风险以及数智人技短板制约其建设动能等,从而威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从数智技术本身而言,我国数智技术战略顺利实施和数智技术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规制,其进一步印证了二者互动互构的辩证关联。

(二)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殊规定

科学始于问题,问题基于概念。对概念的科学界定是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逻辑起点。所谓逻辑起点是指某一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和原始状态,内在地包含了其全部观点,构成了该理论体系演化发展的基础。深入推进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亟须对“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坚持以“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基本认知为原则,以推动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发展为目的,尝试对“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作如下界定:它特指在“当代中国”的时空境遇下,党和国家顺应数智时代的发展潮流与恪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守正创新的必然要求,主动将数智技术有机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的实践过程。

准确把握“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殊规定,需要将其置于“当代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境遇进行深刻透视。首先,坚持党的领导

彰显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独特政治优势。我国数智技术的健康发展、广泛赋能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在数智时代,无论借助数智技术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改革创新,还是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数智技术“技术向善”的价值导向,均需要积极发挥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其次,“人民至上”的发展原则体现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价值立场。在西方世界,技术与资本的合谋致使数智技术成为资本家追求资本增殖和强化剥削的数字杀伤性武器,资本与政治的勾连也加剧了“数智暴政”风险。在当代中国,“坚定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7]。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我国发展数智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真正体现了数智技术的民本理念。最后,数智技术发展成效奠定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良好现实基础。就当代中国而言,数智技术的应有优势、数智产业的有力支撑、数智技术的法规保障、数智文化的逐渐兴起等为数智技术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利因素,成为深刻理解“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一特定内涵的重要向度。

二、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特征

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并非数智技术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简单组合或生硬拼接,而是二者相辅相成、互动交融的耦合过程,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内容生成的数据化

在数智时代,海量异质数据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表征和新工具。舍恩伯格和库克耶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回顾了人类计算和记录的发展历程,认为“量化一切”构成了数智时代的核心命题。他们认为在数智时代不仅要关注信息技术的变革,更应关注对数据本身的分析应用。数智时代,数据爆炸性增长已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乃至本质属性,势必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在对数智技术的理性认知上,尽管国内外各届人士见仁见智,但对数据规

模之大的理解却成为普遍共识。从诸如麦肯锡、IDC以及Gartner等全球著名IT咨询公司到舍恩伯格、李国杰、梅宏、涂子沛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一致认为大数据成为驱动信息社会数智化转型的“基石”。

在数智时代,海量数据为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据资源,为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待发掘的“金矿”。质言之,在强调“数据驱动”的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既要将建设视角置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世界,还应关注更为宽旷的虚拟数字空间。在数智时代,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博弈的主要场域,成为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变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络主导权。”^[8]当前,我们政治民主化进程、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的繁荣兴盛、社会民主的改善等都离不开对数据的挖掘采集、储存整理以分析应用,其也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内容生成的重要资源。在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惟有“与数偕行”才能不断彰显其时代气息和丰富其时代内容。

(二)运行机制的智能化

在数智时代,海量数据只是具有潜在价值的生产要素,要想真正发挥数据的效能,还需借助强大算力和智能算法来实现。一方面,内容生产的智能化。传统意义上,职业化的意识形态阶层是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社会分工视角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家”,认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9]。伴随信息生成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以ChatGPT、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生成式AI快速发展,“人机协同”或将成为未来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发展趋势。例如当前以媒体信息生产为例,数智技术新闻、机器人写作等已然成为媒体信息发布的重要形式。今日头条“张小明”、封面新闻“小封”、新华社“快笔小新”等写作机器人在提升信息生产效率 and 推动新闻生产流程重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家”的传统认知。

另一方面,内容发布的智能化。伴随数智时代的来临,算法已深度嵌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人类已悄然进入“算法社会”。算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信息内容推送、操控舆论导向乃至左右价值选择的技术手段,成为形塑思想观念的技术权力,彰显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伴随以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传播业态的蓬勃发展,以今日头条、快手、抖音等聚合类平台的快速崛起,“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智能化算法推荐成为数智时代信息生成与分发的主导方式。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来看,主流媒体充分利用智能推荐算法,在对多元异质的媒介信息进行感知采集、储存整合与挖掘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有效把握和科学预测不同社会群体乃至每个成员的个性化理论需求,精准推送符合特定群众和个人需求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与传统媒体线性传播模式相比,“在算法推荐技术加持下的内容会根据用户反馈做到及时调整,让信息更‘懂你’,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更加智能化”^[10]。数智时代信息生成与分发的智能化趋势不断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时代转型。

(三)建设载体的平台化

在数智时代,伴随移动网络的普及和智能媒体的应用,信息生成与传播的平台化趋势更为明显,平台型媒体不断崛起。平台型媒体是开放平台与专业媒体的结合物,具有多元主体交互、多样载体联动和多重媒体集成的鲜明特征,正在重塑我国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为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载体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机遇。当下,国外的推特、谷歌、脸书、照片墙,国内的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百家号等皆为平台媒体的典型代表。“平台型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传播格局,也为意识形态开辟了新的统治空间,让其触角超越国家政府和政党深入到每个移动互联网使用者、深入到整个社会”^[11],为革新与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载体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手段载体。

快速崛起的平台型媒体为拓展意识形态建设载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空间。例如短视频平台凭借其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内容鲜活、形式新颖等显著特征逐渐成为吸引流量的重要端口。根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 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53 亿人,

占网民整体的 96.4%^[12]。以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正在成为民众接收信息、休闲娱乐、精神交往的主要媒介方式,以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的主流媒体也纷纷抓住短视频的发展机遇,不断拓展其在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吸引力与感染力。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入驻抖音 APP,依靠优秀作品吸引无数粉丝、获得海量点赞。再如中宣部开发的“学习强国”凭借聚合性、融合性、服务性特征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创新表达,央视频这一综合性视听新媒体平台成为传统主流媒体向数字化、智能化、体验化转型的成功案例。总之,上述探索进一步彰显了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载体平台化的鲜明特征与实践要求。

(四)传播方式的视觉化

在“媒介化生存”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视觉化趋向日益明显。“在以大众传播的发展为特点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13]当“看的艺术”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叙事方式时,“仅靠宣讲方式的意识形态灌输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和作用机制的这种转变,我们必须探索更为弥散性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而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正是一种这样的传播方式”^[14]。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单向线性的传统传播理念束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充分发挥视觉媒介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与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式。

在数智时代,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催生的视觉化数据呈现出井喷之势,“视觉崇拜”“图像狂欢”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新常态和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新表征。图像叙事逐渐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式的主要选择。在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觉化转型与数据可视化分析不谋而合。“数据可视化是将抽象的‘数据’以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帮助人理解数据。”^[15]经过可视化分析的数据具有简明直观、栩栩如生、通俗娱乐的鲜明特征,更加契合现代社会高强度、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格调。2024 年初 OpenAI 重磅发布全球首个文生视频模型“Sora”,重新定义了 AI 文生视频在现阶段的技术极限,进一步丰富了“视频化生存”的文化景观。“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态

由传统的文字语言文化向视觉文化方向转变。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主动借助可视化技术及其广泛应用,通过类型多样、丰富多彩的图示、表格、音视频格式拓展与创新其表达方式,借助VR、AR、MR等先进技术增强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力争将抽象深奥、理性权威的科学理论转化为感性直观、鲜活生动的视觉表达,实现意识形态呈现方式由“平面化”向“立体化”,“文本化”向“图像化”的时代转型。

三、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意蕴

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吸引力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永恒课题。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增强凝聚力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提升引领力是先进理论的本质要求,彰显吸引力是理论掌握群众的主要方式,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动实践,共同展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意蕴。在数智时代,充分激发先进技术的赋能作用,对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无疑具有独特而鲜活的时代价值。

(一)有利于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

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是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赢得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凝聚作用和统摄效果。从应然状态来看,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市场经济趋利特征、各种社会思潮融汇交织、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冲击、媒体格局深刻变革等致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多样化的复杂格局。这一格局虽然客观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转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共识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提升凝聚力视为加强和改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乃至中心环节。正如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16]

数智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数智化转型的同时也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变革。在数智技术的时空场

域中,反映我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样态、生态文明等鲜活实践的海量数据不断涌现,致使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密切相关的海量数据充盈着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不论以报刊杂志为主的纸质媒体,还是以电台广播为主的电子媒体,抑或是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网络媒体,都在不断生成和传播承载特定意识形态的多元异质信息,其都可以通过数智技术解析转化为意识形态的相关数据。在数智时代,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对意识形态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储存、分析、整合及应用,有助于实时监测媒介生态和研判社会舆情,准确识别并主动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建构“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为整合社会意识、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技术服务与智力支撑。此外,在数智时代,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根本之道依然在于真正反映并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数智技术归根结底源自人们生产生活的数据集合,只有真正满足大众美好生活所需的思想才能赢得大众的理解与认同。利用数智技术监测社情民意、洞悉现实问题,了解人民所需,有助于为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提供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有利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先进理论魅力,借助各种方式和手段引领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能力。马克思主义以其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深沉的人文情怀“依然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内蕴着彰显其引领力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当前,尽管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功能没有变,也不应该变。”^[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国内外环境,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呈现多样多变的复杂态势,如何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阵地正在经历从传统现实场域向数字虚拟场域的时代转场,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变量,我们应积

极促使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数智技术及其广泛应用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了新的技术动能和平台载体。在数智时代,应充分发挥我国政府的数据优势,通过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各级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通过推进政务信息的联通共用,争取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在克服“数据孤岛”中不断消除党群干群的疏离感,增加党群干群的互信度,从而为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奠定良好的政务基础。此外,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数据,企业数据也是数智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来源。由此,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18],有助于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前提。针对以社交媒体为主要来源的网络数据,也可通过发挥数智技术在海量数据收集汇总、存储管理和分析应用中的技术优势,赋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不断提升。

(三)有利于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

意识形态吸引力是指一个政党或者国家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凭借其强大的理论魅力和价值观念在引领大众、凝聚人心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亲和力、感染力、同化力。“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2]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秉持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立足于鲜活的社会实践,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成为指引人类谋求自身解放的

理论指南,彰显着永恒的真理光芒,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本源。概言之,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需要不断推进先进理论大众化,使来自群众实践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指导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针对20世纪初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潮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渗透和干扰,列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中明确提出了“灌输论”要求。以“灌输论”为指导,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很好地实现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大众化任务。但在数智时代,传统意义上“灌输”模式却难以适应移动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时代潮流,收效甚微。当然,本文认为“灌输”理念并未过时,但“灌输”方式必须与时俱进,只有充满时代气息的“灌输”方式才能更好地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服务。“数智时代,人们正在普遍感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和快感,倘若仍旧采用枯燥的说教方式、言传方式宣传理论,不仅人们不愿意接受这种脱离时代进步的意识形态宣传路径,还会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厌倦与疲惫。”^[19]因此,充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智技术优势,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教模式的理念更新、方式创新、载体革新,“牢牢地将先进技术把握在意识形态工作者手中,充分运用智能分众化手段为受众提供更为生动、优质的体验感受”^[20],才能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

总之,只有深刻“认识世界”才能有效“改造世界”。深入阐释数智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特定内涵、鲜明特征与价值意蕴等学理性问题,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该问题的认知程度,从而为辨识数智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探求其应对策略提供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2.
-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47,65.
-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6.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08.
- [6]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243.
- [7]韩汶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3-49.

- [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5.
- [9]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1.
- [10]张茂杰,樊瑞科. 理论、现实与实践: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三重逻辑[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67-71.
- [11]郑永年. 再塑意识形态[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3.
- [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3-22)[2024-03-22]. <https://source.ckcloud.busionline.com/izcoo/>.
- [13]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铨,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86.
- [14]刘伟斌.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5):104-112.
- [15]沈恩亚. 数智技术可视化技术及应用[J]. 科技导报,2020(3):68-83.
- [16]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38.
- [17]王永贵. 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新理念[J]. 江苏社会科学,2013(6):6-10.
- [18]习近平.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 光明日报,2021-10-12(1).
- [19]郑洁. 数智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 教学与研究,2017(11):61-68.
- [20]杜宝君,樊瑞科. 社交媒体环境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87-91.

Three-dimensional Review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FAN Ruike, LIU Miaomiao

(School of Marxism,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of data-driven, algorithm-driven, virtual-real integration, an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is flourishing, driv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wards a new stage.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situation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hina,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has become a trend. How to adapt to this trend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new issue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At pres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three basic issues in promot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From a conceptual perspective,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unique conno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ture analysis,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 digitization, process intelligence, carrier platformization, and visual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implications, digital technology can help enhance the cohesion, leadership, and attractiveness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bove issues has become a logical prerequisite for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n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mainstream ideology; logical premise; the effect of construction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62-08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特征及路径探索

——基于2022年国家教学成果奖的实证分析

程西慧¹, 何杭蓓², 李晓华³

(1. 四川民族学院 发展规划处, 四川 康定 626000;

2. 河北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3. 河北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要: 基于2022年高校在思政课教学领域所获的94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对获奖成果的各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特征,探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途径,促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研究发现:本科层次思政课是教学改革的主阵地;东部地区获奖成果远超其他地区;成果完成主体影响成果质量,跨领域多学科合作趋向明显;研究主题聚焦培养人才,重点围绕国家关切。研究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高职和研究生层次思政课教学;着力推动区域、省域、校际间的交流合作、协同互补;注重系统性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主动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提高网络思政课传播力;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制度、经费、组织、评价四大保障机制建设。

关键词: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5.01.09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课堂教学效果还需要提升,教学研究力度还需要加大、思路需要拓展”^[1],为我国思政课工作指明了方向。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学成果奖是高校教育教学成果的高度凝练与典型代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自1989年首次设立以来,4年一届,至今已评选9届,共授予7640项奖励,通过对现有研究分析发现,有研究者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现状、获奖特征、职业教育、医学教育、体育教育等学科领域进行了分析,但迄今还未见专门针对高校思政课领域所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分析研究,且由于前8

届教学成果奖关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案例较少。因此,为进一步探索高校思想政治领域教育教学改革的特征,本研究主要以2022年高校在思政课教学领域所获的94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作为研究对象,对获奖成果归属地情况、成果完成单位情况、成果合作单位、成果第一完成人身份、成果主题分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特征,探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途径,促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二、高校思政课教学成果奖统计结果分析

(一) 成果层数量分布情况

本研究根据教育部公示的2022年国家级教

收稿日期:2023-12-07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重点资助课题(2202061)

作者简介:程西慧(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本文信息:程西慧,何杭蓓,李晓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特征及路径探索——基于2022年国家教学成果奖的实证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62-69.

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按照高等教育层次划分,筛选出94项以高校思政课为重心的教学成果奖,包括11项一等奖和83项二等奖。其中,本科层次思政课教学成果奖共58项,包括6项一等奖,52项二等奖,在高等教育(本科)成果总数中占比10.17%。高职层次思政课教学成果奖共21项,包括3项一等奖,18项二等奖,在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总数中占比3.68%。研究生层次思政课教学成果奖共15项,包括2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在高等教育(研究生)成果总数中占比7.42%。由此看出,本科层次教学成果奖中思政课教学成果奖比例最高。

(二)成果归属地分布情况

1. 成果归属区域分布情况

本研究按国家统计局的经济区域划分条例,以东、中、西、东北四区为统计标准,成果第一完成单位为统计对象,得到获奖高校地区分布数据。研究发现,获奖高校数量在区域分布上有明显差距,东部获奖成果数量最多,共46项获奖成果,包括6项一等奖和40项二等奖,占比48.94%,东部地区省均获奖达4.6项,超过全国均值3.56项。西部地区共24项获奖成果,包括2项一等奖和22项二等奖,占比25.53%,西部地区省均获奖3项。中部地区共16项获奖成果,包括2项一等奖和14项二等奖,占比17.02%,中部地区省均获奖仅有2.67项。东北地区共8项获奖成果,包括1项一等奖和7项二等奖获奖,占比仅为8.51%,东北地区省均获奖2.67项,与中部地区持平。因此,从各区域获奖数量与省均情况来看,东部高校的思政课教学成果数量更大,总体来看质量更优。

2. 成果归属省份分布情况

为进一步获悉高校思政课教学成果奖省域分布情况,本研究以省(市、自治区)为标准统计细化研究。从排名情况来看,94项获奖成果共涉及27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包含澳门在内的10个东部省份表现突出,获奖总数排名前十有六,其中北京位列第一,体现出高等教育水平对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的辐射效应。此外,以省均所获3.56项教学成果奖为参考,研究发现区域内的省份间也存在明显的数量差距。东部省份中超过省均获奖的省份最多,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山东获奖总数都达4项及以上,浙江、福建有3项成果,河北、澳门只有1项。西部省份的获奖成果集中在四

川、陕西两省,分别有8项、6项获奖成果,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获奖成果较少,均未超过省均获奖数,内蒙古、重庆、青海、宁夏均未获奖。中部省份中,湖南有6项获奖成果,是唯一超过省均获奖数的中部省,安徽、湖北获奖数为3项,而河南、江西、山西分布较少。东北地区只有3省,黑龙江省最多,有4项获奖成果,其次是吉林,有3项获奖成果,最后是辽宁,仅1项获奖成果。这反映出西部省份间高校思政课教学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现状。

(三)成果完成单位分布情况

1. 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类型情况

本研究对94项获奖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属性进行分析,发现这些项目完成单位都属于高校,其类型层次、学科优势是项目获奖重要影响因素。第一,“双一流”院校思政教育成果奖数量突出。研究根据高校层次类型将其划分为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及双一流院校三类。这三类院校中,首先,双一流院校表现突出,获奖成果最多,数量高达60项,占比63.83%,其中一等奖8项,占比72.73%,二等奖52项,占比62.65%,均位列第一。其次,是高职院校,有2项一等奖和18项二等奖,共20项获奖成果,占比21.28%。最后,是普通本科院校,有1项一等奖和13项二等奖,共14项获奖成果,占比14.89%。因此,从获奖成果数量来看,可以发现“双一流”大学对思政课教学改革重视程度之高、发展成效之优。第二,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起到一定引领作用。2015年,中宣部、教育部提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程,至今已建成37所全国重点马院。在本届获奖项目中,有26个第一完成单位为全国重点马院建设大学的思政课项目,并且,重点马院重点集中在“双一流”高校,有23所,占比88.46%,普通本科高校中全国重点马院仅有3所,占比11.54%。

2. 成果合作单位统计情况

从完成单位来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获奖项目除了94个第一完成单位,还有97个合作单位参与。本研究通过对成果完成单位数量及完成类型进行统计,以了解目前对高校思政课教学较为关注的组织。首先,从成果完成单位数量来看,院校合作趋势愈加明显,但“独角兽”模式仍是高校思政课教学主要方式。主要体现为,高校独立

获得教学成果奖有 63 项,占比 67.02%,其中一等奖占比达 72.73%。合作完成的获奖成果 31 项,占比 32.98%,其中来自于高职院校的获奖成果占比达 48.39%,这意味着高职院校更趋向以合作形式进行教学研究。在 31 项由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获奖成果中,11 项成果由 2 个单位合作完成,2 项成果由 13 个单位合作完成,其他成果合作单位大多在 5 个以内。其次,从成果完成形式来看,合作完成形式丰富。2022 年高校思政课教学成果奖完成单位共包括 5 种组织机构,形成了 8 种合作形式,主要包括“高校+高校”“高校+企业”“高校+事业单位”“高校+行业协会”“高校+政府”“高校+企业+政府”“高校+企业+事业单位”“高校+行业协会+事业单位”。其中,“高校+高校”合作最为普遍,有 15 项,占比 15.96%,其次是“高校+企业”合作,有 7 项,占比 7.45%。同时,本科层次高校多选择“高校+高校”合作,所有普通本科院校主研成果和 10 个“双一流”院校主研成果都以“高校+高校”合作形式完成,而高职层次则以“高校+企业”合作更为普遍,46.67%的高职院校主研成果都有企业参与。

(四)成果完成人分析

获奖成果第一完成人的身份一定程度上反映

表 1 成果第一完成人身份分布情况

身份	一等奖		二等奖		获奖总数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学校领导	8	72.73	22	26.51	30	31.91
二级学院领导	2	18.18	39	46.99	41	43.62
学校行政中层干部	1	9.09	8	9.64	9	9.57
专任教师	—	—	13	15.66	13	13.83
政府单位领导	—	—	1	1.20	1	1.06

(五)成果主题分布情况

每一项成果主题体现了该成果的着力点,统计 94 项高校思政课教学成果奖的主题分布有利于研究近几年思政课的发展风向,为其他高校开展思政课教学提供参考。本研究根据成果名称、申报材料等支撑资料,提取各成果问题解决的角度,发现 94 项成果可基本分为宏观人才培养与微观课程教学改革和教学改革两大类,涵盖 8 大主题(见表 2)。

了该教学成果的受重视程度、辐射范围等,因此,本研究对 94 个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身份进行调查统计,如表 1 所示。首先,获奖成果第一完成人多为领导干部,尤其是学校领导和二级学院领导,而专任教师获奖比例少。其中以二级学院领导为第一完成人的获奖总数最多,有 41 项,占 43.62%;以学校领导为第一完成人的一等奖成果最多,有 8 项,获奖总数有 30 项,占比 31.91%。在一等奖获奖成果中,45.45%的获奖成果由高校党委书记主持完成,其他成果主研人也多为高校校长、院长或中层干部。且 80%的“双一流”院校获奖成果都由校领导、院领导担任第一完成人,表现出高校对思政课教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与全局思考。其次,思政课教学成果存在明显交叉融合现状。在 94 个成果第一完成人中,仅 36 人具有马克思主义学科背景,这表现出思政课教学成果的交叉学科属性,来自其他学科背景的主研人正打破学科壁垒,普遍将思政课作为学科教学改革推手,体现出学科融合交叉趋势。以学校行政中层干部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共 9 项,占比 9.57%。相比于此,由专任教师作为第一完成人的获奖成果较少,获奖总数仅有 13 项,占比 13.83%,并且没有一等奖成果。

从宏观人才培养来看,思政课教学改革正普遍介入高校人才培养这一项系统性工程。本届思政课教学改革获奖成果中,有 51 项成果与人才培养相关,包括 5 项一等奖和 46 项二等奖。从各成果实践情况来看,将其进一步细化为 4 个主题,分别是“培养模式”“大思政育人体系”“爱国主义”“精神引领”。首先,“培养模式”主题成果有 24 项,总占比 25.53%,是获奖成果最多的主题。其次,“大思政育人体系”主题在高职教育和本科层次教育中引起广泛关注,共有 13 项获奖成果,总

占比 13.83%。该主题以思政课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核心,以课程思政为支撑进行协同育人的新诠释。最后,“精神引领”主题共 14 项获奖成果,旨在以某种典范精神内嵌于人才培养,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立足校史,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激发学生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从微观来看,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被广泛关注。“课程改革”主题成果丰富,共有 28 项获奖成果,包括 3 项一等奖及 25 项二等奖,总占比近 30%,仅次于“人才培养”主题。将该主题成果以课程内容为标准,可细分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思政课程”主题共有 15 项获奖成果,总占比 15.96%,在 8 大主题中排名第 2,该主题聚焦于利用多元资源改革思想

政治理论课,例如新疆大学从地方意识形态问题出发,以铸牢全疆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的,打造“共融式”地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思政”主题共有 13 项获奖成果,该主题更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他课程领域的融合路径,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依托自身课程思政经验,以“形成一个共识”“推广两化理论”“打造三类平台”“推动四个转变”关键举措形成本研贯通的课程思政模式。“教学改革”主题获奖成果,共有 15 项,该主题成果以教学改革类型为标志,可细分为“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其中“教学模式”共 10 项获奖成果,总占比 10.63%,该主题侧重于对传统思政教学模式突破。而“教学体系”主题的获奖总数虽只有 5 项,但包括 2 项一等奖,且 2 项获奖成果都是对课程思政执行中教学体系的创新探索。

表 2 获奖成果主题分类情况

主题分类		一等奖		二等奖		获奖总数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人才培养	培养模式	1	9.09	23	27.71	24	25.53
	“大思政”育人体系	2	18.18	11	13.25	13	13.83
	精神引领	2	18.18	12	14.46	14	14.90
课程改革	课程思政	2	18.18	11	13.25	13	13.83
	思政课程	1	9.09	14	16.87	15	15.96
教学改革	教学模式	1	9.09	9	10.84	10	10.63
	教学体系	2	18.18	3	3.61	5	5.32

三、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特征

(一)本科层次思政课是教学改革的主阵地

在本案例库中,首先,本科层次思政课教学成果数量最多,占比超过 60%,体现出本科层次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主体和基础,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环节,反映了高校思政课在本科层次的重视、投入、创新和成效。其次,高职层次思政课的教学成果数量次之,本次获奖项目中,高职层次思政课教学成果共有 21 项,反映了高职院校对思政课工作的重视和发展,也展示了高职院校在思政课改革上的特色和优势。最后,研究生层次思政课的教学成果数量和占比最少,本次获奖项目中,研究生层次思政课教学成果共有 15 项,说明研究生层次思政课还有待加强和深化。此外,“双一流”高校在思政课教学改革中具备显著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这是因为这些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

资源、优秀的师资队伍和广泛的国内外合作渠道,有能力推动高校思政课的前沿研究和实践创新。

(二)东部地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整体水平更为发达

从成果归属地看,东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整体水平更为发达,全国各区域、省份候选项目分布不均衡。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创新能力都较高,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优势。西部地区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追赶者和突破者。本次获奖项目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成果数量居第二,反映了西部高校在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追赶和突破作用。中部地区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稳健者和支撑者。本次获奖项目中,中部地区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成果数量居第三,反映了中部高校在思政课上的稳

健和支撑作用。东北地区是思政课工作的挑战者和改进者。本次获奖项目中,东北地区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成果数量最少,反映了东北地区高校在思政课的挑战和改进作用。并且,各省份的获奖项目数量分布不均,这与各省份的高等教育质量紧密相关,省际分布的不均衡将进一步扩大不同地区思政课水平之间的差异。为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思政课均衡发展,政府和高校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和投入,推动改革的均衡推进。

(三)成果完成主体影响成果质量,跨领域多学科合作趋向明显

从成果完成主体看,“双一流”高校在思政课教学改革中具备显著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但普通本科院校也有一定的潜力。从成果第一完成人职务来看,高校领导和学院领导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一方面,说明高校思政课改革是涉及面广、需要统筹协调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改革模式,以避免行政权力过度干预教育教学改革,从而确保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学术导向性。成果第一完成人中专任教师比例较低,说明专任教师推动教学改革的综合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2],同时,也需要改革高校管理机制,激励教师积极参与改革,并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支持,以确保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从合作模式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普遍涉及多方合作,这反映了思政课的跨学科和跨领域性质。然而,合作模式和效果仍然需要进一步优化,以确保合作能够真正推动改革的成功实施。这可能需要高校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机制、加强合作单位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以充分发挥合作的协同效应。

(四)研究主题聚焦人才培养,重点围绕国家关切问题

首先,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主题聚焦人才培养,获奖成果中有51项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反映了高校思政课的核心任务和价值取向。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本科层次思政课改革,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质,除75%的成果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外,还涉及工、农、理、文、医等五大学科门类,体现了高校思政课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此外,

还有13项成果关注“大思政育人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展示了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其次,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点反映了国家关切问题。本届教学成果奖的名称中广泛出现了“大思政育人”“爱国主义”“精神引领”等高频词汇,体现了高校思政课与国家战略、社会需求、时代精神的紧密联系。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特色体现了创新精神,24项成果涉及教学改革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反映了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探索性和先进性。这些成果既立足于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规律和特点,注重了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优化,也关注了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改善,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和保障体系。

四、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一)进一步加强高职和研究生层次思政课教学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应该覆盖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不仅仅局限于本科层次。高职层次的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需要接受系统的思政课,以提高其政治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研究生层次的学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他们需要接受深入的思政课,以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和创新精神。因此,高校应该加大对高职和研究生层次的思政课的重视,制定针对性的课程目标、内容和方法,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针对高职层次的学生,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未来就业方向,设计符合学生实际需求和水平的思政课。充分利用专业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等多种载体,将思政课贯穿于高职教育全过程。其次,针对研究生层次的学生,要结合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创新活动,设计符合他们高层次需求和能力的思政课。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充分利用导师制度、研究小组、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校园文化,组织实践活动^[3],将思政课融入于研究生教育全过程,引导他们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最后,需要在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上不断探索,创新体验式教学,开发专题式教学,促进教学改革不断完善^[4]。

(二)着力推进区域、省域、校际间的交流合作、协同互助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应该打破地域和校际间的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促进改革的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应该充分发挥各地区在思政课教学改革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形成区域协作机制,推动区域内外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工作互学互鉴、互助互进。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区域性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中心,整合各地区高校的思政课教学资源 and 力量,开展区域性的课题研究、集体备课、教学改革、教师培训等活动。要注重发挥各地区在思政课方面的特色和优势,如东部地区的先进性和领导性、西部地区的追赶性和突破性、中部地区的稳健性和支撑性、东北地区的挑战性和改进性等。二是建立省级思政课教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省级党委统一领导,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由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参与实施,制定省级思政课教学改革工作规划、指导和评估方案。建立省级思政课教学改革协调小组,推动省级思政课教学改革工作规划、指导和评估。校际间的交流合作应该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地区高校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注重加强省内外高校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定期召开省级思政课教学改革工作会议,交流思政课教学改革经验和成果,解决思政课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三是建立校际间思政课合作平台,由有条件的高校牵头或联合发起,邀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高校参与,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合作目标、内容和方式。基于校际间的思政课教学资源 and 经验交流,开展课程共建、教材共编、师资共享等活动,激发校际间的思政课教学创新能力。

(三)注重系统性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应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和实施,注重改革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优化,避免碎片化和零散化。要从课程体系、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5],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6],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思政课体系,其重点在于形成一个稳定、高效、协调的思政课团队。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高校思政课建设委员会,由

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由各相关学院参与,负责统筹规划和指导高校思政课体系的建设和改革。要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按照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设计一体化的课程目标、内容和结构,实现思政课的系统性、连贯性和递进性。二是建立高校思政课教材内容优化与创新工作小组,组织编写和审定高校思政课教材。要及时修订统编教材,将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有机融入各门思政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7],持续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重点教材建设。三是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创新研究中心,开展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创新。善于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8]。要积极运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课题研讨、课堂辩论等方式组织课堂实践,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途径,在教学中进一步对教学方式方式进行创新^[9]。四是制定和实施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方案和激励措施。将人才培养效果作为评价的首要标准,将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作为考核评估的重要内容,重视教学过程评价,增加教学研究和教学成果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建立健全思政课教师队伍的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绩效考核、奖惩激励等制度,激发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10]和教改的创造性^[11]。

(四)主动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提高网络思政课传播力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应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要求,适应社会的变化需求,适应学生的成长需求,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12],拓展思政课的传播渠道和覆盖范围,提高思政课的传播效率和影响力,使思政课形式与网络相结合、与文化相融入^[13]。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网上课堂平台,利用移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高校思政课提供在线教学、在线辅导、在线答疑、在线评测等服务^[14]。要注重提高网上课堂平台的功能性、互动性、智能性和安全性,使之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的学习要求。要注重利用网上课堂平台进行思政课的开放共享,实现优质课程资源的广泛传播和利用^[15]。二是建立高校思政课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平台,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工具,为高校思政课提供及时信息发布、互动交流、意见征集等服

务。要注重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思政课宣传引导,实现正面舆论的有效传播和引导。注重提高新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形式多样和影响力广泛,使之能够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关注者^[16]。三是建立高校思政课网络直播平台,利用网络直播技术,为高校思政课提供在线讲座、在线访谈、在线活动等服务。注重利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思政课实践教学,实现思政课的现场感和体验感,提高网络直播平台的实时性、真实性、参与性和感染力,丰富和拓展实践教学的内涵与外延^[17],使之能够展示更多的优秀典型和鲜活案例。

(五)完善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制度、经费、组织、评价四大保障机制建设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完善的制度、充足的经费、有效的组织和科学的评价来保障其顺利进行和取得成效。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目标,以教师队伍为根本依托,以质量提升为根本要求,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四大保障机制^[18]。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制度保障机制,制定和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相关规章制度,明确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等内容,形成一套科学合理、规范有效、操作简便的制度体系^[19]。要加强制度的宣传和执行,使之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行动指南和行为规范。

二是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经费保障机制,管理和使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专项经费。按照在校生总数每生每年不低于40元标准提取专项经费,并逐步加大支持力度。要优先保障思政课教师的学术交流、实践研修等活动的经费需求,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培训班、访问团等。要合理分配和使用专项经费,遵循公开透明、效益优先、绩效考核的原则,确保专项经费的充足、合理、规范。三是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组织保障机制,负责组织和实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各项活动。建立健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项目组等工作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和分工,形成统一协调、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要加强各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交流工作进展和经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四是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评价保障机制,制定和实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质量评价方案和激励措施。建立健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体系^[20],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和指标,综合考量改革的过程、结果和效果。将人才培养效果作为评价的首要标准,将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作为考核评估评价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奖励和惩戒机制,对改革中涌现出的优秀成果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给予批评和整改。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奋斗,2020(17):4-16.
- [2]陆道坤.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专业课程思政的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2018(3):64-69.
- [3]庄兴忠.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3(1):109-114.
- [4]李晓华,陈明真.西柏坡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课中的价值及实现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1):92-97.
- [5]肖青龙,朱珠.“大思政”格局下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0):133-135.
- [6]杨威,管金瀚.“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学内容的定位、体系与实施难点[J].思想教育研究,2022,(10):125-130.
- [7]王一军.目标一致性:思政教育融入大学学科教学的理论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44(2):73-87.
- [8]何昭水,谭北海,谢侃,等.三全育人背景下信息学科课程思政“六位一体三提升”教学实践探索[J].高等教育研究,2023(6):82-86.
- [9]郭凤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213.
- [10]陶磊,汪萍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学术能力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2(11):69-74.
- [11]郑敬斌,田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实践误区与理论澄明[J].思想理论教育,2022(10):80-84.
- [12]陈卓国.论新媒体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8):44-46.

- [13]房广顺,李鸿凯.以大学生获得感为核心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J].思想理论教育,2018(2):56-61.
- [14]樊瑞科,张茂杰.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若干思考[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4):59-65.
- [15]杨维东,潘姿羽.高校思政课教学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J].中国高等教育,2022(20):30-32.
- [16]范桐鑫.数字化教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5):84.
- [17]张学礼,李晓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及育人成效提升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3):69-74.
- [18]杨涛,黄斌.“社会调查+思政教育”协同育人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四重逻辑[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2,35(4):15-25.
- [19]贾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反思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178.
- [20]陆道坤.论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施[J].思想理论教育,2020(10):16-22.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022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CHENG Xihui¹, HE Hangbei², LI Xiaohua³

(1.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Sichuan Minzu College, Kangding 626000,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94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won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2022, this study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various conditions of the award-winning achievements,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plored the ways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d the deepening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t undergraduate level is the main position of teaching reform; the award-winning achievemen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far exceed those in other regions; The main body of the achievements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cross-field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ends to be obvious; The theme of the study focuses on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concentrates on national concern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t the senior and postgraduate levels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regional, provincial and inter-schoo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synergy and complementarity;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itiative should be taken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and to improve the dissemination power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Four guarantee mechanisms, namely system, funding, organ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reform;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empirical analysis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70-06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

高俊, 虞满华, 苏国红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新兴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体现,是学科创新发展的内生诉求,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新时代铸魂育人的时代之问。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也暴露出监管体系与运行机制建设不足、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融合欠缺、数字手段与育人工作匹配受限、“人”“数”关系与核心理念认识阙如等现实挑战。数字化时代,高校要站位未来总体规划,在提升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和数字化育人全过程层面精准发力,聚焦“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好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持续培育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TP301.6;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10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明确了其未来发展的走向和进路。《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教育”^[3],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从现实来看,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范畴。一是价值层面,有学者认为智能算法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贯通了大学生的所需与所求^[4]。二是技术层面,有学者指出探索数字技术开发,创设虚拟交互学习环境,可以更好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5]。三是价值与

技术融合层面,还有学者认为数字化的病态依赖以及关系互动失序、实践行动偏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6]。总的来说,当前学术界对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论题的研究呈现多种视角和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然而,应当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关于路径层面的系统性和现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特征,剖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问题,围绕总体设计、数字素养、数字资源和协同意识4个方面,探讨如何通过这些路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能的现实思考,还有助于推动高校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性发展。

一、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伟力

大数据、算法、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迎来了高

收稿日期:2024-05-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23年度一般项目“共同富裕视阈下新时代幸福观研究”(23BKS137);2022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大项目“三全六专育人工作实现路径研究”(2022jcb008)。

作者简介:高俊(199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本文信息:高俊,虞满华,苏国红.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70-75.

速发展,嵌入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同时,也正在重塑和变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站位未来,打造了新的教育发展跑道,形成了新的教育竞争优势,注入了新的教育发展动能。

(一)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质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变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价值意蕴体现在育人质量的全方位提升^[7]。第一,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育人的数字化和网络化。通过数字化技术,创新教学育人情景,依托区块链手段,形成了“数字化育人”“智能化综评”“精准化反馈”等应用模型,实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智慧沟通,更有效地提高了育人的时效性和便捷性。第二,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育人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使教育者更加关注每个学习者的特点、需求、兴趣,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内容、方法,实现学习者的自主化、主体化、个性化。思政教育数字化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教育的智能化,提供智能化的学习辅助、教学支持、管理决策,实现教育的优化、创新、变革。第三,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育人的开放化和共享化。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使教育更加超越地域、文化的限制,提供开放化的学习平台、资源,实现教育的普惠化、平等化。思政教育数字化还可以促进教育的共享化,实现教育资源、经验、成果的共享,实现教育的协作、交流、创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处于一种日新月异、永不枯竭的动态过程中^[8]。

(二)塑造了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新生态

数字化为高校网络思政注入了新动能^[9]。以数字化赋能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体系、内容、方式等全方位创新,是推动构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生态的重要举措。第一,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完善了网络思政工作体系。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深耕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数据共享、数据画像、数据建模等方式畅通思政教育工作大循环,对思政教育过程进行智能管理与分析,完善智

慧校园、智慧课堂、智慧思政、智慧学工等平台建设,打造契合学生实际需求的网络思政工作体系,将网络思政空间建设成为引领青年思想的“主战场”。第二,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拓展了网络思政教育内容。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激发数字化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大数据精准化、精细化、精致化投放优质思政内容和产品,把握新时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维特征,创新网络思政教育内容的表达形式,打造出个性化、创意化的网络思政教育内容,实现网上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将网络思政空间建设成为凝聚青年共识的“能量场”。第三,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了网络思政工作方式。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释放数字化技术效能,合理使用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提高了网络思政工作精准力度与配置效率,做到精准滴灌、润物无声。通过数字技术的合理应用,打造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融合高校思政特色、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沉浸式思政课程,创新了网络思政教育的工作方式,将网络思政空间建设成为汇聚青年力量的“强磁场”。

(三)延展了高校思政课程教学的育人宽度

数字化介入思政课程,革新了高校学生学习的场域和方式,无形中提高了思政课程育人的宽度^[10]。第一,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扩大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实践领域。在传统思想政治课中,其授课地点以特定的实体空间为主体,学生数量有限,时间、空间受限。数字化通过大范围的实时网络技术,使得思政课老师和学生可以打破时空束缚,构建实时互动和视听兼备的智慧课堂,从而打破传统意义上老师只能在课堂上教学的局限性。第二,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扩大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在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主要是依托教材、辅助工具以及教师的记忆储存等方式进行选取,但是在此基础上,数字化可以利用AI技术,通过对知识引擎和知识服务的运用,在很快的时间内收集到大量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打破了各领域之间的屏障,充实了思政课程的资源库。第三,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性教育。就课堂实践来说,常规的思政课堂实践主要是通过主题演讲、红色观影、课堂讨论等形式开展的,而这种实践模式不能让学生获

得更直接的感官经验。数字化通过VR虚拟模拟技术,可以把穿越时空的情境、人物和事件导入到课程里,同学们通过可佩戴的装置或者设备,从自己的感官视角去观察、体验和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知识,引发情感共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11]。

二、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

(一)顶层设计:监管体系与运行机制建设不足

由于目前高校思政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够深入,两者深度融合尚需整合及完善,也暴露出顶层现实问题。第一,缺乏科学的智能监管。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平台的监督管理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数字安全监管标准落后、平台审计标准落后是主要原因,并且目前多数高校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数字监管流程,发现问题具有滞后性,无法保证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效果。第二,缺少一套协同工作机制。目前,许多高校构建了各种类型的数据平台,但是各个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数据平台都是根据部门要求和市场需求而构建的。在编码解码、质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各个服务数据很难达到统一,难以形成巨大的合力。第三,缺失一定的保障机制。当前高校数字系统的运行存在一定的安全漏洞,校园网络不稳定且易遭受外部攻击等都为数字化的运用带来一定的障碍,而高校的软硬件设施还没有完全到位,相应保障机制并不完善,这些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暂时无法达到应有的良效^[12]。

(二)教学过程: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融合欠缺

当前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落脚主要集中在“物理信息”向“数字信息”的转变,大多停留于数字化技术的借用或表面改造,致使二者不能实现深度融合。第一,数字化技术设备有待升级。很多高校非常重视数字化建设,开发了一些数字化平台,如数字教务、数字图书馆、数字学生管理系统等,但这些数字平台之间并不能集成融合,数据无法共享,局限性较大。同时,数字信息技术发展迅速,数字化设备更新换代频繁,高校

思政教育的数字化升级建设压力较大。第二,思政工作者数字化素养有待提升。高校思政工作者大多为文科出身,对于数字新技术的掌握并不娴熟,收集信息数据并进行大数据分析等工作就更加困难,同时精通思政教育和数字新技术的人才较少,整体提升思政工作队伍的数字化素养非常迫切。第三,教育公平易出现新隐患。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易将学生置于“信息茧房”,数字产品开发者的逐利特性使其在高校思政教育产品设计研发阶段忽略特殊人群的需求,给边缘群体带来困扰,致使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不恰,“数字鸿沟”随之拉大,反而加剧高校思政教育的不公,违背了立德树人的初衷^[13]。

(三)技术运用:数字手段与育人工作匹配受限

依托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一定程度上数字异化、育人偏差的潜在风险。第一,出现了关系互动的失序化。从内容来看,数字化存在着对思政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的科技追求,教育资源的教育正向功能有所削弱。飞速发展的数字科技,使高校学生的思维出现了断层,而高校学生又利用数字手段获得了大量娱乐化和社会化的信息,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先入为主”,并不能很好得到主流价值的正面指导。第二,造成了育人目标的差异化。从目标来看,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存在着大量的数据“任务”,教师和学生“在任务之间不断忙碌,出现了“技术主导”大于“价值引导”的现象,偏离了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意义所在,导致了铸魂育人目标的偏差。第三,产生了伦理问题的失范化。从方式来看,因为数字技术的便捷、高效、智能等特点,一些思政教育工作者常常过分地依靠数据、数字,将其视为自己进行分析和评判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辩证思考能力,他们将数字化教育简化为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授知识,忽略了数字化育人的责任问题、伦理问题,沦为数字工具的附属品。

(四)共识协同:“人”“数”关系与核心理念认识阙如

思政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本质是基于“人”的视角进行思考,充分发挥人的主动能动性,而当下的

数字化赋能思政教育尚未充分认识这一核心理念,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维度。第一,导致“人”“数”关系的模糊化。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中,“人”“数”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部分高校单纯以“数字决定论”推动思政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其发展偏离了铸魂育人的价值导向,形成以数字技术为唯一准则的错误趋势。数字化技术的外嵌式场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数字技术与价值引导的相互割裂。第二,影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忽视学生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德育,数字化不加节制的滥用,还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沟通技能与和谐社会关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勤于思考能力等各方面能力都会不同程度地受限,与利用数字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初衷相悖,反而造成了高校思政工作者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抵触心态。第三,理念协同无法落到实处。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数字化变革的敏感性、接受度和支持度都比较低,还没有形成数字化的思考能力。他们对数字化的理解还局限于单纯地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宣传 and 科普,以及利用互联网交互工具来展示课程内容等方面,这些单向的理解妨碍了数字技术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结合,尚未做到切实落实。

三、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路

(一)统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方案

高校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阵地,必须紧扣政治性和时代性,运用数字手段规划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总体安排。第一,高校需要建立跨部门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协同机制。思政教育的数字化并非仅仅是某一环节的数字化,而是要在全流程和全领域上实现数字化转型。为此,需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动思政教育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学校还应该积极和教育界、产业界等合作,鼓励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数字化建设,提供各类支持以推动思政教育完成数字化转型工作。第二,高校需要完善数字化校园管理。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校园工作管理的智能化,提高思政教育管理的效率。例如,通过数字化的学生

课程管理、数字化的思政教育教学评价等,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问题,为思想政治延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数字技术还可以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帮助教育者了解高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通过对网络言论的智能识别和情感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问题,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高校需要实现思政课数字化。数字技术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支持。通过“一人一策”的数字化教学,可以精准衔接教育对象的个人经历、心理画像和成长背景,推动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识别和追踪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变化,为个性化教学方案提供数据支持,紧密结合了教育主客体的思想的动态变化与实际需求。

(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数字素养

我国思政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推进,对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亟待提高教育主体的数字化素养^[14]。第一,转变数字化理念。教育主体必须积极适应数字化的变革,正确树立数字资源和技术应用认知,深刻认识数字技术的育人优势。高校思政工作者需明确数字伦理规范,提升数字信息价值导向的识别能力,并主动学习高质量的数字教育内容,转变对数字化应用思政教育的恐惧和抱怨。第二,强化数字化培训。要依据教师的数字化素养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比如,面向一线老师,进行网上教学平台、智慧黑板、虚拟实验室等数字化实践的应用训练。同时,丰富培训方式,可以采取“线上+线下”或“订单式”送培到校的方式,既提高效率又能保证效果。通过系统培训,使教师掌握数字化教学的基本技能,切实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第三,推动数字化实践。鼓励老师们在思政教学过程中运用数字手段,并与高校学生分享并交流一些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还应鼓励教师主动地参与到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中去,使数字教学资源库能够持续地充实和扩充,以便于教师按照自己的教学需求进行检索和使用。同时,构建一套动态的评估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对数字教学环境中教师的教学行为以及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对数字应用场景进行描绘,以便反哺高校

思政教育课程和活动。

(三) 夯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育人全过程

数字化是基于数字技术、数字思维与数字方法而建构的,它可以提供“全天候”开放共享的思政教育数字资源,从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延续育人的全过程。第一,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出“虚”“实”相融的高校思政教育场景。高校思政教育需要借助虚拟现实和数字仿真技术,将沉浸式的思政课变得更具体验性和参与性,同时基于数字孪生和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VR思政体验课程,整合红色资源和思政素材,模拟再现不同岁月的环境和情景,采用不一样的方式诉说和感受红色岁月,引发情感共鸣,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第二,利用数字技术,打破思政育人的时空局限性。教育部建设的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中宣部主管的学习强国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互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高校需要积极引导利用联网设备主动在线学习,并打造人人皆可学习、处处时时可学习的良好氛围。第三,利用数字技术,变革高校思政传统模式。夯实全过程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重点在于两个层面发力。其一,对高校思政教育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通过对数字理念和技术的把握,创新教育教学的模式。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对教育客体的学习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及时调整教育主体的教育方式,从而满足高校学生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需求。其二,对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评价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教学评价体系具有监测和矫正之效,数字化技术利用其优秀的存储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记录教学过程及结果。通过追踪反馈形成科学的过程性评价,并反哺思政教育课程和实践,为思政教育全过程的质量提升奠定了基础^[15]。

(四) 坚持以人为本,探索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模式

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事业融合发展,必将坚持以人为本,形成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发展模式。第一,塑造协同育人的发展模式。高校在构建数字化思政育人体系时,必须更新传统观念,将数字化理念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创造良好

的数字化环境,营造科学的数字化氛围,实现显性和隐性双重育人结合,将数字化与思政教育大局及日常教学有机融合,去中心化的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扩大了教育主客体的参与范围,教育主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极大发挥,形成合力,实现协同育人。第二,探索人机协同的发展模式。数字化促进思政教育教学形态发生转变。网络学习、混合式教学成为教学新常态。数字化驱动教育教学方法产生创新。慕课与在线教育深刻地改变了教师“教”、学生“学”、大学“管”的方式,塑造随时随地、人人可学的思政教育新形态。翻转课堂、混合学习、微课等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模式与方法层出不穷,传统的师生互动模式也逐渐转变为数字化时代的“师+机+生”协同模式^[16]。第三,打造师生互信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数字化具有的非对称加密技术,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师生双方互信的良性互动中获得创新^[17]。以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变革,需要牢牢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充分开发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活用虚拟现实技术拓宽教学场域,以此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既鲜活又“解渴”^[18]。以信任为契机,多向交互构建大思政育人新格局。

四、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尚处在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创新数字化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迫在眉睫。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数字化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鉴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在顶层设计、教学过程、技术运用和共识协同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现实隐忧,故而要以战略性眼光,围绕思政育人、网络思政和思政课程三个维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效能,因势而新地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设计、数字化素养、数字化过程、数字化模式等具体层面的路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还要持续深入地推进数字观念、数字方法和数字实践的变革,积极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数字化的态度,引导教育者深入研究数字化技术与思政教育的契合,从而切实推进数字化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助力新时代思政育人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2]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3]李强.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2024-03-06(3).
- [4]周明鹏. 智能算法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需互契研究[J]. 高校教育管理, 2024, 18(1): 47-55.
- [5]董旖旎. 元宇宙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7): 91-95.
- [6]谷永鑫.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建设及其价值意蕴、风险表征与实践进路[J]. 大学教育科学, 2024(1): 58-65.
- [7]王莎.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4): 92-98.
- [8]梁丽. 从四个着力点入手, 提升思政课教学话语力[N]. 光明日报, 2022-06-07(9).
- [9]李亚东, 阎国华.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设计[J]. 江苏高教, 2024(2): 84-88.
- [10]王健, 郑旭东. 新时代信息化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框架与建议[J]. 电化教育研究, 2022, 43(1): 100-105.
- [11]刘晓华.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8): 102-106.
- [12]许烨.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困境和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3(4): 156-163.
- [13]谈文彩. 数字游戏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耦合逻辑、问题透视与实践路向[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1): 41-54.
- [14]孙炳芳, 姜欣雨. 红色抗战家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实现路径探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2): 89-95.
- [15]武东生, 宋怡如, 刘巍.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1): 66-70.
- [16]李正军, 张岑.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 63-70.
- [17]孙巧真.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探索与实践[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 71-76.
- [18]赵丽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2): 46-51.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Digitization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GAO Jun, YU Manhua, SU Guoho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Digitization empow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hich reflec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with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It is an endogenous demand for disciplinar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responds to the era's question of soul building and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but it also reveal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nstruction of regulatory system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mited matching of digital means and educational work, and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umbers” and nuclear psychology. In the digital era, universities nee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he future, focus on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digital education,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implement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ntinuously cultivate new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76-08

基于案例资源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牛衍亮^{1,2}, 戴 畅¹, 马 亮³, 邓小鹏^{4,5}

(1. 石家庄铁道大学 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2. 石家庄铁道大学 工程建设管理研究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3.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4. 东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5. 东南大学中国-巴基斯坦重大基础设施智慧防灾“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课程思政旨在塑造学生的精神力量,而思政元素是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必备资源。在梳理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思政元素体系的基础上,选取51个国际工程典型案例构建文本信息库,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逐级编码,识别出13个思政元素,进一步建立包含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专业素养和自我价值4个类别的思政元素体系。该体系为国际工程管理教育工作者实施课程思政改革提供素材参考,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印证,支持国际工程管理人才德才兼备品质的培养,也为其他课程凝练课程思政元素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思政元素;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5.01.11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到2020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简称《纲要》),全面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成为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和必备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纲要》中将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作为核心点,旨在塑造学生的精神力量与专业能力的培养相辅相成,体现了把推动课程思政全程融入课堂教学建设的重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统一,可以形成育人合力、发挥出课程育人的功能。

专业教育可以保证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的下限,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心中建立的精神力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职业发展的上限^[1],为学生的未来创造出不可限量的可能性。

“国际工程管理”是面向工程管理、土木工程等本科专业,或管理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等研究生专业的一门专业课。“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有着天然的思政优势,因为在国际工程案例中蕴含着大量思政元素。一方面,可以形成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可以将思政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结合^[2],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投身大国

收稿日期:2024-06-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高铁联营体竞合机理与策略研究”(72071133),“国际工程知识网络的构建、测度及治理研究:理论、实证及应用”(72171048);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工作重要论述在院系层面的落实机制研究”(C2022008);石家庄铁道大学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重点项目“思政引领下的工程管理专业产教协同育人探索”(Z2022-6)

作者简介:牛衍亮(1983—),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工程管理。

通信作者:邓小鹏(1972—),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工程管理。

本文信息:牛衍亮,戴畅,马亮,等.基于案例资源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挖掘[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76-83.

工程、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使命感,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必备资源是思政元素,然而当前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思政元素仍有待被系统梳理。

本文选取 51 个典型国际工程案例进行思政元素挖掘,梳理出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国际工程管理思政元素框架,有利于教育工作者将思政元素渗透和贯穿在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将思政元素融入国际工程管理课堂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精神力量,与学生的国际工程管理专业能力的培养相辅相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积蓄后备力量。

一、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3],推动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2018 年课程思政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4]。2020 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使得课程思政成为大学课程的必备内容,目前,各高校在“课程思政”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2022 年教育部等十个部门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了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等 5 项举措,为巩固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做出准备。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融入高等教育课程的各个环节,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目标,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5],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表明了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符合发展需求的,也进一步说明了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需要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原则,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6],各类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有必要进行观点的提取、内涵的分析和理论的总结^[7]。思政元素以精神价值和文化基因方式存在,是从庞大的教育教学体系中找到的立德树人思想下的内在关联,具有正面价值引导作用,蕴

含在专业知识中,与立德树人这一价值追求相符合的元素均可以称作思政元素^[8]。思政元素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融合了知识、技能元素形成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9],多元的思政元素有助于课程思政目标的明确^[10]。思政元素的挖掘是真理与价值的融合^[11],也是凝练、抽象、总结和升华的过程。进行专业思政挖掘,既能丰富课程思政元素,也为教学和企业提供案例范式^[12]。扎根理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定性数据分析,并在教育学^[13]、心理学^[14]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与实践,能够系统地从资料中发现符合实际情境的说明和解释^[15]。因此,本文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案例资料中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进行充分挖掘,以梳理出思政元素体系,可为其他学科课程思政元素的凝练提供方法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 Glaser 和 Strauss 提出的适用于质性研究的一种方法。对实践中的现象和经验资料进行分析,将概念从实践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提出新概念和范畴并形成清晰的体系^[16],归纳出扎根于实际资料的理论。从实际的资料入手,自下而上地进行理论探索,在收集、分析资料的过程中进行归纳概括,上升为普适性的理论,适用于深入挖掘和提炼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从而梳理出基于国际工程典型案例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

本文将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编码整合,结合国际工程管理的教育教学内容,整合提炼和挖掘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进行进一步划分梳理,为国际工程管理教育工作者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提供思路,使用 Nvivo12.0 软件作为文本数据的辅助分析工具。Nvivo 系列软件在质性研究中应用广泛,适合对本文中的文本数据进行研究^[17]。图 1 展示了扎根理论结合 Nvivo12.0 软件对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编码整合的 3 个关键步骤及其示例,以便更清晰地展示数据处理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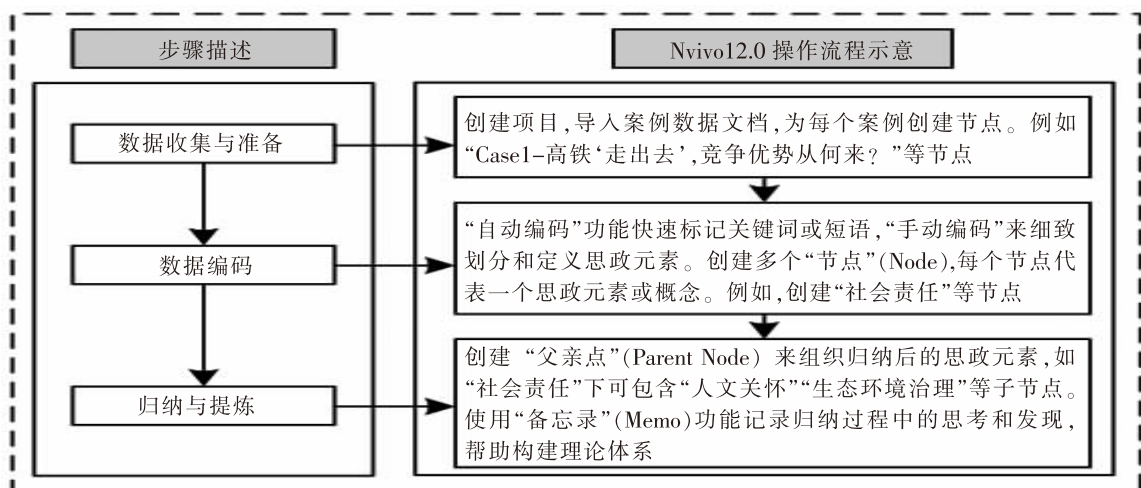


图 1 Nvivo12.0 软件处理流程

(二) 案例选择

案例选择的标准:典型性、覆盖性和资料可获得性^[18],本研究选取案例的标准是:①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国际工程背景和国际工程特点;②具有多类型的项目覆盖;③具有相关的学术文献和资料。

结合案例的选择标准,本文的案例来源于《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分别以“国际工程”“国际 EPC 项目”“国际招标”“中国企业”“国际化”为关键词,共检索出符合国际工程主题的典型教学案例 51 篇,涉及到“‘一带一路’倡议专题”“国际工程企业社会责任”“中国高铁国际招标案例”等共计 11 类案例专题,充分挖掘国际工程实践及科研成果中的思政元素,最终整合成近 14 万字的文本资料,这些文本资料覆盖 51 个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为接下来进行扎根理论的编码工作奠定基础。所选取案例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案例基本信息

编号	案例专题	案例数/个
01	中亚油气管项目	9
02	国际工程 EPC 项目	2
03	海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工程项目	3
04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工程项目	1
05	非洲 Mubasin 石油开发项目	2
06	国际工程社会责任案例集	21
07	中国企业国际化征程案例	6
08	中国高铁国际招投标案例	2
09	国际工程合同管理	1
10	企业国际市场风险	1
11	国际工程跨文化管理	3
总计		51

三、文本数据分析

本文遵循研究设计中选取的扎根理论方法进行文本数据归类。首先,随机选取 80% 的案例数据按照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程序进行逐级编码,编码工作由两位研究者进行,第一位确定范畴,抽取 25% 数据交由第二位研究者确定范畴,通过保证两位研究者编码的一致性程度确保编码的一致性信度^[19],初步梳理出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最后将剩余 20% 的案例数据用于饱和度检验。

(一)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文本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实现资料概念化的过程^[20]。随机选取 41 个国际工程典型案例的文本资料数据,将剩余 10 个典型案例的文本数据用于理论饱和度和检验,把数据文件导入到 Nvivo12.0 软件中,将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有关思政元素的文本资料进行“打破”“揉碎”并进行重新组合建立新的理论概念和体系,在进行开放性编码时需要保持客观的态度,摒弃已有认知或偏见,从中提取出与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相关的原始语句,将整理的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细致的信息登记录入,对样本文本数据进行不断地比较和修改、归类整合,使得文本数据逐渐概念化。开放性编码的结果是对案例文本数据的初步挖掘,概念化以后,梳理出中国力量、自强不息、爱国主义、合作共赢等 49 个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概念类别。

（二）轴心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任务是将开放性编码得到的概念化资料进一步对比分析，建立概念化资料类别之间的联系。本文在开放性编码得到的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的 49 个概念化思政元素类别的基础上进行轴心编码，在进行轴心编码的过程中，每次轴心编码仅围绕一个概念化类别，找到与其相关的概念化类别，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先选定“精益求精”为基础关联点，“精益求

精”指的是追求完美的精神，为了打造更优质卓越的产品或服务，与之相关的有“坚韧执着”“爱岗敬业”“榜样作用”3 个概念化类别，将其纳入同一个范畴，即“工匠精神”。轴心编码通过多次归纳比较，将开放性编码所得到的 49 个思政元素进行类别概念化，得到了民族精神、国际视野、文化自信、人文关怀、改革创新、工匠精神、开拓进取、人生追求等 13 个副范畴，即得到了 13 个具有相同概念化类别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使其梳理结果进一步清晰。轴心编码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轴心编码结果

编号	副范畴	概念化类别
1	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开放包容、自强不息、中国力量
2	国际视野	国际声誉、国家战略、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意识
3	文化自信	制度优势、民族自豪感、民族归属感
4	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关爱民生、和谐共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尊重各自风俗习惯
5	生态环境治理	资源合理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6	科学决策	以身作则、高瞻远瞩、沟通协调、统率全局、敏锐洞察力
7	危机意识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8	改革创新	机遇意识、敢为人先、求同存异、技术变革
9	形象与信誉	公开公正、坚守承诺、实事求是、团队凝聚力
10	身心健康	积极乐观、相互尊重、职业健康安全意识
11	工匠精神	精益求精、爱岗敬业、榜样作用、坚韧执着
12	开拓进取	砥砺奋发、不惧艰难、勇往直前、勤于反思
13	人生追求	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科技报国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的是在开放性编码和轴心编码的基础上，围绕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持续不断的比较、对照、完善和验证，将范畴之间的联系再次精炼得到主范畴^[21]。通过选择性编码，将 49 个概念化类别和 13 个副范畴进行再次归纳，得到了

副范畴和主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三级编码的最终结果是从 41 个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不同类别的思政元素中得到了“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专业素养”“自我价值”4 个主范畴，选择性编码结果如表 3 所示。选择性编码的结果将轴心编码所得到的 13 个思政元素进行凝练，最终梳理出 4 大方面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

表 3 选择性编码结果

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1	家国情怀	民族精神、国际视野、文化自信
2	社会责任	人文关怀、生态环境治理
3	专业素养	科学决策、危机意识、改革创新、形象与信誉
4	自我价值	身心健康、工匠精神、开拓进取、人生追求

（四）饱和度检验

为了满足理论饱和的要求，运用保留的 10 个

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的文本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按照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步骤进行编码分析，所发现的范畴均已经出现，被

包含在已形成的范畴中,未发现新的范畴。下面选取部分案例资料作为证明。

(1)“目前各驻外分公司大力启用当地员工,在经营过程中始终把解决当地居民就业、提高当地员工职业技能放在重要位置”体现关爱民生。“项目部领导和管理人员率先垂范作表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体现以身作则。

(2)“凭借强大、健康的企业文化,公司上下齐心协力保证了利益最大化和项目按计划进入融资关闭阶段”,体现团队凝聚力。“中国铁建承建此项目,政治责任高于一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体现使命担当。

由此可以判断,本研究梳理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结果符合理论饱和度的条件,最终梳理出稳定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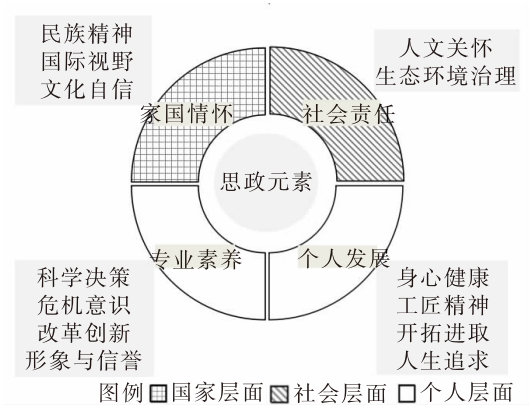


图 2 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

四、结果讨论

通过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以及选择性编码的三级编码过程,不断比较和完善,从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中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最终梳理出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思政元素体系(如图 2 所示),梳理的思政元素体系包括“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专业素养”“自我价值”4 个主范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文件,提出在学科教学中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有助于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具体分为文化基础、社会参与、自主发展 3 个方面;并且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从国家、社会、公民 3 个层面对大众进行价值观的引导,本文所确定的 4 个范畴由国家、社会和个人 3 个层面组成,价值定位与课程思政的内涵相通相融,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印

证。教育工作者通过课堂中的教学行为引导学生,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国际工程管理课堂教学中,在国际工程管理课程传递专业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塑造学生的精神力量,与学生的国际工程管理专业能力的培养相辅相成,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良好专业素质和正确价值观的国际工程管理领域内的有用人才,为“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积蓄后备力量。

(一)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属于国家层面,包括民族精神、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 3 个方面。其中,民族精神是体现家国情怀的重要因素,爱国是主旋律,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现中国力量,显示中华民族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当今世界处于同一个地球村,要有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野,了解国家的战略,维护国家声誉,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2]。随着我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国际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智慧,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也因此油然而生。

(二)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属于社会层面,具体包括人文关怀和生态环境治理两个方面。其中,承担国际项目建设者角色,要时刻明白肩上的责任,在国际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谐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做关爱民生且对当地有切实好处的工作;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当今世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正在构建,在进行工程建设时要注意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为企业从事国际工程活动,为整个社会贡献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三)专业素养

“专业素养”属于个人能力层面,体现在科学决策、危机意识、改革创新,以及树立良好的形象与信誉 4 个方面。进行专业素养的培养要求重视团队的凝聚力,在进行人员管理时采取变通思维,了解员工真实的需求,并且保证在建设项目过程中采取切实行动,做好本职工作,通过树立良好的形象与信誉,才能使得国际工程项目获得持续且良好的国际声誉;企业的领导者是整个企业的主

心骨、掌舵人,通过以身作则起到对全体员工的带动作用,在关键时刻通过敏锐洞察力挽救企业于水火之中,目光远大,高瞻远瞩,带领企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风险不确定情况下,做好随时应对意外事件的准备,在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只有创新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力,敢为人先才能占领国际工程项目的市场先机。

(四)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也属于个人层面,指导个人的生活发展,塑造个人精神力量,具体包括身心健康、工匠精神、自我价值和人生追求4个方面。明确人生的价值,传达积极乐观的态度和保护自我生命健康的理念;提升自我素质,向榜样看齐,对待工作一丝不苟,面对困难有毅力,肩负起工作的责任;奋发向上,拼搏进取,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人不仅是个体,还具有社会属性,勇于担当起时代的使命,报效祖国,实现人生的追求,也将有助于实现个人的终身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将选取的51个国际工程典型案例进行整理得到的文本信息库进行逐级编码,梳理出了由国家、社会和个人3个层面组成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基于梳理的国际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本文从国家、社会和个人3个方面为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教育工作者将课程思政元素体系融入课堂教学提供参考,为促进个人精神力量的塑造与专业能力的培养相辅相成提出了4点建议。

(一)党的教育方针指引高等学校必须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

国际工程管理课程的教育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时,可以通过国际工程中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了解国家的战略政策,使得学生具备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关心国家发展,具备爱国情怀,以及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在当今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增强民族精神,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精神力量。引导学生将来从事国际工程相关工作后,用爱国之心积极推动国际工程企业发展,向世界展示中

国力量,推动国际工程企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紧紧依靠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背景下自强不息,在国际工程市场建立起良好的中国企业国际声誉,获得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牢铸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合作共赢。

(二)履行社会责任是国际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应尽的社会义务

在国际工程管理课堂中,教育工作者通过与学生分享国际工程典型案例,使学生体会人文关怀在国际工程项目建设中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树立起生态环境治理意识,引导学生走向国际工程相关岗位后,积极推动国际工程企业需要走好社会责任的践行之路,树立中国企业关爱民生的形象,与当地居民和谐共处,尊重风俗习惯,兴建惠民工程,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促进当地社会发展。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在国际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合理地利用资源,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全面发展的人”是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核心主旨

对于学生的培养,需要同时关注个人发展与专业素养。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在国际工程管理课堂中要注重学生个人发展情况,引导学生具备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学生砥砺奋发,面对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在国际工程领域大展身手,担当起科技报国的时代使命。使得学生在走向国际工程相关岗位后,时刻关注人的自我价值,不断提升自我认知水平的终身学习素养,以期实现长远发展,成长为提升国际工程企业竞争力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培养,首先是培养健康的身心,然后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工作者在国际工程管理课堂中要注重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促进思政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结合。学生将来走向岗位后,要注重提升团队管理能力、团队凝聚力,以及形象与信誉,通过以身作则助力国际工程项目成功,用高瞻远瞩和敏锐的洞察力做好国际工程项目的掌舵人,积极进行沟通协调,做到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在改革的道路上敢为人先,带领我国国际工程企业在世界大舞台中获得持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杨欢. 学生获得感在高校思政课过程性评价中的价值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3): 81-86.
- [2]豆勇超. 思政课教师大数据素养的时代价值、实然困境与实践路径[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5(4): 66-71.
- [3]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4]陈宝生. 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Z3): 4-10.
- [5]高德毅, 宗爱东.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 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 中国高等教育, 2017(1): 43-46.
- [6]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382.
- [7]杨守金, 夏家春. “课程思政”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9, 35(5): 98-101.
- [8]石丽艳. 关于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的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 2018(10): 41-43.
- [9]许小军. 高校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元素探讨[J]. 江苏高教, 2021(3): 101-104.
- [10]李瑞琴. 新时代高校有效推进课程思政的再认识: 以国际经济学课程思政实践为例[J]. 中国大学教学, 2022(12): 22-27.
- [11]侯钰婧, 刘宇文. 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内涵解构与开发方略[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1): 105-110.
- [12]韩宪洲. 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着力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7(2): 1-6; 15.
- [13]毛智辉, 睦依凡. 跨学科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 (6): 83-89.
- [14]尹贻林, 徐志超. 工程项目组织中信任状态的发展与演进: 中国管理情景下的探索性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17, 31(2): 74-83.
- [15]贾旭东, 谭新辉. 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J]. 管理学报, 2010, 7(5): 656-665.
- [16]GLASER B G, STR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J]. Nursing research, 1967, 3(4): 377-380.
- [17]姜鑫, 王德庄.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 NVivo 12 的质性文本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 45(12): 92-102.
- [18]王举颖, 石潇, 李志刚. 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海洋产业筛选与融合机制: 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1, 14(4): 383-395.
- [19]王璐, 高鹏. 扎根理论及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探讨[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0, 32(12): 10-18.
- [20]张晓飞, 王豪, 高常玲, 等. 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1, 14(6): 573-587.
- [21]许祥云. 研究生与导师互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1): 59-66.
- [22]沈壮海, 马驰骋.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J]. 党的文献, 2022, (6): 45-55.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urses Based on Case Resources

NIU Yanliang^{1,2}, DAI Chang¹, MA Liang³, DENG Xiaopeng^{4,5}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4.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5. China-Pakistan Belt and Road Joint Laboratory on Smart Disaster Prevention of Major Infrastructur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piritual strength,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erving as essential resources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course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urses, a textual information repository was constructed by selecting 51 typical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ases. Using grounded theory, these cases were systematically coded to identify 13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a systematic framework comprising four categories of patriotism,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self-worth was established.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references for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ducators to implement reform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t correlat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support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oreover, it offers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s for ref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other cours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grounded theory

~~~~~  
(上接第 54 页)

##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Enabl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ANG Zijuan, MENG Yao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the cornerston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the population base remains huge, but the fertility rate continues to decline, and the rate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s accelerating, which worsens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aging problem;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hich has driven economic prosperity,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e areas of medical care and employment during the process. Throug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re element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ffecting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flow.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a large population country to a strong human resources country. The task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arduous and the road ahead is long. The key measures are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resources, str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age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bile popu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geing popula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low fertility ra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84-07

## 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职责使命与建设路径

方 兵

(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是高校思政课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的依托单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并在制度安排上为建好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供了方向指引。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工作任务。聚焦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肩负的关键职责,厘清其基本职责和主要职责。进一步从高校践行“五大重要使命”视域明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使命担当,有利于高质量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立足新时代新要求,高校应从教育教学、研究宣传、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职责使命;立德树人;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12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它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sup>[1]</sup>。从学院数量变化来看,我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于1992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之后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速度较为缓慢,2012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仅有100家,但到2021年底已发展为1400余家,2024年超过2000家。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马克思主义学院担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等特殊使命和重大任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功能<sup>[2]</sup>。立足新时代新要求,高校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当前,我国高校都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但如何建好建强新时代高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 一、聚焦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关键职责

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我国高校的基层教研组织,它所担负着的特殊使命与任务,既决定它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意味着它与一般的二级学院相比有其特殊性<sup>[3]</sup>。建好建强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首先要明晰其关键职责。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院肩负着科学系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责任、学科建设的责任、人才队伍培养的责任<sup>[4]</sup>。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23年版)》,将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关键职责概括为3个方面,其基本职责是“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职责是“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做好决策咨询和理论宣讲服务”。

收稿日期:2024-05-27

基金项目:江苏省202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研究”(2022SJZDSZ017)

作者简介:方兵(1987—),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信息:方兵.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职责使命与建设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84-90.

### (一)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基本职责,也是第一要务。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定位来看,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铸魂育人的主渠道。有学者提出,积极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发展的中心任务<sup>[5]</sup>。关于如何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是马克思主义学院首先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如专门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和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将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升到战略高度。

围绕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于2011年、2015年、2021年先后出台了3个版本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履行好这项基本职责,就必须以最新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等政策文件为遵循,认真对照其中的各级指标,结合自身办学实际,扎实推进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此外,高校要实现高质量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圆满完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和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具体要求的前提下,还应该充分结合地方特色和学校办学优势,总结提炼出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色、亮点。

### (二)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在新时代,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全面建设一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sup>[6]</sup>。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既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一项中心工作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的首要任务是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服务,即为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立足目前我国各地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实际,提倡因地制宜地开展学科建设,主要将其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其一,有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或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专业,它们只负责承担本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对于这些高校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并不是没

有学科建设的职责,它们履行学科建设的职责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上,应该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阐释:一方面,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开展科研工作;另一方面,聚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开展深入研究。

其二,针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它们的学科建设职责除了开展科学研究外,还承担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任务。概括来说,一是把好“学科定位关”,完善二级学科设置,凝练专业发展方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实现联动发展,进一步开展学科交叉融合与跨学科研究。二是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三)做好决策咨询和理论宣讲服务

高校的3大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除了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外,同样承担着做好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责。服务于社会,既是马克思主义学人锻炼提升自己的契机,也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存在的前提<sup>[7]</sup>。立足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实际,它的社会服务职责主要体现在决策咨询和理论宣讲两个方面。

一是提供决策咨询服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要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和实践经验总结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咨政,并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咨询报告。例如,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我国各地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了系列活动,而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如何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则需要针对性开展有关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而言,他们具备了相关专业的理论功底,能够针对这些工作深入地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而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等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二是开展理论宣讲服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应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最新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理论宣讲活动。例如,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全国上下都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学习活动,从中央到地方都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理论学习宣讲团,部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也在这些理论学习宣讲团中承担着宣讲任

务。此外,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创作通俗理论读物,参加各类媒体的政论类节目等也属于理论宣讲范畴,同样是践行社会服务职责的重要体现。

## 二、明晰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使命任务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sup>[8]</sup>。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直属学校领导的独立二级机构,它是高校践行“五大重要使命”的关键力量,主要负责统筹本校的思政课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的管理、培养、培训。由此可见,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的使命任务,就是切实担负起“五大重要使命”,以下内容将具体对其使命任务展开阐释。

### (一) 人才培养: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我国高校的根本任务,需要由学校各基层教研组织给予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学院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也表现在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上,切实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庄严使命<sup>[9]</sup>。对于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它直接承担着培养时代新人的光荣使命。从践行人才培养的路径来看,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落实人才培养。高校思政课有理论教学、引导青年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任务<sup>[10]</sup>,其面对的教育对象是来自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等,这些课程是以公共基础课的形式贯穿于学生的课程体系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升不同学段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进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其自身特殊性,它参与高校各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通过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关专业来落实人才培养,主要是开设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和相关硕博专业,以培养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

专门人才。从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前一方面是所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都要承担的使命任务,后一方面是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需要承担的使命任务。概括而言,所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都应以落实人才培养为中心工作,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二) 科学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高校设立的基层教研组织,同样承担着科学研究的使命。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重视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来说,开展科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一是结合专长开展学术研究。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相应二级学科开展学术研究,并有明确的二级学科归属。目前,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教师而言,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自身研究专长开展理论研究,关注学科前沿、引领学术创新,从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提供服务。

二是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注重凝练形成与所教课程紧密相关的科研方向,并且深入研究课程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和改革创新教学方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日常思政课教学的需要。尤其针对开展研究所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教学研究成果,教师应该及时将它们转化为可用的教学资源,有机融入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更好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 (三) 社会服务:发挥咨政和宣传教育作用

社会服务不仅是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一项重要的使命任务。作为直属于学校党委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需要履行社会服务的责任。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和学科优势,学院教师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究专长,他们能在社会服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目前部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在校内外智库中兼任有关职务,他们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各自学术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能够更好地发挥咨政作用。

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鼓励教师在参与理论宣讲等工作中积极发挥自身价值。当全国和省级“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各地会成立相关的理论学习宣讲团,此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宣传阐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另外,根据《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46号)文件要求,政府主管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支持思政课教师到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等开展实践锻炼”<sup>[11]</sup>,这为教师开展社会服务提供了机会,便于他们实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工作。

#### (四) 文化传承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校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的光荣使命,作为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则要具体落实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今天仍然需要大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12]</sup>,这为推进今后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而言,应重点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研究,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作出深入系统的阐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13]</sup>。这对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展开深入研究,它同样是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概括而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应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针对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开展研究,又应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

日常思政课教学中,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而更好地践行党的教育方针。

#### (五) 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学院国际化办学水平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高校肩负的又一项使命任务,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同样要深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2012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有关文件明确指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国际影响力”<sup>[14]</sup>。所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重视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实践、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国际影响力较弱<sup>[15]</sup>。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与国外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开展交流合作,大力推进学院的国际化工作。2021年9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国际化工作提出了要求。

进入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重视加大国际交流合作力度,当前应从以下两方面给予落实:一方面,重点围绕教师队伍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开展工作,鼓励师生赴国外相关高校开展研修或学术交流,或者继续攻读相关专业学位,不断拓展师生的国际化视野。另一方面,积极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交流平台,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如推动中外马克思主义优秀学术成果互译,创办相关外文学术期刊,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支持和鼓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论,向国外更好地展现新时代的中国,不断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 三、强化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路径

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是党和国家培养时代新人的要求,也是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需要<sup>[16]</sup>。当前,我国高校要建好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就必须将其职责使命落实落细,在新时代展现出新作为。《意见》明确提出,“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教育教学、研究宣传、队伍建设、人才



培养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亟待加强”<sup>[17]</sup>。所以,推进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将重点解决以上5个方面的差距和不足作为学院建设的有效路径。

### (一)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sup>[18]</sup>。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并将其积极融入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切实增强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具体来说,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应从4个方面给予推进落实:一是紧密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注重正反对比,引导青年学生理解和认同科学真理,进一步认识我国国情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二是创新教学方法,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提倡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来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形式,如充分运用智慧教学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三是加强教学管理,要按照《标准》的相关要求,做实做细日常教育管理工作,积极推进教学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如探索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科研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简称“数字马院”)。四是深化实践教学,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大工程”<sup>[19]</sup>,以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对忽视实践教学环节,所以要重视开展实践教学,引导和鼓励走出校园、迈向社会,善于运用“大思政课”,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起来。此外,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应牵头参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尝试运用新策略、新方法。

### (二)扎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阵地<sup>[20]</sup>。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主体力量,扎实做好研究宣传工作尤为

重要。进入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以更好地服务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具体而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落实:一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既要继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开展研究,又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进行研究。二是密切关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积极回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能够提出针对性强的解决方案或决策咨询服务。三是加强学术团队建设,主动与其他高校、政府、智库等单位之间联系交流,倡导科研协同合作,促进彼此优势资源互补,围绕某一研究领域组建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四是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学院要为教师创造条件和机会,鼓励他们主动宣传、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旗帜鲜明地对错误思潮、错误观点展开批判,从而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积极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队伍建设

要建好建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关键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sup>[21]</sup>。推进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队伍建设,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的“六个要求”,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专业发展。具体而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应从4个方面给予推进:一是做好人才队伍建设顶层设计,制定本学院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规划,按照规定标准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主要通过校外引进和校内选聘的方式,还鼓励聘任校内外有相关学科背景的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二是加强教师队伍管理,既要严格把好新教师的“入口关”,让符合思政课教师岗位要求的优秀人才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又要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教师的考核工作,重点考察“政治关”“师德关”“业务关”,完善不合格教师的退出机制,确保学院教师队伍实现良性发展。三是做好教师研修工作,高校思政课的课程内容更新较快、突出与时俱进,这需要思政课教师能够坚持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因而学校和学院要为教师提供培训研修、挂职锻炼机会。四是加强政策保障服务,学校要结合思政课教师特点,健全突出教学优先

的评价体系,完善教师地位和待遇保障机制,重点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待遇、身心健康等方面做好保障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思政课教师的教学场域和技术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sup>[22]</sup>,高校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要注重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数字素养,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 (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质量

马克思主义学院肩负着人才培养的职责使命,新时代更加强调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质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人才培养,需要把握精神品格、核心素养、根本路径三重维度<sup>[23]</sup>。具体而言,未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专业的学院,其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如承担着本(专)科和研究生的思政公共课教学任务,关键是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以不断提高育人质量。针对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专业的学院,它们还承担着专业人才培养工作,肩负着为我国源源不断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人才。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及时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和规范培养路径,加强过程管理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立足新时代新要求,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模式,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和社会发展,重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等。针对部分办学实力较强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如全国重点马克

思主义学院,应大力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培养制度体系,能够使其真正成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排头兵”,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急需的高层次优秀人才。

#### (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时代发展所需,更是自身使命任务使然<sup>[24]</sup>。学科专业建设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容。因此,要重视并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建设。进一步而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准确把握学科定位,做好学科建设规划,积极推动相关学科专业实现优先发展、优势发展和优质发展。具体来说,应从以下3个方面给予推进:一是建好建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依据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和本校学科专业建设实际,规范和完善学院二级学科设置,合理凝聚专业方向,着力构建符合本校特点的学科优势特色。二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引领作用,既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建设,推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相关学科的联动发展;又要推动与人文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协同发展,通过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培育出新的学科生长点。三是立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已有学科优势,及时抓住学科专业发展机遇,做到有针对性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参考文献:

- [1]陈占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由来和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9):4-7,14.
- [2]林刚,李亿.高质量建设地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路径探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7):69-77.
- [3]苏煜,李建华.厘清与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定位、功能及相关问题的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8(11):115-119.
- [4]高国希.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责任[J].思想理论教育,2015(2):30-32.
- [5]王跃,王永贵.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促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15(5):33-36.
- [6]王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N].学习时报,2019-04-24(1-2).
- [7]张海荣.马克思主义学院服务社会内容及途径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78-82.
- [8]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2-28(1).
- [9]王易.新时代建好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2):101-106.
- [10]杨筱洁.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究[J].学术探索,2023(8):149-156.
- [11]教育部.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EB/OL].(2020-01-16)[2024-03-16].ht-

- 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002/t20200207\_418877.html.
- [12]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19.
- [13]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14-15.
- [1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意见[EB/OL]. (2012-06-06)[2024-03-1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1206/t20120606\\_13805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1206/t20120606_138058.html).
- [15]艾四林, 刘武根. 提升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J]. 思想理论教育, 2015(11): 30-33.
- [16]谢晓娟, 冯贺. 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12): 113-118.
- [17]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办印发《意见》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N]. 人民日报, 2021-09-22(1,4).
- [18]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 人民日报, 2024-05-12(1).
- [19]张学礼, 李晓华.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及育人成效提升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69-74.
- [20]刘吕红.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历程、样态设计及实现理路[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9): 29-36.
- [21]肖贵清. 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0(2): 154-164.
- [22]豆勇超. 思政课教师大数据素养的时代价值、实然困境与实践路径[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66-71.
- [23]庞立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的三重维度[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2): 120-127.
- [24]韩喜平, 杨羽川.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学术界, 2023(11): 120-125.

## Responsibilities, Mission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FANG B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studying, researching and promoting Marxism, the school of Marxism is a supporting unit for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centered around comrade Xi Jinpi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and provided directional guida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in universities is a fundamental and strategic systematic project, involving various work tasks. Focusing on the key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 basic and main responsibilities have been clarified. Further clearly defining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ing the “Five Important Missions” in universities is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operation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universities should solidly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publicity, team build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iscipline special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new era; school of Marxism; responsibilities and missions;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91-08

# “双一流”背景下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李兴国<sup>1,2</sup>, 马新成<sup>2</sup>

(1. 燕山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2. 燕山大学 研究生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河北省高等教育大而不强,在两轮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中劣势尽显。对标对表国家“双一流”建设目标和两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标准,深入分析了河北省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差距与不足。从实施国家科技奖培育、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大财政专项支持力度、推进顶尖高校对口支援、精准引进学科领军人才、设立“双一流”建设学科特区、服务对接河北省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布局、全面提升高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等多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河北省高校“双一流”建设,促进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双一流;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sup>[1]</sup>。高等教育既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交汇点<sup>[2]</sup>,也是最核心的结合点<sup>[3]</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sup>[4-5]</sup>。“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sup>[6]</sup>。2022年2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公布了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sup>[7]</sup>,除第一轮140所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外,又新增7所高校。河北省仅有河北工业大学1所高校入围,再次凸显了河北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的现实困境。本文结合国家两轮“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标准的变化,全面深入分析河北省高校存在的差距不足,提出加快河北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加快推动河北从高等教育大省

向高等教育强省转变提供借鉴。

## 一、国家“双一流”建设目标及遴选标准

### (一)“双一流”建设目标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正式公布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吹响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号角。

《总体方案》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目标,即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sup>[8]</sup>。

收稿日期:2024-08-22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重点研究课题“河北双一流高校建设的策略与路径研究”(20230105008)

作者简介:李兴国(1981—),男,研究员,博士,河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方向:高等教育。

本文信息:李兴国,马新成.“双一流”背景下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91-97,104.

(二)“双一流”遴选标准

2017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公布了第一轮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共有 42 所一流大学和 95 所一流学科大学入

围<sup>[9]</sup>。原 39 所“985 工程”高校全部入列;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原“211 工程”高校全部入列,并新增 25 所“双非”(非 985、211 工程)院校<sup>[10]</sup>。首轮国家“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条件为 4 项标准,只要满足其一即可,详见表 1。

表 1 两轮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遴选标准对比

| 序号 | 第一轮条件                                             | 第二轮条件                                                  |
|----|---------------------------------------------------|--------------------------------------------------------|
| 1  | 获国家科技奖励(以第一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以上、技术发明一等奖及以上、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以上) | 获国家科技奖励(以第一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以上)、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 |
| 2  | 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排名在参评的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前 2 名或前 2%的学科              | 拥有运转成熟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
| 3  | ESI 世界排名前 1‰的学科(2017.3)                           | 承担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自然重大、国社科重大项目等)                   |
| 4  |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 50 强(2017)                           | 2021 年之前学科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

与之相比,第二轮国家“世界一流学科”遴选要求同时满足 4 项条件,并且 4 项条件须归属同一学科范围。①大成果。2016—2020 年以第一单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以上、技术发明一等奖及以上、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以上、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②大平台。拥有运转成熟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不含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含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中心)、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③大项目。主持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④一级博士点。学科具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山西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 7 所高校因为满足上述标准,成为新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详见表 2。

表 2 新增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相关学科指标统计

| 序 | 学校名称   | 学科        | 大成果              | 大平台                       | 大项目 | 博士点 |
|---|--------|-----------|------------------|---------------------------|-----|-----|
| 1 | 山西大学   | 物理学       | 自然科学二等奖(2020)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 √   |
|   |        | 哲学        |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2020)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   | √   |
| 2 | 湘潭大学   | 数学        | 自然科学二等奖(2019)    |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 √   | √   |
| 3 | 南京医科大学 |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 自然科学二等奖(2018)    |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 √   | √   |
| 4 | 华南农业大学 | 作物学       | 自然科学二等奖(2018)    |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 √   |
| 5 | 广州医科大学 | 临床医学      | 科技进步一等奖(2020)    |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 √   | √   |
| 6 | 南方科技大学 | 数学        | 自然科学二等奖(2016)    |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 √   | √   |
| 7 | 上海科技大学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自然科学二等奖(2020)    |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 √   | √   |

二、两轮国家“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标准对比

一是由“一票上位”改为“四位一体”。国家第一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条件为满足 4 项标准之一即可入选,第二轮遴选则要求同时满足“大成

果、大平台、大项目、博士点”四项条件,更严格的是,四项条件必须属于同一学科,门槛提高很多,入围难度加大。

二是更加凸显对服务国家的贡献。我国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旨在奖励对我国科技进步有突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推

进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成果代表了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水平<sup>[11]</sup>。国家两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唯一不变的指标就是国家科技奖,这与“双一流”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

三是强化了国家级科研平台的作用。第二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条件强调大成果、大项目要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而且对平台范围限定很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技术研究中心等都不包括在内。

四是更加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导向。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突出,致使在关键核心领域被“卡脖子”。两轮遴选条件国家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均要求一等奖及以上,而自然科学奖可放宽到二等奖以上,凸显了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和鼓励。

五是摒弃了国外评价机构的指标。国家第一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包括 ESI 学科排名和 QS 学科排名两项国外机构排名指标,上述 2 个指标均与高校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情况密切相关。基于论文引用的大学排名争议较大,近年广受质疑。因此,第二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强调不与各种大学排名、论文指标挂钩。

### 三、河北省高校距“双一流”建设标准的差距

一是重大标志性科研成果极为缺乏。2016—2020 年,河北省高校以第一单位获国家科技奖 7 项,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 8 项。总体上河北省

高校获奖数量不多,层次不高。尤其是代表国家科技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奖仅有 1 项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未实现一等奖的突破,成为河北省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桎梏。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够带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大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能够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重大科技成果的缺乏,已成为制约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二是学科领军人才较为缺乏。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加快集聚国内外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创新团队,是深化内涵发展、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之策。河北省共有 6 所高校拥有两院院士 13 人,6 所高校拥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5 人,7 所高校拥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9 人,8 所高校拥有“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22 人。与经济发达省份同层次高校相比,河北省高校拥有学科领军人才数量偏少,尤其是自主培养的领军人才数量更少。

三是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较少。河北省有 5 所高校拥有 7 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详见表 3。燕山大学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工业大学拥有 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农业大学有 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各有 1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体而言,河北省高校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数量不多。

表 3 河北省高校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情况统计

| 序 | 学校     | 平台名称                  | 平台类型          | 所属学科    | 批准时间   |
|---|--------|-----------------------|---------------|---------|--------|
| 1 | 河北工业大学 | 国家技术创新方法与实施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机械工程    | 2013 年 |
| 2 | 燕山大学   | 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2006 年 |
| 3 | 燕山大学   | 国家冷轧板带装备及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机械工程    | 2011 年 |
| 4 | 燕山大学   | 起重机械关键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       | 全国重点实验室       | 机械工程    | 2022 年 |
| 5 | 河北农业大学 | 国家北方山区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作物学     | 2007 年 |
| 6 | 河北大学   | 宋史研究中心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 中国史     | 2001 年 |
| 7 | 河北师范大学 |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 马克思主义理论 | 2013 年 |

资料来源:相关高校官网。

四是大项目并未转化为大成果。2016—2020 年,河北省高校以第一单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2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 项。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的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 5 所高校均有主持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但是,由河北高校应用基础或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地结合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因此难以形成完成重大科技攻关所需的大团队,难以形成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的大成果等,这不利于学科内涵发展和“双一流”建设。

五是距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学科标准差距明显。高等学校是知识生产、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因此高等教育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能力也是其贡献能力的重要内容<sup>[12]</sup>。以国际公认的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和 ESI 学科排名为例。在 2023 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上,中国内地共有 333 所高校的 3 390 个学科上榜,河北省有 5 所高校的 43 个学科入上榜,上榜高校和学科仅占中国内地高校的 1%。其中没有 1 个学科进入全球前 50 名,排名全球前 100 名的学科仅有 3 个,前 200 名的学科仅有 12 个。2024 年 7 月,中国内地共有 466 所高校的 2 666 个学科进入 ESI 排名全球前 1%。其中,有 109 所高校的 346 个学科进入 ESI 排名前 1‰。河北省有 12 所高校的 43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上榜高校和学科数分别占全国高校的 2.6%和 1.6%,且没有 1 个学科进入 ESI 排名前 1‰。可见,河北省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 四、加快河北省“双一流”建设的对策建议

##### (一)加快实施国家科技奖项培育

从前两轮国家“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标准看,国家科技奖是唯一延续的指标,凸显了该指标的重要性。自 2020 年开始国家科技奖改为每两年评一次,竞争更加激烈。从近 5 年高校获国家科技奖统计情况看,各类奖项一等奖授奖数量很少(详见表 4),且基本上被原“985 工程”高校垄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方面,高校获奖数量年均在 30 项左右,近五届共有 14 所“双非”高校入选,获奖可能性相对较高。河北省可以依托拥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对燕山

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学科,河北农业大学的作物学等学科加大支持培育力度,努力产出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力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乃至一等奖。

表 4 近五届高校为第一单位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统计

| 年份   | 国家自然<br>科学奖 |     | 国家技术<br>发明奖 |     | 国家科技进步奖 |    |     |
|------|-------------|-----|-------------|-----|---------|----|-----|
|      | 一等          | 二等  | 一等          | 二等  | 特等      | 一等 | 二等  |
| 2017 | 1           | 23  | 2           | 39  | 1       | 6  | 58  |
| 2018 | 1           | 28  | 3           | 48  | 0       | 11 | 81  |
| 2019 | 1           | 31  | 1           | 38  | 2       | 9  | 115 |
| 2020 | 1           | 30  | 1           | 35  | 0       | 7  | 61  |
| 2023 | 1           | 48  | 8           | 54  | 3       | 16 | 120 |
| 合计   | 5           | 160 | 15          | 214 | 6       | 49 | 435 |

数据来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官网。

##### (二)加快创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第二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条件强化了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大项目和大成果均需要依托大平台产生。河北省高校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资源稀缺,仅有 7 个。仅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 3 所高校拥有自然科学类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2 所高校拥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对“双一流”建设至关重要。除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外,河北省还有 4 所高校曾荣获国家科技奖,分别为石家庄铁道大学 3 项、河北医科大学 3 项、河北师范大学 1 项、华北理工大学 1 项。但是这 4 所高校均缺少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河北省应对上述有实力冲击国家科技奖的高校,优先支持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争取国家级科研平台覆盖更多高校,作为未来冲击“双一流”的后备力量。

##### (三)加大高校财政专项支持力度

办学经费的多少对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第二轮“双一流”遴选中晋级的 7 所高校中广东独占 3 所,该省“双一流”高校数量增至 8 所,跃升至全国第四位,与陕西、四川等老牌高教强省并驾齐驱,即是对该省近年来对高教大手笔、强规模投入的回报。江西、河南、安徽、广东等多个省份均已明确了“十四五”期间重点培育支持的高校和学科,瞄准国家第三轮“双一流”动态调整,投入数十

亿元、百亿元的专项资金,着力扶持本省高校在新的建设周期内取得进一步突破,详见表 5。相比而言,河北省对高等教育投入力度有待提高。研究表明,2008 年以来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低于经济增长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表明河北省经济发展没有兼顾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此,河北省应当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构建

多元化的教育资金投资机制,在确定政府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扩大教育资金的融资渠道<sup>[13]</sup>。同时,借鉴河南省重点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两大龙头高校模式,充分体现差异化原则,集中有限财政经费,重点支持燕山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率先发展,确保 1~2 所高校在国家第三轮“双一流”遴选中取得突破,引领带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表 5 部分省份“十四五”期间“双一流”建设经费投入

| 省份 | 支持高校                                                     | 经费(单位:亿元)                                                                              |
|----|----------------------------------------------------------|----------------------------------------------------------------------------------------|
| 江西 | 南昌大学                                                     | 省财政统筹不少于 30 亿元建设资金,专项支持南昌大学“双一流”建设。                                                    |
| 河南 | 一流大学建设 75 亿元;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 55 亿元;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7 所高校 | 投入 50 亿元支持郑州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投入 25 亿元支持河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此外,投资 55 亿元支持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7 所高校开展一流学科创建工作。 |
| 安徽 | 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师范大学                              | 2020—2024 年,省级财政在现有高校发展专项经费中将统筹 30 亿元以上资金,用于支持省属高校高峰学科建设。                              |
| 广东 | 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 “冲补强”资金 262.85 亿元。其中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资金 103 亿元,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资金 23 亿元,特色高校提升计划资金 41 亿元。      |

资料来源:相关省份“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四)加快推进顶尖高校对口支援

2018 年 8 月 19 日,山西省与 C9 高校战略合作座谈会在太原举行。会上签署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北京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北京大学支持山西大学建设与发展实施方案》《清华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深化合作协议》<sup>[14]</sup>。山西省借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首的 C9 高校联盟的高教对口支援,成为快速补齐山西省高等教育短板的新动能。北京大学明确表示全力支持支持山西大学加快“双一流”建设。2019 年 7 月和 12 月,山西大学

先后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了哲学、物理学学科战略合作协议。山西大学的哲学、物理学能新晋“世界一流学科”,与北大、中国科大等国内顶尖高校的支持密不可分。河北省可借鉴山西省的成功经验,省级层面牵头与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签署省校合作战略协议,推进顶尖高校对口支援省内的燕山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具备冲击“双一流”潜力的学科,具体方案见表 6。通过外部借力,实现河北省“双一流”建设的弯道超车。

表 6 国内顶尖高校对口支援河北省高校设想

| 河北高校   | 学科名称        | 支援高校   | 学科名称        |
|--------|-------------|--------|-------------|
| 燕山大学   | 机械工程(A-)    | 清华大学   | 机械工程(A+)    |
| 燕山大学   | 材料科学与工程(B+) | 清华大学   | 材料科学与工程(A+) |
| 河北农业大学 | 作物学(B-)     | 中国农业大学 | 作物学(A+)     |
| 河北师范大学 | 马克思主义理论(B)  | 中国人民大学 | 马克思主义理论(A+) |

注:河北大学已通过部省合建机制,与 4 所原“985 工程”高校签署对口合作协议。括号内为该学科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等级。

(五)精准引进学科领军人才

“双一流”建设启动实施以来,不少高校将人才置于高校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位置,推出条件优厚的人才引进政策,高校间的人才争夺日趋白

热化。同时,不少地区将高校人才竞争纳入地区人才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资源的战略性地位日益突出<sup>[15]</sup>。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对“世界一流学科”创建十分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科研平台建



设、国家重大项目和顶尖学术成果的获得,均离不开高层次人才。2015 年 5 月,国际知名数学家汤涛教授被南方科技大学聘为副校长,2016 年 1 月即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sup>[16]</sup>,2017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次精准引才为南方科技大学数学学科跻身国家“双一流”学科起到关键作用。河北省可参考借鉴南方科大引才模式,对接省内冲击“双一流”的重点高校相关学科建设需求,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精准化,切实发挥高层次人才的关键作用,尽快取得重大科研成果,补齐河北省重点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短板。

#### (六)设立“双一流”建设学科特区

结合国家第二轮“世界一流学科”遴选条件,

表 7 河北省高校“双一流”建设关键指标统计(2016—2023 年)

| 学校     | 学科名称    | 成果                | 平台                     | 项目                   |
|--------|---------|-------------------|------------------------|----------------------|
| 燕山大学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br>3 项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自然重大项目<br>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 燕山大学   | 机械工程    | 无                 | 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br>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 河北农业大学 | 作物学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br>1 项  |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 河北大学   | 中国语言文学  |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br>1 项 |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br>基地        |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

资料来源:相关高校官网。

#### (七)服务对接河北省主导产业发展需求

《河北省建设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十四五”规划》提出:确立钢铁、装备、石化、食品、医药、信息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商贸物流、文化旅游、金融服务、都市农业等十二大主导产业的支撑地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为两翼的现代产业体系<sup>[17]</sup>。河北省高校应紧密围绕河北省十二大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强主导产业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力度。通过与省内头部企业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河北省主导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依托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充分发挥高校智力密集和科技创新优势,持续开展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强化有组织科研,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河北省主导产业发展贡献

将河北省高校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的 4 个学科列为未来冲击“双一流”的重点培育对象。

除河北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外,其他 2 所高校的相关学科均存在短板,详见表 7。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相关学科短板均为重大国家科技奖励(自然科学二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上)。河北省可以面向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的 3 所高校的 4 个学科设立“学科特区”,省主管部门联合制定战略性、个性化、精准化的支持措施,加大政策、经费支持力度,创新学科建设模式和评价机制,激发学科发展内生动力,加快补齐学科建设短板,力争尽快产出重大标志性成果,早日实现“双一流”建设的新突破。

力量。

#### (八)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布局

学科专业是高校的核心支柱,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学科专业结构和质量直接影响高校立德树人的成效,以及高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面临深刻调整,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已经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经验表明,拔尖创新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单一学科和专业下成长起来的,推进跨学科发展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河北省高校应打破学科壁垒,以优势和特色学科为抓手,构建交叉共生的学科生态体系。通过设置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等机构,培育新兴交叉学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更好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sup>[18]</sup>。河北省高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趋势,动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 (九)全面提升高校国际化办学水平

大力推进高校国际化战略,系统谋划、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能力和水平。设立“国际化工作专项基金”,加大对学生出国留学和访学、师资国际化、学科和科研国际合作、留学生工作的投入力度。推进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重点引进一批海外优秀青年学者,鼓励和支持教学科研一线教师赴海外研修。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通过设立国际合作项目、交换生项目、中外联合办学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研学经历,增强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主办或承办高水平国际

学术会议,邀请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校授课讲学,提升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积极加入国际组织与联盟,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服务国家构建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 五、结语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河北省高等教育“大而不强”,是京津冀高等教育“洼地”。面向国家第三轮“双一流”遴选,河北省应加强谋划,从9个方面协同发力,以超常规战略举措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支撑、推动和引领教育强省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贡献。

#### 参考文献:

- [1]马晓蓉,赵长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三重维度[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4):97-103.
- [2]任友群.“双一流”大学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6):3-9,34.
- [3]刘小强,郑围尹,蒋喜锋.强国建设视野下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思考:兼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范式转变[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12):12-18.
- [4]项昌乐.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奋力“加速跑”[J].中国高等教育,2023(17):27-31.
- [5]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1).
- [6]赵沁平.基于教育规律探讨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双一流”[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5):1-3.
- [7]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EB/OL].(2022-02-09)[2024-07-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202/t20220211\\_598710.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202/t20220211_598710.html).
- [8]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2015-10-24)[2024-07-15].[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8/201511/t20151105\\_217823.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8/201511/t20151105_217823.html).
- [9]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EB/OL].(2017-09-20)[2024-07-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9/t20170921\\_314942.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9/t20170921_314942.html).
- [10]陈路,王艳艳.“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分类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23):50-55.
- [11]王露岚,彭树涛.高层次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举措:基于国家科技奖实证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4,22(2):114-120.
- [12]赵婷婷.对标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关键指标的国际对比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3):18-28.
- [13]邵静雯,陈昭彦.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2):98-104.
- [14]山西大学.清华、北大要在山西办学[EB/OL].(2017-09-20)[2024-07-15].<http://gnhz.sxu.edu.cn/xxfb/dfcb5ad855ff47858a983dc905e32d14.html>.
- [15]闫丽雯.“双一流”视域下高校人才竞争的问题、根源与破解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38(9):19-23.
- [16]廊坊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建设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十四五”规划的通知[EB/OL].(2021-12-10)[2024-07-15].<http://www.lf.gov.cn/Item/116477.aspx>.
- [17]南方科技大学.我校副校长汤涛教授荣获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EB/OL].(2021-11-24)[2024-07-15].<https://newshub.sustech.edu.cn/html/201701/6698.html>.
- [18]朱传瑶.世界一流大学交叉学科门类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共同要素:基于6所英美高校的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1):86-91.

(下转第104页)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98-07

# Sora 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现实效能、风险检视及优化路径

陈丹丹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Sora 的问世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文生视频模型 Sora 以其强大的信息整合和对物理世界的模拟,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动态联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智慧化的需求。然而,Sora 也蕴含着巨大的“破坏性效应”,其技术缺陷会导致传播内容低质化、遮蔽人的主体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风险。为适应 Sora 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变革,促进二者深度融合发展,需要规范生成内容,增强技术批判能力;矫正技术导向,规避技术越位风险;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情感价值认同。

**关键词:**Sora;思想政治教育;人工智能;风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5.01.14

2024年2月16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 AI 推出了首个文生视频模型 Sora。与 ChatGPT 文生文、文生音频和文生图像等信息不同,Sora 可以根据用户指令生成画质分辨率高、细节令人震撼的短视频。据 Open AI 公司介绍,Sora 视频生成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领域,产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未来也可能出现类似 Sora 的其他视频生成模型。由此,Sora 模型的推出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涉入到最具有挑战性的内容生产领域,从而推动整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态发生新质生产力转型,无疑将会对内容产业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sup>[1]</sup>。

在教育“异化”背景下,Sora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标志,它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什么? Sora 作为一种新型智能技术工具,可以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打造生态课堂,让教和学在动态中更加高效。Sora 可能会取代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成为学校的“终结者”,它给学校带来的是挑战而不是机遇。有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积极利用新兴技术赋能于自身的同时,也需要审思文生视频模型 Sora 对于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实效能、检视 Sora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潜在风险及其优化路径,以确保 Sora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导向性、实效性。

## 一、技术赋能:Sora 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效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这样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2]</sup>同样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活动,始终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土壤中,并将不可避免地遵循这一发展规律。因此,这些新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和进步,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和个体的思想行为模式也将随之发

收稿日期:2024-06-06

作者简介:陈丹丹(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信息:陈丹丹.Sora 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效能、风险检视及优化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98-104.

生变化。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 Sora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耦合,已然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红利。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现状来看,Sora 技术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动态联结、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新场域、满足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智慧化需求。

### (一)要素赋能:Sora 技术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动态联结

Sora 作为世界模拟器,不仅包含了深度学习技术、大语言模型、物理世界模拟能力、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技术层面的要素,更拥有了文本到视频的生成能力、灵活性和可定制性、学习和泛化能力等应用层面的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文生视频模型 Sora,使其不仅能够解释复杂的用户指令,而且通过对二维数据的学习和推理就能归纳和模拟现实中遵守物理定律的现象,即时性地生成逼真的场景视频<sup>[3]</sup>。Sora 等人工智能不仅促使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和个体的思想行为模式发生变化,更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交互优化与内容的优化和再生产的创新联结铺就了技术道路。

其一,Sora 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教育主客体在人机交互中实现情感的深度交融。Sora 的海量信息资源及文生视频模型简单快捷,它可以根据思政课教师的自身教学需要轻松快速生成,弥补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趣味不足的短板。此外,将 Sora 技术应用到教育主体认识教育客体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精准地分析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行为习惯以及性格特点,帮助思想政治教育者制定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从而更好地在双向互通中有效满足受教育者的真实需求,有效实现二者情感的深度交融。

其二,Sora 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通过让学生用 Sora 去创建教育视频,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生动的学习体验,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成效<sup>[4]</sup>。另外,Sora 拥有大算力、大算法、超大储存空间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动态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创建更加精准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评价体系,帮助大学生及时精准地了解学习情况,从而更好地调整学习计划,提升学习效

率,以此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三,Sora 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契合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为了达到既定的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的知识、理论、观点或方法<sup>[5]</sup>。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加之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状态的隐匿性,面对广大的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尤其是思政课教师、高校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师等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他们无法充分且全面地认识和分析每一个教育对象,因此更加无法做出“精准滴灌”式的教育决策。Sora 的出现,意味着人机软融合愈加发展,反映出更加强大且缜密的思维能力。它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问答情境,选择更加适合使用者的互动方式和语言逻辑,并且给予使用者针对性的引导。通过智能问答和虚拟现实技术,Sora 让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概念和复杂知识,从而使其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二)空间赋能:Sora 技术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新场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sup>[6]</sup>。所谓空间赋能,即通过挖掘、激活传统教育空间中的潜在动力,赋予其新的能量。继 ChatGPT 之后,以 Sora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教育创新提供了极大空间,因其便捷性、高效性、泛在性、易得性等特点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而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Sora 作为一种技术义肢和效率工具,空间赋能意味着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传统教育空间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Sora 的应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是紧密相连的,Sora 的文生视频的发展对教育效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一,Sora 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Sora 的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技术(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简称 RLHF)建立在大数据、大模型的基础之上,从海量数据中找到相同点,进行归纳和总结,从中探索出相关的规律,从而让高校师生可以体验到个性化的一对一交互模式。通过

在线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学生可以更加方便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及时反馈学习问题和困难,老师也可以更加及时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其二,Sora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范围。通过利用 Sora 技术的优势特点,可以打破传统教育的地域限制,将教育资源以音视频的形式进行实时传输。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的学生,都可以通过 Sora 平台获得相同水平的优质教育资源。例如:可以利用 Sora 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在线讲座、组织学生进行线上讨论、开展虚拟实践等活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这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范围,还使得教育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学生可以通过 Sora 平台,随时随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实现真正的“无处不在”的学习。

(三)结构赋能:Sora 技术满足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智慧化需求

智慧化是一个涵盖信息化和智能化最新阶段的复合词,其特征深度学习和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独立概念使用,描述当前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可以作为修饰语(如“智慧化建设”“智慧化系统”等),强调所修饰对象应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Sora 在日语中是天空、时空的意思。用其命名或许暗含了设计者意图,隐喻了 Sora 的功能——即与时空、创造有关的智能产品。在 Open AI 官网关于 Sora 的说明中,明确表达了 Sora 是一款世界模拟器,意味着 Sora 是为模拟世界而生<sup>[7]</sup>。

其一,Sora 可以通过深度、全面的视频模拟,将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可视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够更好地入耳、入脑、入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和互动性。例如:Sora 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模拟能力和其对世界的深入理解的优势,给学生提供实景模拟功能,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扮演角色,或者通过案例重现等方式,去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矛盾分析与解决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应对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以及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其二,Sora 通过对用户需求及行为进行学习和分析,不断优化世界模拟器的内容与功能,使其

更加贴近用户的需求和期望。Sora 能够根据教育对象的学习情况和反馈,智能地推荐相关的学习资源,使学生获得个性化学习体验。这种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使得每个教育对象都能够根据自己得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这满足了智慧化教育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它使得教育对学习产生的价值更加直观和具体,为学习者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 二、技术异化:Sora 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检视

尼采·波斯曼指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sup>[8]</sup>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暗含了诸多风险和挑战。

(一)“引诱”风险:“信息茧房”导致传播内容低质化风险

“信息茧房”最先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意指“网络虽然能带来更便捷的信息搜索,但公众长期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sup>[9]</sup>。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力量,旨在培养和塑造人的精神内核,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同 ChatGPT 一样,Sora 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并不是单纯的工具定位,而是深度融入了政治、文化、价值等多个层面,旨在通过内容生成、交互对话、多维应用等方式展现出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相应地,Sora 所具备的意识形态特性在教育过程中也将不可避免地渗透并产生影响,这无疑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项严峻的考验<sup>[10]</sup>。

其一,Sora 的应用易导致传播内容低质化,进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方向相悖。在人类的所有感官体验中,视觉感受占据了大约 95% 的比重。鉴于视觉在人的感知中的重要地位,Sora 等文生视频模型持续不断地优化升级预示着它们将生成日益逼真的模拟现实世界,甚至构建出超越现实的视觉景象,这可能存在人为的价值信息植入,以不易察觉的方式频繁地在视频中显现,对学习者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sup>[11]</sup>。

其二,Sora 的文生视频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可能会引发学生的价值认知混乱。Sora 在大

模型、内容生成等方面都会夹杂着设计者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倾向,因而其不可能完全地、真正地呈现出“技术的中立性”。学生在基于 Sora 的视频学习过程中,接触到视频中的多元化价值信息。鉴于这些信息的相互矛盾,其可能引致学生在价值认知领域内遭遇显著的困惑与认知失调,进而扰乱其价值观构建的连贯性与清晰度。

其三,Sora 的文生视频模型可能会加剧“信息茧房”效应。Sora 会根据用户的语言风格特点生成具有碎片化、片段式的视频,这种视频载体相较于文字或图像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创造的人机互动模式更加具有趣味性,这有可能导致青年学生更加倾向于留在他们所熟悉的“舒适区”,在圈层区隔影响下,个人及整个社交圈群的价值观念不断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个体长时间与多元化、异质化信息相隔离,逐渐沦陷为算法“囚徒”<sup>[12]</sup>。

## (二)“遮蔽”风险:“算法推荐”导致人的主体性遮蔽风险

Sora 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利用强大的算法推荐,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生成学生的专属“数字脸谱”,从而针对不同情况学生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学习计划。与此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Sora 的引入以其形象逼真的视觉表现力,将原本抽象的论述转化为直观的视觉元素,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具象化,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但 Sora 的“智能推荐”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的主体性。

其一,过度依赖 Sora 等人工智能技术,会导致学生形成思维的惰性,主体地位面临消解的风险。Sora 等尖端 AI 技术展现了强大的技术优势,为大学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若大学生们长期沉迷于 Sora 的精准与即时的信息服务,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技术带来的技术愉悦之中。长此以往,他们的想象力、批判性思考等思维品质势必会被消磨殆尽,最终,他们会因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技术至上”的盲目追随者,甚至是“单向度”的、缺乏全面发展的个体。

其二,Sora 等的不断推广和应用,可能会解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地位。与过去不同,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局面,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的代言人。借助 Sora

等数字化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以被拆解成短小精悍、碎片化的形式。在当前时空交融、场景化传播的环境下,学生可以频繁地进行场景切换,使得师生之间的交流与认同逐渐减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知识权威逐渐被消解,乃至教师角色可能面临“边缘化”的风险。

## (三)“废心”风险:“娱乐至上”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

在泛娱乐化盛行的时代,Sora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其本质属性是商业性质的,这使得其不可避免的带有迎合和取悦受众的倾向。为了迎合人们的喜好,Sora 等人工智能借助自身强大的技术优势,将携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视频精准投放给受众,使得人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也在潜移默化中被消解。

其一,Sora 带来的视觉震撼,无疑可能会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来泛娱乐化的风险。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按照系统性原则对学科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的引导和启发,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而在 Sora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他更多的是以直接的内容生成的形式呈现出来,因而使得课堂内容过于依赖表面的感官吸引,通过人为的娱乐元素和激励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显得更具有“吸引力”,从而营造出一种良好愉悦的课堂氛围的假象。因此,在视频化的趋势下,课堂上的教育内容可能逐渐沦为“娱乐至上”的“附庸”,失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学生的关注点不再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深度和内涵,而是被思想政治教育的“华丽包装”所吸引,形成了表面化的关注。

其二,Sora 技术所创造出的“虚幻视觉”可能会被西方国家用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各种西方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和不良信息伴随着不同信息载体具有极难辨识的伪装性,对于尚处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形成期的学生影响广泛,使其产生认知偏差,很容易被网络舆论中未被证实和不知真伪的信息带偏,从而进行跟风评论,甚至西方意识会渗透并侵蚀其萌芽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sup>[13]</sup>。以 Sora 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其信息来源层面而言,可能本

身就混杂着大量不真实的信息。Sora 的内容生成主要是源自于庞大的数据库和模型,这些资源涵盖了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介形式,因而其所传播的内容质量就会良莠不齐。西方国家可能会“别有用心”地利用 Sora,在对其进行大规模预训后,Sora 有可能会形成精确且高效的虚假信息传播机制,从而进一步将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且大学生群体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尚有不足,因而他们在使用 Sora 时,很容易受到这种动态图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 三、技术矫正:Sora 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 (一)机制优化:规范生成内容,增强技术批判能力

Sora 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使其能更好地发挥其创新性,并持续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数据制度的“红线”和师生技术素养的“高地”,两者相互配治理,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进而促进智能思政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其一,明确权责边界,建立数据制度“红线”。要在 Sora 采集数据、使用数据、输出数据等各个环节中明确权责边界,建立健全一整套精细化的归责体系,确保数据处理的各个环节制度化、规范化,并为可能出现的合规争议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一方面,国家应加快制定并不断完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抓紧制定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立法规划,为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依据,指明方向。另一方面,政府要顺应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根据现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研究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相融合,为主流价值观指导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依据<sup>[14]</sup>。

其二,增强技术批判能力,打造师生技术素养“高地”。在 Sora 的视频可视化时代,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大趋势,也要清楚地看到师生囿于视觉冲击的“舒适区”,亟须提升师生的技术批判能力。具体来说,一方面,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师,既不能盲目对技术过于依赖,成为技术的附庸,也不能一味地排外,不愿接受智

能化教学的新事物。教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Sora 技术仅仅只是一个技术工具和教学辅助手段,在恰当使用 Sora 技术的同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爱学生,增强师生之前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在利用 Sora 技术的同时,要提升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和信息甄别能力。数字时代,大学生群体通过 Sora 等智能技术进行学习、娱乐的占比大,时间长,但是情绪情感很容易被大数据所裹挟。因此,这就要求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对 Sora 生成的内容和推送的信息能够去其糟粕,去伪存真,激发学生对于信息来源的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实践能力,以及大学生个体的自我意识。此外,高校也可以通过开展相关的技术培训或者利用工作坊,提高他们对于技术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让师生更好地了解和使用 Sora,使 Sora 能够更好的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实现其教育价值。

#### (二)以人为本:矫正技术导向,规避技术越位风险

Sora 等人工智能正在以“类人”的思维方式去关心学生。这种情感在无形中可能会内化为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进而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但是,一旦 Sora 技术被资本利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这会使学生失去对事物本身的思考和价值判断,不利于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其一,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人机协同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sup>[15]</sup>。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浪潮中,很容易迷失在技术的炫目和便捷中,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因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优化 Sora 等技术缺陷,克服“算法推荐”导致的大学生知识面窄化的问题。利用 Sora 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虽然能够提高教学效果,但是通过数据地图为学生推荐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窄化学生的知识面,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而,需要优化 Sora 技术支撑和结构,纠正、改善以往的算法推荐技术,将有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容融入到算法推荐技术之中,使其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二,确定技术介入的标准,预防融合泛化。

Sora 技术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能会出现技术滥用等泛化趋势,甚至 Sora 技术可能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过度介入,替代教师的角色,导致教育过程失去人文关怀和人性温度。这会在追求技术先进性的同时,很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认为技术越先进,教学效果就越好。显然,这种观念是片面的。无论 Sora 技术如何先进,它都只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工具之一。在使用 Sora 技术时,需要明确 Sora 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限度,确定 Sora 技术介入的相关标准和算法逻辑,防止 Sora 在科技加速进步和资本裹挟的背景下陷入肆意滥用的境地,最终出现 Sora 技术越位的风险。

### (三)价值引领: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情感价值认同

在 Sora 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过程中,二者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应当在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导的基础上,以 Sora 作为辅助手段来发挥作用。在 Sora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置于 Sora 的算法逻辑架构之中,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它涵盖了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制观等多个方面,这些教育内容本身就深深地蕴含着现代社会的价值导向。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副有效的“解药”,能够化解数智技术发展中可能带来的异化风险。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Sora 及其他的技术的运用应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树人的核心目标。

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在 Sora 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智能算法的设计逻辑中,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避免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工具理性过度倾向,力求科技和教育和谐共生。

### 参考文献:

- [1]邹开元,沈阳. Sora 的技术复杂度突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新质生产力转型[J/OL].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586.C.20240422.1057.002>.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2.
- [3]冯雨旻. AIGC 时代教育的视频化转向及其风险应对:由文生视频模型 Sora 引发的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5):27-33.
- [4]王天恩. Sora 的世界模拟及其教育运用[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4): 51-57.
- [5]燕连福,秦浦峰.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与对策[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9): 201-206.
- [6]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19-05-17(1).
- [7]Video generation models as world simulators [EB/OL]. (2024-02-17) [2024-06-06]. <http://openai.com/research/video-generation-models-as-worldsimulators>.
- [8]波斯曼.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
- [9]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2.
- [10]任凤琴,董子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与规避[J]. 理论导刊, 2024(2): 121-128.
- [11]陆道坤,陈吉钰. Sora:学校教育的“终结者”还是“拯救者”[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6):112-127.
- [12]朱应开. 算法赋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出场语境、风险表征与调适进路[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 91-97.
- [13]李正军,张岑.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63-70.
- [14]张茂杰,樊瑞科. 理论、现实与实践: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三重逻辑[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6(2): 67-71.
- [15]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28.



##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Risk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Sora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CHEN Danda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ora, will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ora, a text-to-video AI generator model, with its powerfu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simulation of the physical world, accelerates the dynamic conne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ets the intelligence nee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s. However, Sora also carries significant “destructive effects”, as its technological flaws can lead to risks such as the dissemination of low-quality content, the obscuring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eros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Sora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generation of content, improve technical critical abilities, correct technical orientation, avoid technical offside risks, consolidate value consensus and enhance emotional value recognition.

**Key words:** So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

(上接第 97 页)

##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LI Xingguo<sup>1,2</sup>, MA Xincheng<sup>2</sup>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n Hebei province is large but not strong, and the disadvantages are obvious in the two rounds of university selection of national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goals and the two rounds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selection criteria,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d the gap and deficiency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in Hebei province.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ebei provinc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mplemen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increasing special financial support, promoting targeted support from top universities, precisely introducing leading talents in disciplines, establishing “double first-class” discipline special zone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leading industries in Hebei Province, optimizing and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 in universi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Hebei province; higher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105-06

## 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

刘敏畅, 王甲成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具有必然性,二者逻辑上相互契合、目标上高度一致、功能上相辅相成。协同育人视角下,推动二者融合是高校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是推动高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关键手段。对于二者融合实践中认知层面、教学层面、机制层面存在的困境,高校要以价值引领为核心、探索协同育人方式的推陈出新,以提升育人成效为目标、助力教师队伍建设的提质培优,以多元协同为依托、推动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的互联互通,进而推进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协同互促,全面提升育人效果。

**关键词:**协同育人;高校党建工作;思政教育;融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5.01.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时指出:“高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高校党建工作是思政教育的坚强引领与强大支撑,思政教育是党建工作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梳理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逻辑及价值,探析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对于新时代提升教育质量、强化育人效果具有重要意义<sup>[1]</sup>。

## 一、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逻辑必然

### (一)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逻辑上相互契合

党的领导是推进思政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思政教育则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提供正确的思想政治引领和精神动力。实践充分证明,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协同逻辑上相互契合,二者始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党成立初期,党组织的建设

与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就行之有效。比如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一批新型大学,使学生接受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信仰。抗战时期,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更加具有显著成效。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sup>[2]</sup>,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二者深度融合,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开展。党和政府在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方式方法、吸取老解放区思想政治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思政课程设置。巩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通过有步骤地开展大规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全社会的思想觉醒和进步。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协同迎来了新局面。1978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决定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思政课开

收稿日期:2024-06-10

作者简介:刘敏畅(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本文信息:刘敏畅,王甲成.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105-110.

始在全国高校全面恢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对思政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场合,围绕思政课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整体上进入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的新阶段。

## (二)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目标上高度一致

高校党建工作是党建理论在高校的具体实施,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的途径与载体。思政教育则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等重点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贯穿于高校党的建设全过程。二者虽分属于高校的不同机构,在内容及形式上存在着细微差别,但协同育人视角下二者均聚焦于学生思想道德、政治水平的发展。在政治性上,“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sup>[3]</sup>,高校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对学生施加基于特定道德规范与政治理念的系统化、计划性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达成思想政治观念的塑造。思政教育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具有坚定政治方向、较高人文素养与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型人才。在理论性上,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建党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高校党建工作和思政教育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引领,以科学的理论对学生进行引导、启发与教育,把稳学生理想信念之“舵”。在实践性上,高校党委在教学实践中,从党建引领的宏观视角对思政教育工作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各方力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紧紧抓在手上”<sup>[4]</sup>。思政教育则将党建活动作为教学实践中实施课程思政常态化的重要环节,强化二者目标的一致性以此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 (三)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效果上相辅相成

高校党建工作是思政教育的坚强引领与强大

支撑,思政教育是开展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二者在协同育人实践中充分发挥着联动效应。首先,高校党建工作对思政教育具有引领与指导作用。通过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来确保思政教育中政治方向的引领和思想路线的指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思政教育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次,高校党建工作为思政教育的进行给予组织保障。在党建工作的统筹下,高校党组织凝聚各方力量以保证思政教育稳步推进。通过增加党建工作教育幅度与健全党建工作规章制度等渠道,为思政教育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与坚实的立体平台。最后,思政教育是高校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高校党建工作是增强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核心阵地,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与依托,思政教育过程中通过理论授课、志愿服务、师生党团活动等形式,深化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其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因此,高校党建统领、引导包括思政教育在内的高校各项工作,思政教育又天然地蕴含在党建工作的行动理念中。

## 二、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融合的价值意蕴

### (一)高校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高校党建的首要职责就是为高校把牢政治方向,确保高校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学并始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思政教育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通过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地拥护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协同育人视角下的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能够以一致的目标、互补的功能为纽带,共同着眼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目标,充分发挥二者的政治思想引领功能,不断凝聚学生的思想共识,形成旗帜鲜明的政治导向,使高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教育办学方向不走偏,始终成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和践行“两个维护”的坚强阵地。

### (二)推动新时代高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sup>[5]</sup>,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高校是高等教育的主阵地、人才培养的高地,高校现代化是支撑、推动和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sup>[6]</sup>。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是推动高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协同育人视角下二者的融合并不只是单维度、单领域的融合,而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提升两项工作的“单体质量”的同时,推动育人体系的现代化转型,进而为高校输送高质量的人才资源,在党建思政工作紧密结合、融合创新过程中推动新时代高校现代化建设。

### (三)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关键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sup>[7]</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sup>[5]</sup>。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手段,高校始终牢牢把握思政育人生命线,借助党建工作将思政教育延伸至高校工作的各个方面,拓展思政教育的场域,强化党建思政协同育人的实效。

## 三、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现实困境

### (一)认知困境:育人理念传统制约协同育人创新能力提升

传统的育人理念往往侧重于知识灌输与专业技能培养,缺乏协同育人理念与协作思维,导致了教育工作的单一性与局限性,无法兼顾理论传播与实践育人的协同发展,这使部分高校党建思政协同育人工作未能将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有效嵌入协同育人全过程中。

一方面,部分高校党建思政联动共进的协同育人理念尚未形成,二者的结合成为所谓的“面子工程”,处在各自的“平行时空”。二者具体的工作通常仍旧采用“分割而治”的处理方法,部分高校

党建工作更加聚焦于党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方面,而思政教育主要关注思政课程教学、学生思想引导等内容,两者各司其职、各行其是,缺乏有机衔接与互动。联动不足导致联合实施活动内容僵化、形式守旧,采用传统的座谈会、党课及专题报告会等单向传递知识的方式,以“文件学习”作为工作完成的基本标准,缺少灵活性及创新性,难以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与参与兴趣。

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党建思政协同育人工作中,未能充分利用党的前沿理论成果,及时将党的最新思想融入思政教育中,使学生接纳新鲜事物的速度相对滞后,难以及时了解党的最新方针政策,影响着协同育人水平的提升。也有部分高校认识到应用党的前沿理论成果的重要性,开始在基层党建工作、思政课程中推行新内容,但忽略了开发线上教学内容的价值,并未挖掘出互联网的育人潜力,未能将数字技术全方位融入到党建思政工作的方方面面,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党建思政工作的智慧化发展。

### (二)教学困境:师资力量匮乏阻碍协同育人专业队伍建设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sup>[8]</sup>思政课教师是践行育人理念的“第一责任人”。但部分高校现有的思政课教师数量较少且经验不足,存在着“重教学、轻党建”的现象,且未能实现教育教学方式的全面创新以提升思政课育人成效。

一方面,部分高校现有的思政课教师数量有限,且从事思政教育教学的教师有大部分为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师资,很难以专业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成果为理论支撑,有效地融入党建思政元素,丰富完善思政课堂的内容。且在教师团队中,也存在部分教师虽具备一定专业知识,但缺乏党建工作、思政工作经验,难以及时、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内心困惑,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党建活动及思政教育工作,无法达到相应的教育要求与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上,对党建思政协同育人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将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放在首位,在基础工作中未能将党的创新理论落到实处,导致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同时,以往传统工作模式的方法陈旧、缺乏

创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教师“满堂灌”的单向教学模式已难以奏效,部分教师不能主动探索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推进教学载体、教学环境、创意性教学活动智能化<sup>[9]</sup>,形塑新的思政教学环境与“线上+线下”的混合思政教育模式。

### (三)机制困境:协同机制滞后束缚协同育人全方位联动

目前,部分高校尚未构建能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引导性、思政教育工作的全面性的完善的工

作体系,对融合实践效果的监督管理不足、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弱化了协同育人的整体工作效果。一方面,协同机制设置不完善。在部分高校中,党建思政工作部门往往机构设置、组织建设相对独立,在各自独立的办公场所和管理体系中发挥作用,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未能挖掘二者深度融合的积极因素以形成工作的有机衔接与配合。同时,部分高校还存在着因统筹缺失,导致二者职责重叠或者职责模糊的情况。如两个部门各自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但具体的责任范围和工作重点没有明确划分,党课与思政课授课教师重复、参与对象重复、授课内容重叠,导致工作效率不高同时也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考评体系不完善。部分高校的教育考评体系依然依赖于传统的学科考核评价方式,往往偏重于教师的学术成果和专业技能、学生的活动参与度,难以准确全面地反映学生在思想道德水平上的发展与党建思政协同育人工作的实际成效。且未能将协同育人的目标、内容纳入考评体系内,针对协同育人工作效果的全面性考评体系尚未形成。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和考核体系,就难以对两个部门的工作进行客观评价,无法有效地推动协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四、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

### (一)以价值引领为核心,探索协同育人方式的推陈出新

为顺应社会发展需要,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两者的协同发展、同向同行也应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以价值引领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形成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创新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方面,举旗帜、育新人,使价值引领成为协同育人核心工作。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海量信息与多元价值观对高校党建思政工作造成一定冲击,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就成为采用创新思维开展二者协同育人工作的必要前提。在实践中,高校应结合办学特色与学科优势,细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建思政工作的关联性,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领域、全媒体的宣传教育,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自觉形成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影响的分析判断能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成为学生的情感认同与自觉行动。以价值引领在党建思政工作中的有效嵌入,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在二者协同育人的全过程之中。

另一方面,提高技术水平,使数字技术成为协同育人最大增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sup>[7]</sup>。新时代赋予高校党建思政工作新要求,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党建思政工作中,是二者协同育人工作守正创新的内在需要。在线上育人空间,要依托数字技术发展优势,推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交互,创建“党建+思政”线上育人平台,为党务工作者提供党建教育示范课、为思政课教师提供充实的备课资源、为学生推出具有针对性的内容板块与互动功能,增强协同育人效果在第三空间的时效性。及时整合各大权威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网络资源的助力下创新教学内容<sup>[10]</sup>,并依托数字技术分析学生个体的认知偏好、思想动态与学习习惯,为其提供精准化的思政教育内容,推动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在线上空间的交叉渗透。

### (二)以提升育人成效为目标,助力教师队伍建设的提质培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sup>[11]</sup>,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应以提升育人成效为目标,建立会育人、懂思政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第一,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提升教师政治素质。首先,高校要严格准入机制、健全退出机制。对思政课教师应聘者进行全方位考察,确保其政

治立场坚定、思想端正。将政治素质、科教能力难以满足思政课建设新要求的教师清退出教师队伍。其次,探索构建“党建+”模式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增添动力。邀请专家学者、教学名师进校,为思政课教师提供系统全面的党建理论培训课程,塑造政治立场坚定、党性修养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在党建引领下把思政课教师队伍建强做实,进而更好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sup>[12]</sup>。

第二,坚持学习与交流并驱,提升教师业务能力。首先,推广年轻教师教育导师制。通过结对帮扶,加快年轻教师思想觉悟及执教技能的快速成长,培养其坚定的政治素质、过硬的理论素养与深厚的文化修养,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其次,搭建思政课教师的学习与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职业培训、学工沙龙、座谈会等,通过教学观摩、示范课展示等活动,交流分享优秀教学案例与工作经验,使思政课教师针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时整改,促进教师队伍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与育人能力等方面的全方位提升。

第三,坚持内容创新与课程建设并举,提升教师育人水平。首先,革新教学内容。思政课教师应以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为指引,随着党的理论不断创新及时更新思政课话语体系。并结合教学目标,深化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充分“三全育人”的全场域效能,探索课堂教学与党建实践相结合、理论创新与试点探索相结合、党建人才培养与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创新方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思政课教学中。其次,丰富教学形式。由传统的单一教师讲授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元教学,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参与度<sup>[13]</sup>。最后,智能化教学载体。在全媒体环境下为学生营造智能思政的教学环境,充分利用智能化教辅载体,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针对性、时效性与智能化水平,更好地为学生把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

### (三)以多元协同为依托,推动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的互联互通

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主体协同、多举措并进。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政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sup>[14]</sup>明确建立协调一

致、互通互联的工作机制,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才能够各取所长,发挥协同育人的聚合效应。

第一,完善顶层设计。高校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党建思政工作各部门职责,树立双重责任意识,形成二者协同育人统一战线的共识。加强党委领导下的党建思政工作与学科教育教学的协作,强化校级与院系各级党委之间、党建工作部门与思政教育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共同设定协同育人的方式和目标,在“党建引领、党员示范”模式下,推进二者的要素整合与功能协同,形成高效的党建立根、思政铸魂的育人格局。

第二,更新协同模式。首先,以课堂教学为抓手,推动二者在教育工作向度的协同。使党务工作人员、思政教师、专业课教师与各院系学工队伍加强沟通协调以形成育人合力,在党建工作与活动中传递全面的育人观念,将党建优势与最新理论成果及时转化为优质的思政课教学资源<sup>[15]</sup>。并通过科教协同,打破学科边界,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内容,将党建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其次,以主题教育为辅助,推动二者在党团工作向度的协同。将党支部“三会一课”与主题教育相结合、团支部“三会两制一课”与德育教育相结合,在校园内搭建党建基地、思政教育基地以及团学活动中心等协同育人平台,推动二者与党团育人链条贯通衔接,将育人工作做细做实、做精做深,使党建思政工作功能上深度融合、相互渗透,质量上“双向”强化。

第三,健全考评体系。首先,完善考评指标。高校的考评标准既要立足于高校党建思政工作的总体要求,又要充分结合时代变化、办学特色、院系发展、学科建设、学生情况等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以规范合理、全程覆盖的考核评估体系保障协同育人常态化。应把党建工作、思政教育工作成效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置于考评全过程,建立具有学科特点的、多层面、多元化、多要素参与的通用指标,分类别划分评价对象、分群体设定评价目标、分层次细化考评规则。其次,以评促建。构建全面的考评体系能够最大程度地确保协同育人工作中各项机制的良性循环,因此高校应以提升协同育人成效为根本目标,加强对考评结果的充分运用,通过考评机制形成更加科学的问题清单,及时采取对策和措施以此发挥考评机制的准确性与指引性作用,确保协同育人工作出真绩见实效。

## 参考文献:

- [1]赵曼. 构建“双融合、双促进”的新型育人模式[N]. 新华日报, 2024-04-26(14).
-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02.
- [3]习近平.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4.
- [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N]. 人民日报, 2020-10-14(1).
- [5]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6]葛道凯. 以高质量高等教育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22):11-13.
- [7]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8]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388.
- [9]樊瑞科, 张茂杰.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若干思考[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5(4):59-65.
- [10]李正军, 张岑.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8(2):63-70.
- [11]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8.
- [12]杨雨欣, 马寄, 徐寿凤. 准确把握“大思政课”的“变”与“不变”[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6(2):48-53.
- [13]张乐. 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略探[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6):48-50.
- [14]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1).
- [15]任鹏, 赵海男. 论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课建设的深度融合[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 36(5):126-129.

## Integration Path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LIU Minchang, WANG Jiacheng

(School of Marxism,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s inevitable, and the two are logically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highly consistent in goals, and mutually complementary in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irmly grasp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school management,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 key means for carrying out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For the difficulties existing at the cognitive, teaching and mechanism level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value guidance as the core, explore the innova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thods, aim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xcell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mot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working mechanisms based on diverse collaboration, and thus further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path



#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投 稿 简 则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由河北省教育厅主管、石家庄铁道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栏目有:经济管理、语言文学、社会政治、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高等教育等。读者对象主要是高等学校社科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欢迎校内外作者积极投稿。根据国家标准和规范,结合本刊实际,制定本简则,请投稿者遵照执行。

**1 题目** 简洁、准确,能恰如其分地概括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一般不超过20字。英文题名要与中文题名对应。

**2 作者署名** 一般不超过3人,署名及署名排序应按对文章贡献的大小排序,署名者均应当阅读过本论文。

**3 作者单位** 单位的著录一般应到处级单位,单位应著录全称,单位名称的英译应统一。

**4 摘要** 应概括出文章研究的主要内容;简洁,排除常识内容,避免重复题目。英文摘要一般要求和中文摘要对应。

**5 关键词** 请提供3~8个关键词,关键词尽量采用有关概念、学科的标准提法。中英文关键词应该相互对应。

**6 基金项目** 基金或项目资助课题应注明基金或项目的正式全名、编号,请向编辑部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7 作者简介** 姓名(出生年月),性别,职称,研究方向,学位,详细通讯地址,电话,Email地址等。

**8 正文** 在正文的论述中,要注意表达的逻辑关系,用语简洁准确。8000字左右为宜。本学科公知的内容不要展开论述,非作者创造性的内容只叙述与文章论点有关的内容即可,并注明所引文献和出处。作者提出的论点,要分析与现有论点的区别,并对论文中作者的创新点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文内图表选用最必要的,能用文字说明问题的,则用文字表达。要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图形结构准确、简洁、美观,线条清晰,图序和图题在图正下方。表用三线表,只有一行数据的表,请改为文字论述。

**9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应遵循“最新、必要和亲自阅读过”的原则。具体著录格式如下:

专 著 编著者.书名[M].版本(第1版不标注).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期 刊 作者.题目[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 作者.题目[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论 文 集 作者.题目[C]//主编(任选).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10 请作者通过本刊网站投稿** 文稿自收到之日起60天内未收到采用或修改通知者,请自行处理或电话查询。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论文著作权属于作者,文责自负。本刊编辑对来稿有文字修改权,作者若不允许本刊编辑部对文稿作修改,或不允许其他报刊或数据库等收录、转载、摘编发表后的论文,请在来稿时声明。凡向本刊投稿均视为同意上述各项约定。

通信地址: (050043) 石家庄市北二环东路17号,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编辑部

网 址: <http://xuebao.stdu.edu.cn/sjztdsocial/ch/index.aspx>

办公地点: 石家庄铁道大学春晖楼519房间

联系电话: 0311-87936978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编辑部



#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SHIJIAZHUANG TIEDAO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007年8月创刊 季刊

2025年 第19卷 第1期 总第73期

2025年 3月25日出版

主管单位 河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主 编 齐西伟

副 主 编 王 伟 王书海 杨继成

编辑出版发行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编辑部

地址 ( 050043 ) 石家庄市北二环东路17号

电话 0311-87936978

电子信箱 xbskb36095@163.com

网址 <http://xuebao.stdu.edu.cn/sjztdsocial/ch/index.aspx>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 河北友谊彩印有限公司

定价 10.00元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0365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401/C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Quarterly (Established in 2007)

Vol.19 No.1 (Sum No.73)

Published in Mar.25,2025

Authorized by Hebei Education Department

Sponsor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Chief Editor QI Xiwei

Deputy Chief Editor WANG Wei WANG Shuhai YANG Jicheng

Editor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Address (050043)No.17 Beierhuan Eastern Road Shijiazhuang,Hebei

Telephone 0311-87936978

E-Mail xbskb36095@163.com

Web Address <http://xuebao.stdu.edu.cn/sjztdsocial/ch/index.aspx>

Distribution Scope Published at Home and Abroad

Printer Printing Hebei Youyi Color Printing Co.Ltd.

ISSN 2095-0365

